



恩典为王



谦卑的反对者



王怡牧师简介

王怡牧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亦是作家、诗人、宪政学者。牧会之外，长期从事写作，并在多间基督教教育机构和神学院担任理事和教师。信主前是著名的作家和宪政学者，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



信主后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的牧师，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著有《宪政主义》《不服从的江湖》《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翅膀像鸽子》《福音的政变》《大教堂》《大声的默想》等书十余种。

王怡牧师自牧会以来，一直竭力推动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因反对中国政府在属灵的事上控制基督教会并呼吁执政掌权者应向上帝悔改，停止迫害中国教会，被中国政府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12月9日逮捕，其妻蒋蓉师母亦同时同罪被指定监视居住（相当于秘密羁押），蒋蓉被释放后仍然没有自由，一直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

2019年12月26日当局秘密审判了王怡牧师，12月30日王怡牧师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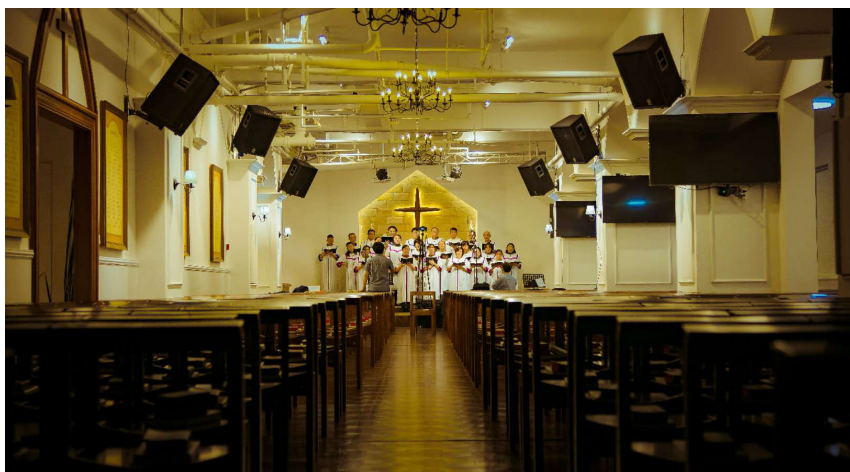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简介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持守改革宗长老会传统和“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异象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建立于2005年，由王怡牧师担任主任牧师。

因坚持公开聚会并联名全国家庭教会共同抵制中国政府为控制宗教信仰而颁行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教会于2018年12月9日被中国政府强制取缔，同日中国政府开始陆续抓捕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会友，刑拘、行政拘留和非法羁押一百余人。

教会位于成都市太升北路56号的教会会堂、图书室、学堂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并没收，会堂内的设备、书籍全部被没收和扣押。

教会负责堂务事工的覃德富长老因负责印刷教会敬拜所用的圣诗歌本和传福音使用的福音手册而被指控“非法经营罪”，2019年11月覃德富长老被控“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图：秋雨圣约教会位于江信大厦6楼的会堂

编者言

王怡牧师声明：我的一切文字均放弃版权，因为文字所传递的实质原本不属于我。任何个人、教会、机构都可以自由地转载、摘录、朗诵、复制、印刷、表演及以各种方式传播、使用。但唯有一点，就是文责自负，转载应当署名。这其实不算一项权利，而是写作者和发布者的基本义务。因为这些文字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正确的部分，归荣耀给神。错误的部分，必须归咎于我。所以，请大家怜恤我，因为唯一不能放弃的，是我被宝血赦免的机会。

编者言：编者是一位受王怡牧师牧养多年的基督徒，因阅读他的文章受益颇多，曾有朋友告诉编者也希望阅读他的书，由于他的文章在国内被封杀，他的书大多只能在国外出版，为了传播王怡牧师的文字，也方便感兴趣的朋友能系统的阅读，遂起意将他在网络上的文章及他所在教会内部印刷的刊物摘录整理成册，王怡牧师是一位勤奋的牧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文章数量庞大，本套书籍所收录的文章并不一定完整，还望读者谅解。

因王怡牧师声明放弃一切文字作品的著作权，编者在此也放弃本书的设计排版权，欢迎所有的朋友无论是基于营利还是非营利目的、无论是转发电子书还是实体印刷、总之鼓励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传播。

由于编者并非专业人士，因此在设计排版中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愿上帝使用王怡牧师的文字祝福各位读者！

荣耀归主！

主后2019年12月30日

王怡牧师被宣判之日

目录

宗教改革沉思录

- 布拉格之春 / 8
- 回到未来 / 13
- 福音的政变 / 18
- 坚不可摧的恩典 / 23
- 做减法和做加法 / 28
- 生命比观点更重要 / 33
- 虽然如此，然而 / 38
- 激进的保守主义 / 43
- 又害怕，又欢喜 / 48
- 不自主的自由 / 54
- 爱是无端的怜悯 / 60
- 进入白宫的路德 / 66
- 福音派的丑闻 / 73
- 谦卑的反对者 / 79
- 加尔主义的敌人 / 89
- 新教世界的叛徒 / 96
- 中国的路德 / 103
- 长老会的真正秘密 / 111

默想

思想截句 | 折磨灵魂的，都是家里人 / 119

思想截句 | 哦，我又中了自己的诡计 / 125

默想信心 / 130

墨观 | 庄严的现实 / 137

默想教会 / 140

默想公立教育 / 152

路德与基督教教育 / 172

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 / 186

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不但对基督的教会，对整个世界的历史与文化而言，窃以为，比2015的英国自由大宪章800周年，更加显要，也更为险要。

虽然对当代中国来说，这两件事的历史价值，一个轻描，一个淡写。但于我而言，却直至四十不惑，关乎身家性命。为此，今年确定读书的三个重点，一为宗教改革，二为保守主义，三为教牧神学。而前两者，皆为后者必要的铺垫。这个沉思录，陆续以随笔和截句的形式，朝向10月31日。

——王怡牧师

布拉格之春

主后2017年2月21日



1

我用十六个字，描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悲情已死，福音当立。

岁在禧年，天下大吉。

2

历史神学家卡尔·楚门，则给了宗教改革一个提纲举领的定义：“宗教改革代表这样一种运动，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上帝，重新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

3

1415年，来自布拉格的约翰·胡斯，被烧死之前，在牢房留下一句名言：

“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在捷克语中与“胡斯”谐音），但一百年后，你们将听到一只天鹅的歌声，那是你们无法焚烧的，那时你们将不得不聆听。”

1531年，马丁路德说：

“约翰·胡斯在波西米亚牢房里预言的那只天鹅就是我”。

掐指一算，相距116年。

4

宗教改革的下列命题，意味着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社会的开始：

对基督来说，复活是受苦的原因，受苦是复活的前提。

对我们来说，复活是受苦的前提，受苦是复活的结果。

5

在现代圣诗中，再没有一句更好的歌词，如此揭示福音的奥秘了：

苦杯祂受，爱筵我尝。

6

路德这样写道：

“并非理解、阅读或者推理造就了神学家，而是生存、死亡和咒诅造就了神学家”。就这样，路德失去了他的爱妻，加尔文夭折了他的长子。

7

当女儿过世时，路德用双臂抱紧着孩子。当她下葬时，他说：

“小甜心，你会复活，并且像星星和太阳一样闪耀。但奇怪的是，我知道她安息了并且一切都好，但我却如此哀伤。”

今日的改革宗教会，我以为最大的危机，就是少了这么一点哀伤。

8

一位弟兄说，改革宗教会最推崇加尔文，但我最喜欢的人是马丁·路德。

我说，实际上，加尔文才是最喜欢马丁路德的人。因为他说，“即使路德视我为魔鬼，我仍视路德为兄弟”。

9

如黑克·欧伯曼说，路德的几乎每一句话都会掀起轩然大波。但我喜欢马丁·路德是“一个满嘴脏话”的人，只因我知道下面两件事：

第一，上帝有能力和自由，甚至使用祂仆人的怒气和粗野，来揭示福音的恩典。

第二，庆幸的是，我所喜欢的路德，没有对我本人说过一句粗话。

10

如何才能回应一位律法主义者呢？

来吧，更加尖锐地传讲律法。

因为每个律法主义者需要听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律法。道德主义者之所以成为道德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并不真相信自己的全然败坏。准确的说，全然败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教义，而不是心中的哀恸。

除非他们哀恸，否则他们就不能听见第二件事，就是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令人惊骇而甘甜的福音。

这个顺序，是我喜欢加尔文的第二个原因。

11

事实上，如果我不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就不敢讲道。

因为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林后3:14-17）。

12

康来昌牧师说，宗教改革所理解的福音，“是一场看似惨败的大胜利”。

真正的胜利，酷似一场失败。真正的荣耀，彰显为卑微和世人的藐视。真正的生命，在必死无疑的地方。

13

十字架翻转了一切，又透过被翻转的一切，来预言末日的翻转。于是，在今生，荣耀继续透过卑微来彰显。受苦是不变的，但受苦不再指向一个悲惨世界，而是指向新天地。

在教会身上，苦难不是彰显苦难，苦难是彰显得胜。

14

这样，今生的唯一价值，是一场暖身运动。如果你不同意，让我换一个命题：今生的唯一价值，是未来的呈堂证供。一个喜悦，一个庄严。两句话加起来，涵盖了人类每一位成员的命运。

15

哦，那一场始于布拉格的春天，用了500年的时间，经过我们，天下人间，现在是春暖乍寒，还是春寒乍暖？

约翰胡斯被处以火刑，1415年。

回到未来



16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今天大多数的新教教会，既在很多特质上，依旧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又在一些更重要的特质上，足以称其为“反宗教改革”的教会。

17

大概因为，500年来，我们先是听说，又正在经历，现代主义

的诞生与衰亡。

一切糟糕的，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带着“Pre—”的前缀；一切重要的，从欧美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都带着“Post—”的前缀。

教会依然如此，我是指地上的，有形的，不完全的，500年来的教会。这是理解教会的，第二位的，次要但必要的因素。

18

这样看来，我们几乎面临一个“拯救宗教改革”的任务。不是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而是一场“回到未来”的考古计划。这个任务，将面对一切进步主义的挑战和嘲笑，包括教会以外的，和教会以内的。

在500年后，将自己投身这一任务的勇气，将来自于，一个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铁路和飞机的“过去”，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视为一个褒义词，或视为一个贬义词？

19

有一个特征，可以将宗教改革，与初代教会以来的数次宗教复兴区分开来：

马丁路德说，他的前辈们，攻击的都是教会的道德；但他攻击的，是教会的神学。

20

举例说，一个牧师犯了淫乱，不悔改，教会将他赶走，并受此震动，迫切祷告，人人流泪悔改。这可能给教会带来一场小小的复兴，但不会为教会带来一场宗教改革。

21

因此，在路德那里，赎罪券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它当然也是一个关乎腐败、淫乱和滥用权柄的议题，但

贩卖赎罪券的本质，是一面贬低了基督的恩典，一面也看轻了罪的权势；错误地看待了基督，也错误地看待了教会和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22

与中世纪的神学家相比，改教家们的作品，不是以天父上帝的创造和人类受造之理性为中心的；与当代的神学家相比，改革家们的作品，也不是以圣灵的工作和人类受造之情感的回应为中心的；

他们只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中心。

23

其实路德也喜欢谈论自己奇妙的属灵经历，这好像与现代基督徒类似，但他的焦点，从来不是圣灵在他身上产生的某些主观影响，而是关乎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或那位“在十字架上彰显自己的基督”。

24

宗教改革可以教导今日的教会，圣灵同在的真正记号：不是开始热烈地谈论圣灵，而是开始更多地谈论基督。

因为改教家们，在没有麦克风和互联网的情况下，曾以历史上最大的声量，宣称整本圣经都是在诉说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宣称基督是新旧约圣经的中心。

正如耶稣自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宣称的一样。

25

但是，卡尔·楚门强调说，“一间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并不等于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前者，只反映了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则；后者，才反映出宗教改革的实质原则。

举例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而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26

因此，那些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正确的人，是典型的宗教改革的后代，因为“唯独圣经”成为了他们的方法论。而那些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宗教改革的后代，他们不是“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产物，而是“前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私生子。

27

然而，那些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仍然算不上宗教改革的真后代，因为“唯独基督”的恩典教义，并没有构成他们的信仰实质。他们才是“后宗教改革”的产物，是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某种混合；其中一部分人，终究守不住“唯独圣经”的形式原则；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唯独圣经”仅以一种“政治正确”的方式被保存着。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在自由派那里，“唯独圣经”已被连根拔起；而在基要派那里，“唯独圣经”仅仅作为一种“活人的死传统”而存在着。

28

只有当一间教会，“既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时，才是宗教改革的真儿子。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只有在归正的教会那里，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作为“死人的活传统”而存在着。

29

其实，归正的意思，就是“拯救宗教改革”。

换成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就是*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归正的教会永远需要归正）。

30

因为人类有近乎无限的能力，可以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基督身上，找到膜拜的对象。这种可怕的特质，造成了我们对一切新奇事物的饥渴，和对于“过去”和一切古老事物的藐视。

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其实周围的行人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因为他用的是拉丁文。但透过刚刚普及的印刷术，这份文件传遍了欧洲大陆。1517年10月31日。

福音 的 政变



31

宗教改革之前的500年，教会越来越具有三个神学上的特质：

其一是教会的“中保性”，不但在一般意义上，唯独透过教会所保存和宣讲的福音，是信徒个人得救的终极来源（对居普良的教会论的发展：教会以外无救恩；对奥古斯丁的知识论的发展：除非教会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何为真理）；而且在个体意义上，唯独通过神职人员的宣赦及其他“圣事”，是信徒个人得救的直接媒介。

其二是教会的“圣礼性”，这是教会的中保性的延续。教会不但被视为恩典落实的有形管道，而且被视为一个记号与实质完

全重叠（这是中世纪对圣礼的看法）的管道。因此，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而拥有了圣礼性，用一句名言来表达，即“教会是基督的圣礼”。

其三是教会的“政治性”，即有形的教会被视为无形的上帝国度本身，这是教会的圣礼性的延续。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真正的、甚至唯一合法的地上政府，教会当然承认和尊重世俗政权，事实上，她从未想过（教会的神学也不允许）替代或合并政府（有人以现代观念认为中世纪是政教合一，其实是一种误解）。不过，与其说她“承认”世俗政府的合法性，不如说她“批准”了世俗政府的合法性。教会凭着至高的属灵权柄，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实际上在信仰上掌管着较低层级的世俗政府。也就是说，中世纪的宪政结构，就是由无刀剑的教会负责对有刀剑的政府的“违宪审查”。

32

而宗教改革，在形式原则（回归圣经）和实质原则（恩典教义）两方面，都摧毁了上述的教会论。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足以被称为中世纪社会政治结构的一场“政变”。

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意味着个人与至高权柄（基督）的关系被重置了，这一发生在灵魂深处的信仰革命，对于一个建立在超自然世界观之上的社会来说，必然同时呈现为一场政治革命。也就是说，个人与基督之下的其他次级权柄（教会及国家）的关系，也必然要被转换。

33

尤其是当“因信称义”的福音与地方诸侯的民族主义的崛起结合之后（准确地说，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信称义的福音负有更大份额地塑造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政变”一词就不只是类比意义上的，而且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实际。因此，并不夸张地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是宗教改革所领养的儿子。

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的500年，是带着上述三个神学特质的罗马教会，使地方主义的欧洲成为了普遍主义的欧洲。而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摧毁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欧洲，这场“福音的政变”产生了“主权国家”这一对欧洲而言、崭新的历史事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德国之父，正如约翰·胡斯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捷克之父，而约翰·诺克斯则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苏格兰之父。至于约翰·加尔文，哦，他居然被视为遥远的美利坚之父。

但宗教改革之后的500年，一个最基本的世界格局的扭转，就是“国家”逐渐取代教会，拥有了下列三个政治神学上的特质：

其一，是国家的“中保性”。虽然个人主义被视为近代国家论的一个基点，但“个人”已经成为被国家所定义的“个人”，即公民。换言之，“国家以外无公民”，就取代“教会以外无救恩”，成为一个现代人的、第一位的身份认知系统。所谓“个人”，首先不是上帝面前的个人，而是国家面前的个人。国家，显然成为了人与他的存在本质之间的、第一位的媒介。在某个意义上，国家以外的个人，不但不是个人，而且根本不算是人。看起来，人的地位上升了；其实，人是从“宗教动物”下降为“政治动物”。“政治国家”成为了人类自由的、最重要的场域。政治的逻辑，取代信仰的逻辑，塑造了现代人最基本的话语系统。国家，俨然已是一个中保。

其二，是国家的“圣礼性”。透过一套类比的祭司制度，和模仿教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圣殿”和“国家礼仪”，如国旗、国徽、入籍宣誓、议会礼堂、国家庆典等，国家不但被视为公民身份的来源，而且在记号与实质之间，国家及其立法获得了一种虚拟的神圣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或宗教的一种形态。

其三，是国家的“政治性”。我的意思是，国家在政治上的神学性质。对那些受到路德影响的德意志诸侯来说，政治学已成为一种政治神学。德国的思想家们，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地，

把国家变成了看得见的上帝。“人权的普遍主义”（这是古老的罗马普遍主义在后基督教时代的升级版），取代了“福音的普遍主义”，而成为现代世界体制的万古磐石。我所说的“政治性”是指一种更高的和终极意义上的统治权柄。宗教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逐渐获得了传统上只有那些遥远的东方君王才拥有的神圣统治权。即他们的统治被视为宇宙中最高的统治，或者说，国家不承认还有比他们更高的统治。因此，反过来说，与其说现代国家“承认”教会的合法性，不如说它“批准”了教会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现在，国家凭着至高的权柄，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实际上掌管着在它看来较低层级的教会。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宪政结构，变成了由有刀剑的政府来负责对无刀剑的教会的“违宪审查”。

36

这样，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500年间的基本走向，是逐渐变成一个“隐藏的教会”。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看不见地方教会了。而是说，教会不再作为一个属灵的、真正的“世界政府”，而被看见。除了天主教会至今保持着以一个“国度”的样式，被世人看见，从而在“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一块残存的中世纪的活化石；而新教的、宗派林立的教会，不再是一个镶嵌在民族-国家结构之中的、看得见的国度。

换言之，既然是因信称义，那么上帝的国度也就因信才能看见。“十字架的神学”，在经历大约一百年的“教随国定”的过度状态后，逐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转换为“十字架的教会论”。教会终于回到了世界的边缘，回到了被世俗权柄压制、逼迫、藐视和管制的常态。教会终于有福了，因为她在世上，重新成为了“为义受逼迫的人”。

这意味着，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本身逐渐具有了福音性。

37

然而，主要在十九世纪以降，这一“隐藏的教会”的形态，与现代性的诉求和国家的神学特质结合之后（这是自由派神学的

简史)，也逐渐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教会”本身的福音性被不断削弱，以至于在种种后现代的教会观下，“教会”本身就是反福音的。

这是令人讽刺的，在十六世纪，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反宗教改革的改革”。而主要在士来·马赫和法国大革命后，有越多的新教教会，加入了这一“反宗教改革运动”，并成为主力。

38

然而，谁能知道主的心，谁做过祂的谋士呢？曾被杀的羔羊，在宗教改革之后500年的历史上，是配得荣耀、颂赞和尊贵的。毕竟，只有在宗教改革以后，教会才可能唱出这样的新诗：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我众罪都洗清洁，惟靠耶稣宝血。

坚不可摧的恩典



39

福音的再发现，几乎颠覆了新教对个人命运的看法，和对教会历史的看法。就前者而论，路德说，“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创造’和恩典的进入，始于深刻的攻击和恐惧，或其他巨大的困难和不幸，对于良心的击打”。我们若不被击打，就不会回到恩典，依靠恩典。而我们若不经历苦痛、惊慌和不幸，我们的良心就岿然不动，不被击打。在C. S. 路易斯那里，路德的这一发现，被浓缩为一句令20世纪的基督徒耳熟能详的话，即“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40

这不是对苦难的赞美，而是对恩典的赞美。只有福音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人生观：那个骂我的人，是上帝派来骂我的。即使那个骂我的人怀着恶毒的动机，但他也无法不成为被上帝使用的、达成福音美善目的的工具，就是最终使我走向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也许我的疾病和失败，的确来自魔鬼的攻击，但就连魔鬼也是上帝“派来”的——不过，现代基督徒通常会换一种更温和的神学用语：是上帝“允许”的。这样，除了基督的恩典，我的生命中其实并没有其他实存性的东西。因为其余的一切，都是为了引我进入恩典。换言之，恩典意味着，苦难和罪恶都不再是终极的，除了基督的死而复活，我的人生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件具有终极意义的事。

41

从另一方面说，加尔文谈到，福音意味着“断绝自我称义的希望”。就像一个酒鬼要断绝酒瘾，烟鬼要断绝烟瘾，福音意味着，我们要在十字架之外，彻底断绝称义的希望。“从律法当中完全解脱出来，绝对不再依赖行为”。而且，唯有福音，才能断绝我们的“道德瘾”。这不是对道德本身的否定，而是将美善的道德，从我们污秽的罪性中抢回来，不容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占据任何可称颂的美德。因为罪的意思，就是对于称自己为一个义人有瘾。

42

这样，我们不但失去了自我的矜持，也失去了对他人的道德制高点。因此，福音也同时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的出现。借用卡尔·楚门的话说，“教会历史上最惊人的事实，就是尽管神的百姓及其领袖常常做出不道德的、对神不忠的事，但神的国度仍然不断地扩展”。历史学的目的，总是在事实之间，寻求因果关系。但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之后，是一个恩典君临天下的世界。因此，除了福音以外，无人能够肯定一连串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现在，历史学要成立，就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也就是以上帝的主权恩典为中心。

43

换言之，主权恩典的福音意味着，在“我们的个人行为”和“福音的果效”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卡尔·楚门说，我们要为此赞美主，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而赞美祂。不然，有谁能得救呢？有谁能成为历史的幸存者呢？

44

因此，宗教改革的动力和努力，单单源自于对上帝主权恩典的深深的惊叹与顺服。在任何情形下，基督已成就的工作和天父永恒的旨意，牢不可破地掌管和指挥着世上的一切，这种牢不可破的掌管和指挥，并特别彰显在祂的教会中。以至于我们对于在任何情形下的，人心的翻转，秩序的颠覆，黑暗的褪去，都可以存着坚不可摧的信赖。奇怪的是，即使在软弱、小信和悲伤中，这种坚不可摧的信赖，在真信徒的生命中依然坚不可摧。我的意思，用诗篇中的话说，这种本质上的坚不可摧，甚至可以通过“义人虽七次跌倒”的过程来呈现。

45

被这种“对上帝主权恩典的深深的惊叹与顺服”所驱使的改革，是宗教改革。不被这种牢不可破的信赖所驱动的改革，是社会改革。在20世纪的教会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是人们不思进取，而是教会中的社会改革太多，宗教改革太少。一批又一批想要改革教会的人，都是以社会改革（或道德革新）的实质，替代了宗教改革的精义。

46

对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醒：路德的改革不是藉着改变组织架构和崇拜礼仪，最终改变了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相反，他的改革之所以最后改变了教会的组织架构和崇拜礼仪，是因为他的心灵和思想，先被福音改换一新。

47

改革宗教会在今天的危机之一，就是一旦我们满足于外在的形式的改革——包括我们崇拜时的诗歌、语言、风格、圣经的译本、讲道的方式、时间、合格的圣职人员的产生、甚至守主日为安息的具体方式——我们就会因这些事而心满意足，不想再改革什么了（在通常情形下，最后只剩下了自己还没有被改革）。因为我们已拥有了改革宗教会的特定文化。我的意思是，我们很难不渴望守住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很难倾向于将它再次打破。而我们的身份认同很容易从福音的核心，转移到福音的某种外在形式上。但福音要求我们，甚至喜悦我们，不断打破我们开始形成的新的自我，甚至引领和迫使我们，再次被剥光衣服，面对福音的内核。

48

教会的危机是，大家会说，我们的宗教改革已在大约5年前爆发过了，或我们已在十年前重新发现了福音，因此建立了这间教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现在是成圣的工夫，至少对大多数信徒来说，他们的属灵需求，已经不再是关于“称义”、“得儿子名分”的教义，或教导他们相信“基督的死而复活”了，他们需要的是天路历程上保质期较长的干粮，不再是如饥似渴的以琳之泉。

49

哦，不是的。这种看法其实是反福音的。宗教改革竟然在五旬节过去了1500年后才发生，这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教会到了任何一个地步，任何一种境地，教会全体所亟需的，仍然是福音本身。一个德高望重的圣徒，即便到了离世前的最后一天，最要紧的事，还是他当初受洗时的悔改与宣信：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主的恩所成的。我信圣子基督，祂是神，祂是光，祂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祂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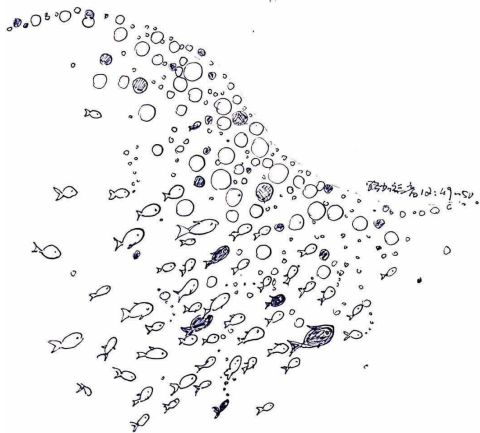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万物的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腓立比书2:5-11

做减法 和 做加法

我来要把水丢在地上
倘若已保着起身
又世界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为万物以心念成就
我是何等地迫切呢



50

在知识论上，改教家持守两个命题，一是我们绝对可以认识神，二是我们不能绝对认识神。

在加尔文那里，能与不能的界限，是比较哲学化的。尽管改教家都普遍具有“非哲学化”的神学家的特质。这是因为他们以归回圣经，取代了经院神学。但相比路德，加尔文还是更哲学化一些。在他那里，能与不能的界限，基本上是本体论的，就是以上帝自身的属性为界限。

51

加尔文更关注的是，我们所宣称的认识，是否反过来藐视了

上帝的本体性的知识。或是否因为强调主、客观的真理一致性，而模糊了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绝对差别。这种谦卑的、出于对上帝超验存在之敬畏的紧张感，在后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中，稍微缓减了。甚至，如同伯特纳所说的，在一些第二代之后的改革宗神学家那里，这种紧张感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但他们谈论上帝创造与拣选的奥秘时，就像在谈论在他们家隔壁花园所观察的、邻居的生活起居。

52

这样一种改革宗气质，即一种真理在握的笃定，和对千古不变的真理的宣告，也在我们这个时代身边的处境中栩栩如生。而且，有一件几乎不可避免的事，那就是在500年的历史中，多数人永远在做减法，少数人永远在做加法。

做减法的意思是，在“千古不变的真理”清单上的内容越来越少。做加法的意思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清单变得越来越长。

53

对那些做减法的人来说，500年过去了，耶稣甚至不一定是童贞女感孕所生，亚当也不一定真是历史人物，而圣礼和圣职当然更不必拘泥了。

对那些做加法的人来说，500年过去了，现在，全身的浸礼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崇拜中唯独唱诗篇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说方言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乃至诗班不能上台，祷告必须跪下，凡此种种，都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54

实际上，前一种人之所以做减法，后一种人之所以做加法，主要都不是来自宗教改革的遗产。而是来自启蒙运动之后的、理性主义的遗产。对这两种人来说（我丝毫没有把自己排除在两种人之外、自称第三种人的意思），加法与减法虽截然相反，但共同点在于，他们对圣经启示的知识，都不可避免的、甚至全面地

重新哲学化了。

55

因此，认识宗教改革500年，必须以启蒙运动划线，将这500年的历史，分为两段，前启蒙运动的新教，和后启蒙运动的新教。

56

那么，稍微回头想，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理在握呢？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在500年后，可以纠改革宗在知识论上的过度理性主义之偏。不妨借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命题来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重新哲学化的结果）。

宗教改革之后，第一个对启蒙运动的神学影响进行反思的教会群体，其实是东正教会。他们作为教会第一次大分裂的产物，也有一部分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必然要在教会第二次大分裂后，去重新定位自己在永生上帝家中的神学身份。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受到启蒙运动的冲击——我说同时，是因为在俄罗斯，时间是缓慢的，百年如一日，一日如百年。但因为东正教社会进程的缓慢，他们对欧洲的现代性，酝酿出了一种批判性。

57

因此，东正教似乎站在欧洲的进程之外，同时批判天主教会和宗教改革。对一批俄罗斯思想家来说，宗教改革之所以应该被批判，是因为宗教改革的遗产，和现代性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他们要求新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对信仰崩溃、对科学主义，对一切摧毁古老传统的现代性负责。

58

新教世界，比较忽略这一点。即在19世纪和20世纪，带着一种痛苦的心灵，来对整个西方文明进行批判的最有力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来自俄罗斯。就文学而言，呈现了现代性对个人灵魂深处的信仰煎熬的作品，仍无人能超越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意思是，同样以启蒙运动为界限，在前启蒙运动时期，最好的基督教文学，一定来自英国。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是无法超越的典范。但他们的伟大，是未曾遭遇和处理启蒙运动之压力的伟大。甚至在有些人看来，他们的精神也有一部分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后启蒙运动时期，最好的基督教文学，一定来自俄罗斯。大概这是因为整个英美已经身在现代性中，不能自拔。

59

好了。在东正教的神学家看来，他们借用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正命题，有秩序，无自由。宗教改革是一个反命题，有自由，无秩序。而东正教（或说受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两次冲击和教会中两次大分裂所塑造的、未来的东正教）才是三兄弟中的合命题，即有秩序，也有自由。

换成圣经语言，而非哲学语言，他们的意思是，天主教是彼得的教会，宗教改革是保罗的教会。而在主耶稣眼里，“我要他留到我再来的时候又如何的”，乃是他们所自认的、约翰的教会。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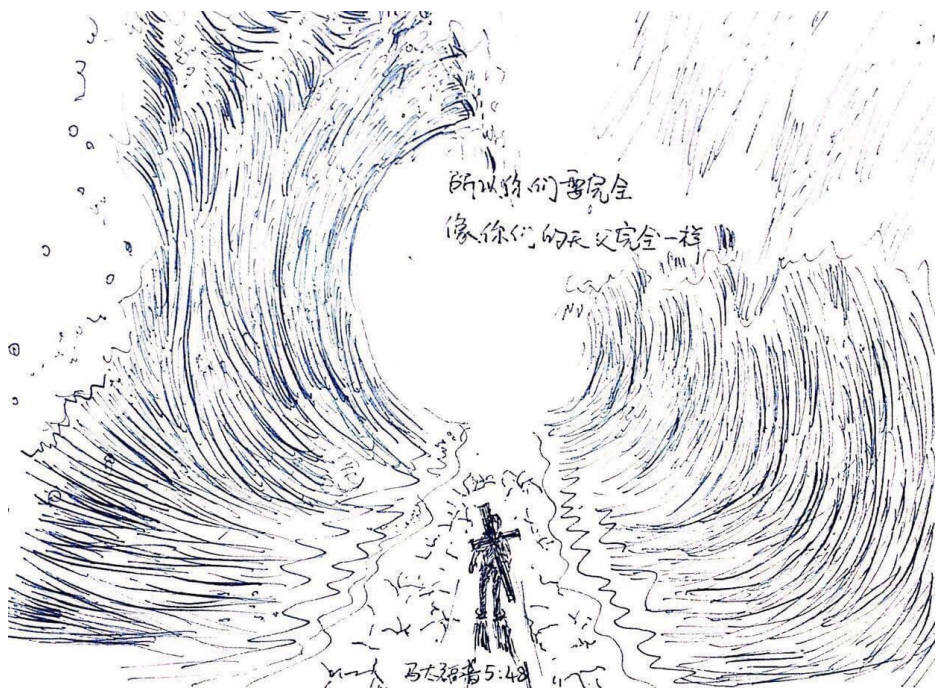
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这是一个好想法，而不是一个好事实。但在认识宗教改革以来的信仰上，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正反合的命题。我认为在500年后，改革宗神学，必须全面反思新教信仰与现代性的关系。或者，我们必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启蒙运动之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失去对现代性的批判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对当前这个世界糟糕的那一部分负责。

我的意思是，虽然今天的保守派基督徒都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公立教育，反对色情泛滥，反对道德沦丧，甚至反对增税和国家权力的膨胀。但在我们的反对之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新教精神与整个现代性根本就是一回事。换言之，当年发起和参与宗教改革的人们，是否应该对今天的同性恋合法，堕胎，驱逐信仰的公立教育，色情的泛滥，婚姻的破灭和各样的道德沦丧，甚至包括国家主义的膨胀，在上帝面前交账？并承担相当大

的责任？

61

还有一个更尖锐的提问，甚至来自严肃的学者。那就是，路德和加尔文在多大的程度上，需要对马克思和希特勒的出现负责？



生命比观点更重要

62

路德的知识论，不是哲学化的，而是瞩目于道成了肉身。换言之，对路德来说，知识论就是基督论。

63

在1518年初的海德堡，路德参加了一场辩论。他提出一个反

对经院哲学的神学论纲。其中第19-20条，阐述了他的“知识论即基督论”：

第19条 若一个人认为，可以在那些确实发生的事上，清楚察觉到属神的不可见之事，那他就不配称为神学家。

第20条 然而，若一个人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属神的可见和明显之事，他就配称为神学家。

64

上述两段话，可以视为路德对约翰福音1章18节的解释：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65

路德的意思是说，十字架是一切神学的起点，又是一切神学的终点。十字架，是信徒赖以判断和理解所有神学陈述的基本原则。

换成家庭教会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观点更重要”。

66

展开来说，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WHAT）并不重要，你是怎样（HOW）思考和表达的比较重要。

譬如说，你是跪着思考的，比你是站着思考的，更重要。你在思考时流泪，比你思考时的逻辑周延程度更重要。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亏损，比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收益，更重要。甚至，你的破碎，可能比你的完整更重要；你的沉默，可能比你的言辞更重要。

67

因此，卡尔·楚门说，凡是当一个人试图来思想神的大能和

主权时，他应该把目光放在哪里呢？路德回答说，要放在十字架上。是的，任何议题，任何时刻，他都必须把目光聚焦在十字架上。不然，他可能是一个学者，却绝不是一个神学家，更不配称为一个牧者。

68

没有任何一位改教家，包括加尔文在内，像路德这样，将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置于整个信仰夜空的中心。楚门说，在路德之后的新教神学中，十架神学，“从未扮演过一个明确的和核心的角色”。尽管在加尔文那里，基督的中心性，和十字架的焦点，仍然是清晰可见的。但加尔文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或许影响了后世的改革宗神学，逐渐偏离了基督中心的焦点——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前后，改革宗神学体系，开始深受欧陆哲学的影响。

69

因此，按另一种标准，也可以将500年来的新教神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圣经化”的神学家，或称“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另一类是相当“哲学化”的神学家。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淡化，基本上发生在后一类神学家的谱系中。——尽管这一分类，并不表明圣经化的神学家，不曾受到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更不表明，哲学化的神学家，就是非圣经的。

70

在20世纪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约翰·慕理是“非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甚至令人惊讶地不拥有PHD学位。而范泰尔则是“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奠定了新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我并非臧否其高下，只是试图梳理其源流。

71

在美国的改革宗传统中，有句开玩笑的名言，“大急流市与

费城有什么相干呢”。按我的分类，是说荷兰改革宗教会，主要是“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而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是“非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尽管这两大传统，其实早就互相融合。

72

回到我所说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我藉此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传承：

天主教会是一个正命题，路德神学是一个反命题，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合命题。

或者，在改革宗传统内部，我藉此来理解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神学进程：

十架神学（路德）是一个正命题，神的主权（加尔文）是一个反命题，十架神学与上帝主权恩典的结合，是一个合命题。

73

没有上帝主权的十架神学，在路德宗传统内部，逐渐走向感觉主义，成为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

轻视十架神学的上帝主权，在一部分加尔文主义者那里，逐渐走向理性主义和哲学化的神学体系，成为新的律法主义的大本营。

74

500年来，有三个时期的教会，呈现出融合了十架神学和上帝主权的合命题的特征。

第一个时期是清教徒时代的英国（及北美殖民地）。清教徒的敬虔主义，是上帝主权下的敬虔主义（这是他们与德国敬虔主义的区别）。而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带着强烈的路德式的癫狂、焦虑和信心的奇迹（这是他们与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区别）。班扬的《天路历程》，是对清教徒的生命与观点的融合的、最优秀的文学表达。

75

这一时期，在北美殖民地有相当长的延续。而我要说的另外两个时期，大概就很少有人会认同了：

第二个时期，是过去几十年持续发生的，在美国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复兴。

第三个时期，是正在发生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与上帝主权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融合。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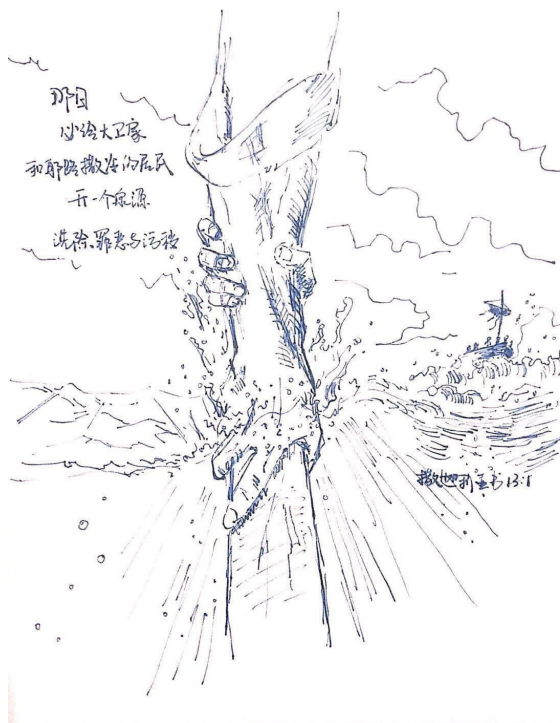
我的结论有两个，一是应然的判断，今天教会的出路，是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一个是实然的判断，中国教会正在（有希望）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

举例来说，唐崇荣牧师是华人教会中这一融合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他是非常“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的阐释者，以至于有年轻一代起来，批判他的过度哲学化。第二，他是“奋兴布道、为主癫狂”的中国教会传统的、最突出的继承者，这种特质使他虽然身处大陆的苦难以外，却比绝大多数华人牧者，更迫切地把握住了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焦点。国内的大多数“非哲学化”的基要派教会，不太理解他的前一种特质。而海外的大多数华人教会，又基本上对他的后一种特质，感到一种难言的尴尬。

77

主啊，我一思考，你就发笑。你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但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

虽然如此，
然而



89

有两件事，我认为改革宗教会是正确的。

第一，我们反对现代的决志祷告，绕过人的理性，直接进攻人的意志。

第二，我们反对当代的灵恩运动，绕过人的理性，直接进攻人的情感。

90

但我们的反对，仍有一种将正确思想置于意志和情感之上和之先的危险倾向。

事实上，圣灵进攻我们的方向，常常并不优先在理性的认识上，第一，重生是全人的，包含了思想、意志和情感的一体性。第二，如果圣灵重生的工作，确有一个优先性，这个优先恰恰针对意志和情感，而非思想。这也是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方式。提问者渴望一个“思想性”的答案，回答者却给出一个“非逻辑性”的回答。

恩典在本质上意味着，正确思想总是正确情感和正确意志的产物。

或者说，“正确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思想的不正确。对福音来说，“正确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恩典决定思想，而不是思想产生恩典。

91

军队中的一切训练，都是优先指向人的情感和意志。使士兵的自我情感崩溃，自我意志被摧毁，然后将士兵重建在一个新的情感和意志之上。那就是顺服，尊重和跟随。对那些具有思考力的士兵来说，这恰恰也是他们的新思想的诞生方式。

92

耶稣的教导方式，也可以称为一种震撼教育。耶稣常常致力于刺激和挑战听众的情感，击打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思想紧张到一个无法思想的地步。这也是祂常常使用比喻、而不是直接给出命题的原因之一。甚至，这是祂道成了肉身、将话语写在人的心中；而不只是亲手写字在石板上的原因。大多数旧约先知领受和传达圣言的方式，往往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在方式上冲击人的情感，摇动人的意志，圣言就不会真正冲击到人的思想。

93

但一种过于重思想的模式，常常将这种对情感和意志的震撼，通过一种过于理性化（学术化）的解经，而化解掉。譬如，太快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将神的话语带给人的震撼、困惑和

挑战缓冲了。或者说，这段诗句中包含了什么神学议题，而将诗句本身的悲哀、忧伤或深深的绝望，带给我们的灵性冲击，太快地转化为了一系列命题。

94

但是，在福音书中，这种情感与意志的震撼、困惑和挑战，正是耶稣塑造祂的门徒的方式。也使恩典呈现为恩典的舞台。

95

路德反击中世纪经院神学，就是反对一种将“正确思想”置于情感和意志之上的倾向。经院神学后期出现的“唯意志论”，动摇了建立在人类理性推导之上的神学认知。神的意志高于一切，这是神学与哲学的分野。一件事情，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是神所要求的。这是哲学，或哲学的神学化。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它是错的，所以是神所要求的；而是因为它是神所要求的，所以才是对的。

路德等人，事实上承继了经院神学晚期的意志论。对改教家们来说，这才是神学。

96

这样，分三个阶段来说，在中世纪，神学是哲学的婢女；在宗教改革，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500年后呢，哲学和神学成了一夫多妻。

97

历史神学家高德福瑞指出，路德对此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述，他将中世纪的神学，称为“因此”的神学，将宗教改革的神学，称为“然而”的神学。

对中世纪来说，神学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所以”。对上帝的认识，持续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努力之上。对路德来说，神学的基本逻辑，是“虽然如此-然而”。对上帝的认识，是一种逻辑上

的颠倒，往往不是藉着“因此”而来，是藉着“然而”而来。

98

因为恩典意味着“出人意外的平安”（腓4:7），意味着“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高德福瑞的思考与卡尔楚门相似，他认为，后世的改革宗神学家，也许过于跟随律师出身的加尔文，更加青睐充满了“因此”的神学论述。这既带来了改革宗神学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在“因此”的神学论述上具有极大的优势，但也造成了改革宗神学的某种“经院化”，与启蒙运动共同分享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论。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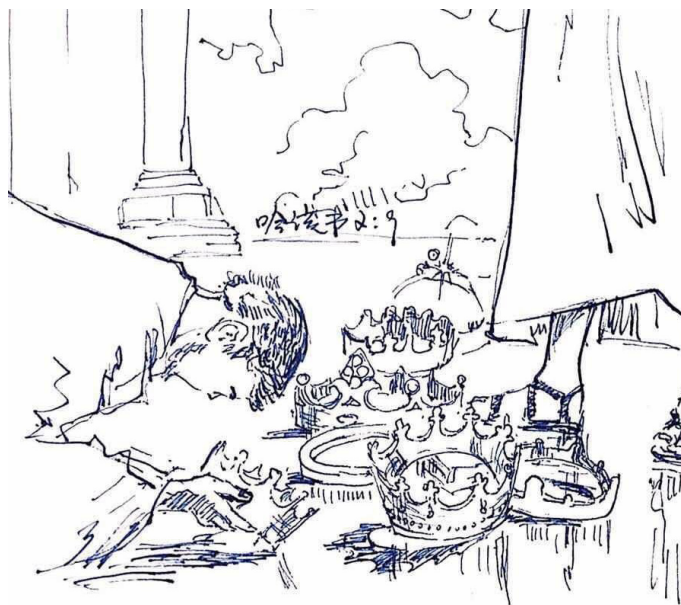
事实上，新约中的确充满了“因此”的论述，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然而”的转折。但对路德来说，“然而”才是福音的本质，“因此”只是福音的果效。对路德神学的重新思考，可以帮助今天的改革宗教会，将我们的合命题展开在“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信仰之上，或者说，展开在“因此-然而”的“福音的辩证”之上。也就是展开在之前提及的，弗兰姆的思想、意志、情感的三视角框架之中。

100

我的意思，不是认为改革宗神学本身，缺乏对“然而”的认识。恰恰相反，对上帝的预旨与拣选的信靠，表明加尔文比路德更加强烈地受到经院神学晚期的“意志论”的影响。在加尔文那里，“唯独荣耀归主”，成为信仰和对上帝的认识的最高目标。而这个目标，事实上构成了对“因此”的神学论述的一种根本性的限制。改革宗的救恩论，是彻底建立在“然而”之上的。那就是，对上帝永恒旨意的敬畏，和对恩典的辩证或颠覆性，及对上帝做工的主动性的敬畏。“然而”意味着，神的儿女在任何情形，都可以绝对地依靠和仰望一个“绝对他者”的福音。

或者说，相信上帝预定的旨意，意味着相信在任何困境中，福音都有能力带给我们一个“然而”。这是“荣耀归主”的前提，又是“荣耀归主”的结果。唯独恩典的教义，使一切对福音真理的阐释或阐释的努力都上升为了敬拜。

激进的保守主义



102

罗伯特·高德福瑞认为，路德是一位“把保守派的各原则引入到相当激进的结论中去的人”。

103

这首先意味着，路德不是革命家。“让一切都更新”，是革命家的抱负。这一抱负是相当现代主义的，用中国文化的概念

说，它意味着对“抱残守缺”的拒绝。即一个残缺与幽暗的世界和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姿态，正是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革命家眼里，“道成肉身”无异于对残缺和幽暗的肉身世界的认同。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一方面颠覆了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又是对我们的存在的一个背书。意思是说，福音意味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我们如此败坏的生命，居然仍有被拯救和被容忍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单单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在我们之外被给予的。

104

譬如有人曾愤懑地说，“中国不灭，天理不容”。意思是说，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败坏到连我们自己都受不了了。但福音却传递一个消息说，上帝仍然愿意忍受一切的邪恶和败坏，行在祂眼前。不但如此，祂还决心亲身前来，品尝这些邪恶，承受这些败坏。因此，福音意味着，一件比“中国不灭”更加天理不容的事，那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105

因此，在这个世界以内，“让一切都更新”的抱负，就是否认十字架、拒绝上帝在教会和人类社会中的主权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路德批判重洗派的暴动时说，革命就是对上帝的叛乱。基督已经来过，这是这个世界继续存在的唯一价值。基督还要再来，这是“一切都要更新”的唯一指标。

106

至少对路德本人来说，“疑惑使人成为修士，信心使人成为父亲”。用一句当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广告，来描述路德所发现的福音，是非常贴切的，那就是——“抑郁症患者的福音”。

107

灵魂的焦虑，是中世纪末期的精神气质。在现代社会，只有那些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或其他精神疾病的少数人，才能稍微体

会这种中世纪晚期的情感。在那个时代正常而普遍的，在我们中间变成了敏感而病态的。

路德具有典型和强烈的中世纪末期的灵魂焦虑。有时候，我痛恨自己没有与他类似程度的焦虑，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和我相比，是与大卫更相似的。因为我的痛苦缺乏深度，我的眼泪量小，断续，不足以将床榻浮起。我的绝望，即使经过夸张的修辞，也比不上深渊与深渊之间的回响。

108

但路德不同。路德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先于他们，也强于他们，感受到了灵魂不得拯救的痛苦，和如同火烧的焦虑。如果不是路德，自然也有别人被主使用，重新发现福音。但是，如果不是路德，路德就必然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抑郁症患者和精神分裂者。

换言之，宗教改革的确是带着医治大能的。因为宗教改革医治了路德的焦虑，使他免于精神分裂。就是“如果有一个修士可以藉着苦修得救，那个修士一定就是我”的精神分裂，或者“我并不喜爱他，说真的，我有点恨这位公义的上帝，我对他怀有愤怒”的精神分裂。

109

按这个标准，现代人为什么不精神分裂呢？只不过大多数人面对上帝和自己的灵魂，已经分裂到了一个不再分裂的地步。同样，对今天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基督徒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必要的休息、药物和辅导外，他最需要的仍然和路德一样，就是宗教改革。

110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需要拿出一张纸上，在上面写下对教会的95条意见，主日崇拜时把它贴在会堂大门上——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你只需要把它贴在微博、QQ和朋友圈里就行了。

我也不是说，这是治疗抑郁症、灵魂焦虑感和其他任何人格障碍的方法——事实上，在当代教会中，这恰恰是我们产生属灵的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111

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宗教改革，一场针对生命和信仰的、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态度。治疗一切的心理疾病、精神症候，治疗无聊、苦毒、怨恨和歇斯底里的处方很简单，就是仰望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教义上说，就是“五个唯独”；从情感和意志而论，就是经历各各他。

112

就真理的内容而言，加尔文宣称，真理带来拯救。就真理的途径而言，路德宣称，理性是一个妓女。在《驳经院神学论纲》中，路德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神学来说，就像黑暗之于光明”。这是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回到了教父特土良的立场，“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当呢”。

113

因此，在方法论上，宗教改革是以奥古斯丁对抗亚里士多德。以“然而”对抗“因此”，以恩典的预定对抗律法的逻辑。

114

对改教前的路德来说，唯一想不明白的事是，人们为什么不恨上帝？为什么还要敬拜祂？今天，很少有基督徒敢如此求问。即使他们尚未真的重生，他们也不敢这样求问。这导致了耶稣的福音，对于那些不敢如此求问的现代基督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延续了500年的标准答案。他们跳过了情感的深渊，省略了意志的挣扎，满足于理智上的一知半解。他们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就直接听到了后现代的福音。

115

如同路德所说的，当他终于发现，罗马书所宣扬的“神的义”，不是神对人所要求的义，而是神在福音中也就是在基督里，所给予我们的义。“就是这一个看起来小小的差别，就把我的世界整个颠倒了”。

116

现在，路德以一种最激进的方式，找到了最保守的信仰。

按他的话说，他终于在“那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福音。就是在十字架上，那终极的愚拙之处，他找到了那位乐意在残缺和幽暗的存在之中认同他、赦免他的上帝。

117

现在，路德可以因信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被更新”的盼望中，同时又并不要求自己的生活“一切都被更新”。

现在，他甚至可以在脱离天主教会之后，心平气和的承认，“新教的道德状况，并没有比罗马天主教更好”。

118

有意思的是，亲路德的改革宗多，亲加尔文的路德宗少。

我是一位相信福音恩典的改革宗牧师，我也愿意承认，改革宗教会的道德状况，并不就比非改革宗教会更好。而今天基督教的道德状况，也不会就比天主教会更好。至于我个人，作者的道德状况，通常也绝不比他的读者们更好。

又害怕 又欢喜



119

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整本圣经都在述说一个亘古以来的大故事，即神在基督里的恩典。

以神为中心，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只有“以基督为中心的”，才是“基督教的”。

从改教家们开始，教会进一步撇清了与一切异教的区别。那就是，我们不但宣称，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且只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我们宣称，信耶稣，是且只是我们信三一上帝的唯一的道路和方式。

120

现代的灵恩运动，之所以是偏离宗教改革的，是因为许多灵恩派的教师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圣灵同在的真正记号，不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圣灵，而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基督。

现代的基要派教会，之所以也是偏离宗教改革的，是因为基要派的教师们也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成圣的真正秘诀，不是人们一直在谈论律法，而是人们一直在谈论恩典。

121

对路德来说，有两类神学家。一类叫做“十架神学家”，一类叫做“荣耀神学家”。

荣耀神学家的特征之一，是某种道德主义。一种根深蒂固的异教观念，就是“大多数人都期望神奖赏那些行善的人，那些表现良好并顺服神的诫命的人，将会得到天堂的入场券”。

即使在信耶稣的人群中，这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正是这种观念，生出了种种宗教式的自义、傲慢、比较、嫉妒、论断和偏见。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自卑、自欺、自恋，和不可救药的对自尊的敏感。

122

仿照《腓立比书》第2章对基督之降卑的描绘，荣耀神学家，就是那些“本有人的形像，却坚决以自己的荣耀为不可抢夺的，拒绝虚己，存心升高，并且痛恨奴仆的样式”的人。

这样的人，也会说，“为神的荣耀而活”。但他们在内心深处，厌恶十字架，对一种必须在卑贱中显出尊贵、必须在失败中显出得胜、必须在丧失时才能品尝到的荣耀，感到扭捏和尴尬。道德主义者可以忍受一切，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十字架。因此，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必须得到认可，必须得到道

德的勋章的信仰。

123

或者，这样的人也会说，他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但他们相信的十字架，只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生命现场。他们就像好龙的叶公，唯一害怕的，就是活画在自己眼前的十字架。

很多浙江的基督徒，对政府的拆十字架运动感到愤怒。但很多人忘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只有拆下来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正如只有背在肩上的十字架，才是十字架。主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祂命令凯撒把十字架从教堂顶端拆下去，就是命令他的儿女把十字架背起来。

124

荣耀神学家的另一个特征，是某种成功神学。或者说，道德主义的实质就是成功神学。因为这种神学要求变现，要求超越的信仰，变成可计量的单位。或者说，他们要求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于是，他们强调主的复活，而不再强调主的受难。对荣耀神学家来说，“受难”是过去式的，“复活”才是是现在式的。

125

然而，主已经复活，这恰恰是十架神学的精髓。主若没有复活，我们受苦还有何用？主若失败了，我们的一生就是炮灰。五旬节后，十二个门徒的殉道，恰恰是主复活的证据。主真的死了，所以他们真的跑了。主真的复活了，所以他们才真的不要命了。

如果教会真信基督的复活，教会就将背起十字架。主若真的活着，我就可以去死。主若死了，我倒必须活着。

126

换言之，假如我说，我是不能失败的。我是不能受苦的，我是不能贫穷的，我也是不能死的。那么，这就显明，我压根不相信主的复活。我相信一个杀死了主耶稣的世界，甚于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世界。

127

荣耀神学家，不懂一件事，就是两个马利亚在坟墓外，遇见复活的主时，她们为什么“又害怕，又欢喜”。他们也不懂，为什么天使明明说了，耶稣已经去了加利利，要在那里见门徒。但耶稣却向这两个姊妹显明，说，“愿你们平安”，接着又说，“不要害怕”。

128

一个人可以在哪里，看见神的爱“最为戏剧性地”彰显出来？路德的答案是，在基督的自愿的顺服上，即祂在十字架上自愿亲身承受神的所有沉重如山的愤怒。

一个人可以在哪里，最为清楚地看见神的圣洁与公义？路德的答案是，在基督于十字架上遭受的所有最可怕的痛苦上。

129

因此，在对基督位格的认识上，路德固然坚信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但与罗马教会相比，路德突出地强调基督的人性。可以说，基督的人性位于基督的基督论的中心。基督教所相信的道，必须是“成了肉身”的道，因为神对人的恩典与怜悯，几乎三千宠爱，集中于此。

卡尔楚门指出，这一对基督的人性的强调，在路德那里，论争性大于神学性。也能从而理解，他为什么在圣餐观上如此坚持，基督的肉身必须真实临在于祝谢后的杯饼中。甚至不惜与瑞士的改革宗翻脸。在改教家中，没有人比路德，更加重视、也更加了解受苦的基督，所经历的死亡的黑暗、痛苦和悲惨，而这一切是如何深切地与我们的赦免和新生命息息相关。

然而，几百年后，二十世纪的自由派神学家，几乎是从路德的遗产中，重新认识到了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受苦，对于福音的至关重要。他们不惜以削弱基督的位格（或基督的神性）的代价，来重述一种苦弱的基督形象。相对于道德主义的基要派，恰恰是自由派更加重视对苦难和十字架的言说。这是因为他们比基要派，更加关心现实世界的苦难与绝望。于是他们发现，苦弱是且必须是基督徒在世的现实经验的一部分。因为基督与失败的人类认同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基督成为失败的人类的一份子。于是，这些主要来自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们，以路德的口气说，“你若要和我谈论上帝，就别忘了跟我谈论基督的人性”。

这也是一个基督论上的正反合命题。在初代教会，基督论就是救恩论。对福音的理解，基本上就等于对基督的神人二性的理解。在罗马教会一千年的历史上，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是基督的神性压倒了基督的人性。在路德那里，基督的人性开始反过来压倒基督的神性（我不是说在路德本人那里，这种压倒已经导致了神学的偏差。在他那里，如前所述，这种压倒只是论战性的和修辞性的）。这一倾向，逐渐发展为二十世纪教会在基督论上的主要倾向。但在加尔文那里，基督的神人二性重获了一种平衡，成为一个合命题。对瑞士的改革宗神学来说，基督的神人二性，再次成为对福音进行正确理解的一个神学结构。

十架神学意味着，你的自我形象，必须比你现在所认为的更加败坏和糟糕。同时，十架神学意味着，你所蒙的恩宠，也必须比你现在所能想象的更加丰盛和不可思议。

路德会用更激进的修辞，他说，“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天堂，我们可以说，祂必须先把我们丢进地狱。为了使我们品尝福音的自由和喜乐，祂必须先使我们对自己的义彻底绝望”。

不由自主的自由



134

1546年2月18日，凌晨三点，路德离世。临终前，他说，“我们的确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乞丐”。

约翰·派博牧师说，这意味着，承认自己是乞丐，是我们活着的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唯有这种方式，使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得着恩典。

135

1937年元旦，梅钦离世。临终前，借用现代技术，他拍了一份电报，给西敏神学院的同事慕理。上面说，“除了基督主动的顺服，我们没有盼望”。

136

这意味着，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只能由上帝造成。创造，拯救，审判，都是如此。

137

引用加尔文关于《以弗所书》的一篇讲章，他说，“你们必须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才能“在上帝的话语上大大张口”（这意味着像一个乞丐），才能明白和遵循上帝至高的话语（这意味着上帝的主动）。

138

路德说得更直接，他引用《诗篇》119篇，“我未受苦以先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67节），诗人的结论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71节）。因此，一个承认自己不义的人，必须在公义的道路上受苦。这是我们明白上帝话语、领受福音的唯一方式。

139

这意味着，在恩典的教义中，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自由”的涵义。黑格尔说，宗教改革的实质，就是人将成为自由的人。而这是宗教改革所发现的人的本质所决定的。

和康德一样，他如此之深地误解了宗教改革。

140

我说，必须重新理解“自由”的涵义。意思是说，在500年后，教会必须重新努力，才能摆脱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派神学对人类灵魂的统治。

141

恩典的教义，对哲学家所阐述的“自由”，构成了不留情的打击。恩典的威力，首先体现为对人类的自主的否定。如果把救恩比喻为一项知识产权，人类的野心，不仅是希望获得这项知识产权的一切好处，并且试图宣称这是一项“自主的知识产权”。换言之，人类极其渴望救恩，但并不愿意接受，救恩是一项来自上帝的、自由的赏赐。

142

人类对救恩的渴望，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福音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在教会历史上，真敬虔的敌人，从来不是各种不敬虔，而是各种假敬虔。

143

换言之，自由必须首先用来描述上帝，而不是用来描述我们自己。“自由”是否构成这个宇宙中的一项终极的、珍贵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位“自由的上帝”，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群“自由的人类”。

144

恩典的教义，意味着唯有上帝是自由的。唯有祂的主动，创造和维系着祂与我们的关系。

145

恩典意味着，在一位自由的上帝面前，如果我们是一群“自主的人类”，我们恰恰是不自由的。因为我们作为堕落的受造者，无法反抗那位自由的上帝。

146

真正的、作为人的自由，就是对那位“自由的上帝”的觉察和承认。

147

十字架，是上帝的自由的最高峰。十字架所诉说的，比上帝创造的宇宙穹苍所诉说的更美，一位“自由的上帝”的流血所诉说的，比亚伯的血和一切宗教中的“自主的人”的流血所诉说的更美。

唯有十字架，使我们彻底地觉察和经历到一位“自由的上帝”。正如耶稣所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约10:18）

148

研究加尔文的学者C. 汉考克，将加尔文的教义，称为“人对自我的无意义的感知”，和“人对绝对权力的感知”。

这个教义教导人类，“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正义”（基督教教义，III, xi, 23）。换言之，就是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乞丐，将唯一的救赎和真宗教，转向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自由的上帝”。

149

这也意味着，受苦，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唯一方式。我们不能安坐在那里，自主的思考。我们必须跪下来，放弃自主。必须大大的张口，像病人任凭医生检查他的口腔或腹腔一样，任凭上帝长驱直入，进入我们的灵魂。

150

而“自由”，是爱的前提和内涵。爱就是自由地去爱，爱就是在得到一个可以不爱的保证和权利之下，决定放弃权利去爱。

因此，上帝是否全然自由，决定了在这个宇宙中，“爱”到底是否存在？

同样地，“爱”是否构成这个宇宙中的一项终极的、珍贵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宇宙中是否存在一位“自由的上帝”，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群“自由的人类”。

151

因此，恩典意味着，十字架也是爱的最高峰。正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10:18）。因此，祂的门徒保罗充满盼望和喜乐地宣称，“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 8）。

152

现在，让我们下一个定义：自由的人，只能是觉察和相信一位“自由的上帝”的人。人不能“自主地进入自由”，人必须“不由自主地进入自由”。

哦，主的恩典，就是对那“不由自主的自由”的赞美。这赞美单单要归给你，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啊，因为自由，就是躲藏在自由的那一位荫下。自由，就是对你在十字架上“自由的顺服”的敬拜。

爱是无端 的怜悯



154

李漫波弟兄，引用路德的话说：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老老实实做一个罪人”。

155

因为，靠功德称义，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宗教精神。我游荡了十几年，历经艰难，才接近了这种宗教。然而十字架如大锤，毫不留情地，又把这伟大的宗教精神，砸得稀烂。

156

福音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福音与那些体面、尊贵和有学问、有理想的人作对。

因为耶稣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地步，这种下降本身，大大地激怒了我们的宗教精神。

157

路德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形容这种不可思议的颠倒：

“凡是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认为有再加以修缮和提高的必要。结果是，地上再没有一位比上帝本人还要可怜、被人轻贱和鄙夷的学生了。耶稣必须做每一个人的学生，而人人都想做他的老师和校长”。

158

而在墨兰顿那里，唯独信心和唯独圣经，基本上是一回事。

“信心，就是持续地认同上帝的每一句话”。

而信徒的义，只能是“那经由怜悯而归给我们的义”，也就是经由基督的十字架。

159

怀特菲尔德是伟大的布道家，也许可以称为改革宗传统中第

一位伟大的布道家。谈到服侍力量的源泉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神的仆人在其他时候，从来不能像在十字架下时那样更好地写作、传道；在那时，基督的灵和荣耀的灵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赶逐，被迫要在粮仓和田野里，在大路和篱笆旁写作和讲道时，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显出他们是大有权柄的人”。

160

正如对身体而言，失去疼痛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正如路德说，

“只有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逼迫，我们才知道，福音是完好无损的”。

这位十架神学家又说，

“世间的敌视预示着教会的成熟与成长，因为教会在受到逼迫时发展得最好。如果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没有了，如果十字架仇敌的咆哮在我们耳边消停，如果一切都安安静静了，这就说明，撒但已成了教会的看门人，上帝话语纯正的教义已经丧失了”。

161

伯纳德，是路德和加尔文都喜欢引用的，甚至在《基督教要义》中是唯一被引用的中世纪神学家。他也如此说，

“当撒但从各个方向以诡计和强暴攻击教会的时候，是教会最健康的时候；而当一切太平的时候，教会进入最糟的光景”。

162

改教家们总是在十字架的痛苦中，重新发现爱的奥秘，爱就是无端的怜悯。

锦瑟无端五十弦，所发是悲哀的声音。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却无端地发出爱的颂歌。

就如甘霖降在旱地，甘霖的降落，与旱地的意愿何干？

163

福音是真正的爱，是不可一世的爱。如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约15:5）。

这一点，我很明白。但我不明白的是，那不可一世的爱，主却为什么情愿呢？

164

不然。古往今来，有多少破碎的心灵，向着魔鬼投降。

就如厄困中的人，去求高利贷。苦主，向更大的贪官上访。

福音，粉碎了人类的宗教精神。就是粉碎了道德的高利贷，和我们内心更大的贪官。

165

墨兰顿这样总结说，

“当我们仰望上帝所应许的怜悯，并且因着相信基督，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知道，自己在天上有一位父亲，而不是一位审判官”。

他接着说，

“信心的意思，就是去信靠上帝怜悯的恩典。而这恩典，与我们的行为毫不相干”。

166

这意味着，福音胜过人类最高的梦想：就是宇宙中有一位清官。

然而，怎么可能有一位为死囚去死的清官呢？

但当耶稣为我们而死时，上帝不再是清官，祂比清官更好，祂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167

这样的福音，意味着信徒身上，必然和可以发生一种令人惊讶的改变。

——就是对他人无端的爱。去触摸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们常在这件事上失败，但失败本身具有极高的价值，失败表明：

第一，我们被命令，在福音中期待和追求这种无端的爱，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也是不可放弃的。

第二，我们被命令，必须忍受那些污秽和邪恶的状况，直等到一切事物都走向完全。

168

因为，如果爱是无端的，爱就不会被恨所胜过。只有无端的爱，才不会给爱的反面一点机会。

我对妻子的爱，不是无端的。所以我常被她伤害，正如她常被我伤害一样。

如果爱是无端的，爱就不会沮丧。福音是无端的爱，意味着福音将拯救我们脱离恨和沮丧。

169

同样，恩典与我们无关，恰恰是我们走向成圣的坚固根基。

如果不圣洁的生活，可以威胁我们得救的地位，不圣洁的生活就会驱赶我们，重新回到人类的宗教精神。

恩典意味着，连不圣洁的生活，也不会威胁我们的得救；于是，圣洁，才成为一个应许，而不仅仅是一个要求。

170

恩典是一个母亲，圣洁是她所怀的胎。

律法生出对我们圣洁的要求；但唯有恩典，生出我们对圣洁的渴望。

171

为此，在上帝面前老老实实做一个罪人吧。

“此情可待成追忆，甚至当时不惘然”。

进入白宫的路德



171

500年来，人类的价值观，沧海桑田。

就今日而言，谈“人性”，基本上等于“任性”。谈“神性”，基本上等于“神经”。

基督论的钟摆，用了一千年，使神性压倒人性；又用了不到半个千年，使人性压倒神性。

不在神性之下的人性，就是任性。不能进入人性神性，就决绝于人性之外。

172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必须成为信仰的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十字架才能解开，“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这一神义论的千古困局。

173

我们能够期望，自己的命运会比上帝的儿子更好吗？

在十字架之外生活，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消费者的意思，就是不能忍受任何的不便。

在国外，一次乘飞机，不小心在座位上，与邻舍的手腕轻微触碰。尽管我立刻说了声，对不起。但对方的神情，似乎受到了一次仅次于大屠杀的严重冒犯。对我这个从小在拥挤的公车和菜市场生活的人来说，感到十分惊讶。

这并非什么文化冲突。或者说，这并非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而是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是古典的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的消费者文化的冲突。

174

现代文化的根本罪恶，就是期望过一种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

一种不能忍受任何的不便的生活理想，意味着对十字架的否定。

我感兴趣的是，现代文化，是怎么一步步说服我在飞机上的那位邻舍的。现代文化这样告诉他：现在他正在遭受一次仅次于大屠杀的、对他的个人隐私权利的严重冒犯。

175

很难想象，一种由宗教改革所塑造的，基督教的文明，竟然会走到这样一个唯独人性（任性）的地步？

176

意思是说，十字架的神学，和上帝主权恩典的教义，基本上与现代文化的一切事物，都对立起来了。并且，这种对立的程度，一直被教会低估了。

事实上，这种对立的程度，足以和当年的耶稣与以色列社会的对立程度相提并论。

在那个与基督的十字架对立的社会中，耶稣不惜得罪了全社会每一个人。

177

在美国，川普的上台，带来了对基督教与现代文化对立关系的，一次卷土重来的认识。

为此，川普也不惜得罪了全社会每一个人。就此而言，他必然成为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然而，川普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方式，与耶稣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方式截然相反。

178

换言之，川普意味着，教会本身，已经失去了得罪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勇气和力量。

因此，川普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成为了一部分教会所盼望的，又成为了另一部分教会所厌恶的。

归根到底说，川普从白宫发起的“宗教改革”，是一种没有

十字架的神学、和一种背叛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在美国不断失败的必然结果。

179

从竞选开始，川普在美国社会所张贴的，是一份声讨世俗社会的“九十五条论纲”。

当年，路德在《致德意志诸侯》一文中，以“人人皆祭司”的名义，鼓动那些握有刀剑的政治家们站出来，维护教会的纯正与圣洁。

500年后，川普反过来，他鼓动教会站出来，支持他获得刀剑的权柄，用以维护教会的纯正和圣洁。

180

从这个角度说，最近两年在美国社会所发生的，是一场后现代的宗教改革的变奏曲。

同性婚姻合法化，相当于世俗社会颁发的“赎罪券”。在道德的堕落下，有过之而无不及。川普，是一位有刀剑的路德。连体型和脾气，都有类似之处。支持川普的教会，变成了没有刀剑的政治家。

181

然而，这场社会化的伪“宗教改革”，是一场将十字架完全排除在外的、“不能忍受任何不便”的激情。

让我引用卡尔·楚门的话说，“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认为一切不出于恩典的活动，基本上都是非基督教的。而所有非基督教的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悖逆神的形式”。

182

我再说，福音与现代文化是几乎对立的。现代文化，意味着一个“自我满足的福音”。而福音，意味着对“自我满足的福音”的否定。

183

换言之，比堕落更堕落的，是意图以一种不需要十字架的方式，去解决人类堕落的问题。

184

如D. A. 卡森所说，我们厌恶色情活动吗？是的。那么，在某些伊斯兰地区，一切色情活动和色情刊物，受到了比在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严格的控制。但在那里，你也几乎听不到福音。因为福音所受到的管制，与色情活动类似。

185

喔，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后裔来说，这真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一个色情和福音都能够自由传播的地区，和一个色情和福音都受到严厉控制的地区，哪一个更符合宗教改革精神的？

186

简单的回答：这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两种情形都不符合福音。我们只是接受，而不是选择。接受是不可选择的。选择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是否应该去促成一个使色情受到更严厉控制的社会，这是否会削弱福音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

同样，基督徒是否应该去促成一个否认同性婚姻的政治社

会，而这是否会削弱福音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

187

卡尔楚门说，健康、财富、快乐“这三件事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三座金牛犊”。

今天，与宗教改革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为一种反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文化。

色情、专制和同性婚姻，带给教会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才能改变她们。而是如何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再次彰显在一个与福音全面对立的文化中。

188

既然，福音是堕落的唯一的仇敌。那么，堕落在程度上的变化，不是为了加增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难度，而是为了加增我们信靠十字架的程度。

也就是加增我们在苦难和软弱中的喜乐程度。

189

现代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十字架的迫切性，胜过宗教改革时代本身。

十字架的福音，意味着反对福音作为一种疗法，反对福音作为一种魔术，也反对福音作为一场革命，更反对福音作为一种娱乐。

十字架的福音，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一种不能忍受生活中的不便”的理想，必须放弃一种过“比上帝的儿子更好的生活”的权利。

500年后，世界场景已不可避免地多元化。福音释放了每个选民的良心，而代价就是，从此使每个罪人的良心，都获得了背叛福音的权利。

十字架意味着，在现代文化中，进入主流社会是一个幻像。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个陷阱。

宗教改革的精神，意味着教会在现代文化中，必须成为非主流的主流，和非政治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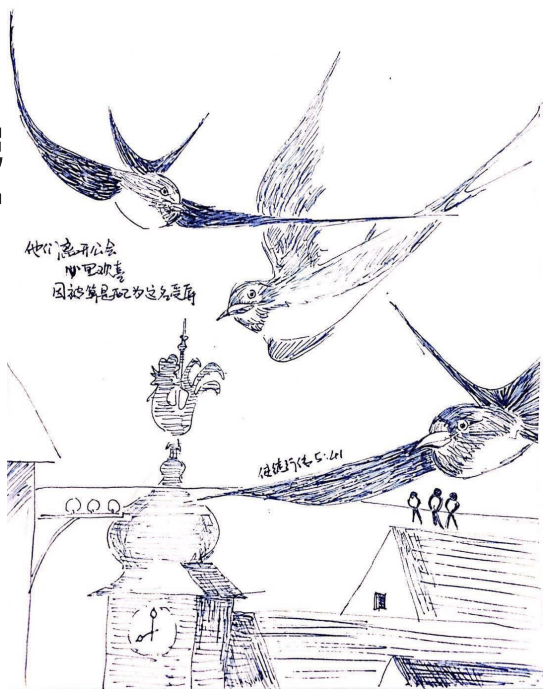
由白宫发起的“伪宗教改革”及其教会的支持者，注定将徒劳无用，是因为人们还流连于一去不返的“基督教社会”，活在一个反十字架的幻像中。

191

现在，如果永生是真实的，永生的赏赐，就必须通过“生活中的不便”和一种“与上帝的儿子相似的生活”，彰显在一个拒绝永生的现实中。

现在，如果称义是真实的，称义的地位，就必须通过我们继续被这个世界判为不义，而使十字架的公义，彰显于一个不义的现实中。

福音派的 丑闻



192

2010年,《今日美国报》报道,有两名研究人员,拣选了从中世纪到宗教改革以来,最有名的52幅以《最后的晚餐》为题的油画。他们以一种后现代特有的学术眼光,专门对比这些作品中,餐具的大小和食物的分量。研究表明,宗教改革以来,画中食物的分量,在明显地增加。

193

研究人员说，这是“道成肉身”的继续。表明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如路德的神学特征，就是基督的人性，越来越被置于信仰的中心。

虽然这样的观测，实在缺乏足够的逻辑链条。但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鲜活的细节，来反映在当代教会中，耶稣越来越被视为一位“满足人的需要”的救主。

194

这也可以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为什么“牛津运动”卷土重来，成为500年前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所谓“牛津运动”，就是不满宗教改革，将基督的人性置于信仰生活的中心，而导致的信仰的个人化，对个人主观经历的高举，对教会释经传统与权威的藐视，及由此而来的宗派林立，良心滥用，和在崇拜、圣职、圣礼上的低教会观；从而在新教内部爆发的，一场回归天主教会的运动。

195

用一种幽默和自嘲的语气说，牛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对在“最后的晚餐”上，食物分量逐渐增加的趋势。

196

在16世纪，“反宗教改革”运动，是指天主教会在拒绝“因信称义”的福音同时，所爆发的一场有限的道德更新、教会改革、灵性复苏和宣教运动。历史学家，将之称为广义上的“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这场道德主义的复兴，虽然有限，效果却仍惊人。耶稣会的宣教激情和牺牲精神，在任何层面似乎都亚于新教。事实上，必须承认，是“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而不是宗教改革的新教

教会，是近代全球宣教运动的先锋。

正如利玛窦，是马礼逊的先锋。

197

坊间的各种教会史，大概充满了一种被主流历史学家所诟病的“辉格党人史观”。就是将新教主要塑造为受害者和历史的主线，将天主教主要塑造为加害人和历史的反动，而给予500年历史的一种框架性解释。

在某个意义上，我认同新教的史观，就是“辉格党人史观”。恩典教义的历史，绝对是人类历史的主线。

但在另一个层面，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辉格党人史观”简化了历史。将恩典与功德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布满在历史画卷上的、错综复杂又惊心动魄的过程，过于“政治正确”地省略了。

198

因此，新教的教会史教科书，大多忽略了，去检讨从“反宗教改革”运动到“牛津运动”的一条线，与宗教改革到现代新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也大多忽略了，去检讨宗教改革运动与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于是，无论是信徒，还是牧者，甚至包括很多学者，都难以解释和面对，既然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与之针锋相对的天主教会，能够在500年间不减反增，守住了全球基督教世界的半壁江山？甚至，为什么美国的保守文化在很多方面，似乎正在从一个“新教国家”，变回一个“天主教国家”？

事实上，如果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撇开，光凭福音派教会，根本不可能形成80年代以后的“右翼美国”。事实上，如果把最高法院中的天主教徒拿走，今天美国的最高法院中就几乎不再有相信三一上帝的人了。

在19世纪后期，当“自由派神学”几乎统治了整个新教世界时，一场新的、在新教内部爆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即“牛津运动”从英国产生。

令人感到尴尬和同样难以解释和面对的，尽管“牛津运动”成为了对新教的自由派神学和食物分量逐渐加大的趋势的一次形式主义的回潮（因为他们主要的诉求和保守，是在一种旧的教会观下的崇拜礼仪的回归）。但一百年以来，这场新的“反宗教改革”的“回归罗马教会”的运动，却吸引了许多对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包括亨利·纽曼，没有一位20世纪的新教神学家对大学教育的影响，能够超过他。

包括《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和开创了现代诗歌与文学浪潮的先锋T. S. 艾略特，甚至在某个有意义上，包括了伟大的C. S. 路易斯，及对他影响至深的两位作家之一的切斯特顿（另一位就是托尔金）。

我将这一场针对宗教改革后裔的“回归罗马教会”的运动，视为一场广义上的牛津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还包括对当代新教教会影响巨大的一大批天主教灵修作家，如卢云神父等人。甚至，新教世界与天主教会的大合一运动，事实上也是当代“回归罗马教会”运动的一部分。

虽然一些“战斗的改革宗”和愿意为福音大发热心的“保守的福音派”，痛心疾首和气急败坏地指责，这些“回归罗马教会”的迹象和乱象，恨不能把路易斯的名字和卢云的书，从基督徒的大脑中彻底抹去。我欣赏并认同他们的决绝。然而，他们同样过于“政治正确”地简化了历史，仅仅简单的怒其不争，并不能使新教世界，得到一个反思和检讨自己的机会，我们对恩典与功德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201

1994年，马可·诺尔（Mark Noll），这位惠顿大学的教授，写了本轰动一时的书，《福音派思想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里面说，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福音派根本没有思想。

卡尔楚门说，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我认为，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福音派思想中根本没有福音。

他引用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的话说，福音派学者往往只有在最罔顾福音的时候，才能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他们又如此地渴望获得学术界的尊重。

202

在我看来，反宗教改革运动，始终构成了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恩典与功德的角逐，应该在结论上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决绝；而在思想和历史中，又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复杂。

直到2007年，美国福音派神学协会的主席贝克威斯（Francis Beckwith），提出辞职，原因是他决定改信罗马天主教。这一反宗教改革的事件，使当代的“牛津运动”达到了令仁匪夷所思的巅峰。

203

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是没有思想。这是他们没有福音的结果，也是他们妥协福音的原因之一。

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是没有福音。这是他们没有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没有思想的一个持续结果。

我们，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教会，正走在这条路上，只知道宗教改革的正确，不知道反宗教改革的险恶。这很容易使我们仅仅在一代人之后，就迅速地失去思想，也迅速地失去福音。

所以，500年后，史普罗说，这是一个福音的“危急存亡之秋”。在对局面的描述上，我认同他。在现实的姿态上，我又认为他危言耸听。因为，史普罗所列出的危险，似乎都是“他们”的危险，就是那些与天主教在核心真理上混淆视听、眉来眼去之人的危险。然而，功德对恩典的修改和替代，是一场自古以来、直到基督再来的战役。最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是恩典同样临到天主教会持守错误教导的基督徒社群中。在某个意义上，今天的天主教会，并不比约翰·卫斯理在对恩典的一种功德化的理解上走得更远。

对一部分人，我们要强调，他们都是错的。但对另一部分人，我们要强调，上帝的恩典，不间断地临到那些在基督身体中犯下认知上的大错的肢体。从利玛窦，到路易斯，到纽曼和卢云，基督都可以、也愿意藉着他们，教导我们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不肯仅仅将恩典，临到那些在智识上彻底反对功德的人们（就是我们？），这才是祂显出主权的恩典的方式。这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个世界上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205

一个阶段性的小节：关于对福音的认识，我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我也同时相信，上帝并不因此偏爱我们。

因此，我不同意史普罗的结论。福音没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是自认为正确的那一小群。

正确之人的危险总是在于，我们正确到了一个不知该怎么面对和解释错误的地步。

这就是神学正确之人的丑闻。



谦卑的反对者

206

谦卑，来自福音中，一种被完全扭转的自我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给「罪」一个现代性的定义，罪就是自我认知障碍。

一个人不相信福音，就必然存在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

自杀、离婚、殴打、谩骂、怒气、说谎、凡此种种其实都是

自我认知障碍的结果。

保罗，给了「谦卑」一个简单的，实践层面的定义就是「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2:3）。

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就是有自我认知障碍的人。

207

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败坏，但不是全然败坏；相信基督的恩典，但不认为恩典决定一切；相信自己的得救，但不相信上帝的预定和拣选；那么这个人，就仍然处于一种严重或轻微的自我认知障碍中。

208

恩典的教义，改变了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就必然改变这个人对他人的态度。

只有当谦卑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不得已的命运时，谦卑才是谦卑。换言之，谦卑的人，是极其恨恶自己的不谦卑的人。

也就是说，看自己比别人强，是一种令自己感到极为羞耻的念头，尽管这念头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

209

为了教导信徒的谦卑，也为了使「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件事，看起来是如此理所当然。使徒保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守主义的理由：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4:7）

210

恩典，意味着一切都是领受的。

我的意思是，一切好东西都是领受的。一切坏东西都糟蹋了这种领受的结果。

而一切都是领受的，就意味着一个属灵的规律。主耶稣亲自揭示了这个规律：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可 10:31）

211

换言之恩典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颠倒的，或随时可以再颠倒的。

要让一个有钱人谦卑下来，除非他相信，今夜主若愿意，主就可以使他成为穷光蛋。

要让一个健康人谦卑下来除非他相信，今夜主若愿意，主就可以拿走他的性命，或使他终身残疾。

212

同样，要让一个聪明人谦卑呢？要让一个神学正确的人谦卑呢？

特别是，要让一个自认为最明白恩典教义的改革宗（Reformed）人士谦卑呢？

尤其是一位正在写这篇文字的改革宗牧师？

这真是又大又难的事，只有「五个唯独」才能处理。

主有高明的手段，既是常常幽默，也永远令人敬畏。

213

生活中永远有这样的例子，敬虔者远离上帝，软弱者起来帮助他。

有时，一个智慧的人忽然变笨了，一个笨笨的人说出了真理。

又如主所说，祂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31：32）

所以，如果一位主权恩典的上帝，要兴起灵恩派（Charismatic Movement）来安慰改革宗，或叫人扶着改革宗的牆，去走福音派（Evangelical）的路，又有什么稀奇呢？

214

尤其考虑到下列情形：

曾经，改革宗教会是新教世界的尖刀排。现在呢，现在他们主要成了新教世界的宪兵队。

曾经，改革宗人士走在殉道和宣教的路。现在呢，福音派提供宣教士，灵恩派提供殉道者，而改革宗主要提供评论员。

215

我总是被迫地需要声明，其实我是一位相信恩典教义的改革宗牧师。但我认为，改革宗的锋利剃刀，若不调转一个方向首先指向对自我的猛烈批判，改革宗就会陷入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入的自我认知障碍。

或者说，我们将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深一层的盗梦空间。

听起来，这是极其矛盾的。就是一群绝对相信上帝的绝对恩典的人，却成了自我认知障碍最严重的人。

216

但上帝的智慧是莫测的，祂再次藉著使徒保罗，预先了这种矛盾性：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82)

这句经文，恰恰不是对神学错误到漏洞百出之人说的，而是对神学正确得滴水不漏之人说的。

217

说了这么多，我要再引用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例子。

看起来，在改教家里，他是最不谦卑的人。不但因为他是一个大公教会的强烈的反对者，而且脾气火爆，言语尖刻。教宗称，路德是闯入我主葡萄园的一头野猪。其实这句话，不但指向他的神学立场，也在暗暗形容他的性情。

218

但我读马丁·路德的许多书信，却惊讶地发现，路德是一个谦卑的反对者。

因为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以后的人类，已经在世界观上失去了谦卑的氛围，或一种以谦卑为高贵的古典气质。对他人的敬重(honor)，已经让位于观点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个人主义的时代，一个人的价值，几乎是由他的个体独特性所决定的。这时，任何影响或减损了我的个体独特性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因为那将减损我的价值，威胁我的身份安全感。

219

因此，恰恰是在现代社会，你无法真正对一个与你观点迥异的

人,保持极大的尊敬。因为这种尊敬,必须出自于谦卑。而谦卑,是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

有人会反对说,可是,宽容一切不同观点,正是现代社会,而不是古典社会的特征啊。不宽容与之相反的信仰,不正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基督教的陋习吗?

220

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一切不同观点都应该宽容,因为没有哪种观点或哪种宗教可以宣称自己具有排他性的正确性」,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不容质疑的基本信条。

一旦这个信条本身被反对,现代人就会失去个人自由选择的价值稳定性,他们的身份安全感就会立刻受到绝对性的威胁。

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可以尊重任何人,但绝不能对反对上述信条的人,保持尊敬。

相反现代社会决心逼迫那些不同意这一信条的人。

他们天真或虚伪地以为,这种对排他性价值观的逼迫,将结束人类社会的一切逼迫。

221

这正是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的后裔,为什么在自由主义的欧洲,越来越被藐视和反对的原因。

我想,这也是儒者秋风,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破口大骂基督教的原因。

222

我的意思是,人们要么不反对,要么不谦卑。

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外，人类无法在任何其他地方，学会什么叫谦卑的反对者。

包括「非暴力的反抗」。非暴力意味着，反对者本人预备着为他的反对承担代价。而在通常情形下，反对的意思，都是预备着让被反对者承担代价。

223

因此，「非暴力的反抗」已是极高的道德，但还不足以反映福音中的颠倒。

因为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谦卑。非暴力的反对者，并不真尊敬他所反对的人。非暴力的反抗者，的确已准备好自己承受代价。但非暴力与十字架的区别在于，非暴力的反抗，是准备好了「为了这个反抗本身」去承受代价，而不是「为了爱自己所反抗的人」去承受代价。

224

所以，即使非暴力的反抗者如此彬彬有礼，非暴力的反抗本身，仍然是一场反抗运动，而不是一场福音运动。

而十字架所塑造的「谦卑的反对者」，即使脾气难免暴躁，言语稍微尖刻(是的，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优点，甚至路德宗信徒也不会这样认为)但他所掀起的，仍然是一场福音运动，而不是一场反抗运动。

225

好了，让我列举马丁·路德书信中的两个例子，来表现为什么路德是一个谦卑的反对者，而这种谦卑是一种古典的气质，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而自然。但当这种谦卑的属灵氛围消失后，路德在威登堡教堂(Wittenburg Church)大门上钉出九十五条的行为，就日益被刻画为一种激烈的和左翼的革命者形象了。

或者说，其实，后代的基督教会，在相当程度上普遍将重洗派（Anabaptist，又译再洗礼派、重浸派——编注）的形象，错误地张贴在了与之相反的路德脸上。所以，今天在路德的名下，不但拥有很多他其实并没有说过的名言；而且他的言辞尖刻，脾气暴躁的形象，也多多少少被漫画化了。

226

事实上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不但将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张贴在了教堂大门。而且同一天，他也将一份九十五条的复件，寄给了他的大主教。同时写了一封极其谦卑的信。

我仅引用这封信的开头，路德对大主教的尊称和问候：

致基督里受尊敬的选侯、马格德堡和美因兹大主教、勃兰登堡首席主教、我在基督裏的主人和牧者阿尔布雷希特大人：

愿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怜悯以及我的忠诚归于您。

基督里最受尊敬的神父，尊贵的君主，请原谅我这个人群中最小的一个，贸然写信给圣洁的您。主耶稣基督为我作证，我犹豫了很久才做这件事。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太渺小了，太卑微了。现在鲁莽的做这件事，只是受我忠诚的义务所驱动；在基督里我最尊敬的神父啊，我知道我亏欠于您。愿圣洁的您屈尊关注只是一粒微尘的我，因为您是仁慈的主教，所以请听一下我的请求吧。

227

任何一位现代读者，都不太可能将这封信与一位激烈的反抗者联系起来。

甚至，我做过一个测试，请学生们读这一段开头，告诉他们这是启蒙运动以前的一封著名人物的书信。请他们推测这是何人，为何事所写的。

当然，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可能与这封信有关的人与

事都列举了。却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任何一秒钟，会把它与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行为联系起来。更不会想到，这封在现代人看来是如此卑微而谄媚的书信末尾，是请求「阿尔布雷希特大人」撤回赎罪券的发行。

228

当学生们得知真相时，他们发现历史真是复杂。并且稍微意识到了，一个现代人理解古典社会所面临的困难。

229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吧，马丁·路德不只面对位高权重之人如此。在奥古斯丁修会作修士时，他常写信给管理选侯图书馆的一位朋友施帕拉廷，甚至为了找一本书，就去一封信，请求借阅，或请他为自己抄其中的一篇。

直到1516年，每封信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

「致基督的仆人，文学硕士，我最博学而有忠诚的朋友，正直而卓越的弟兄格奥尔格·施帕拉廷」。

230

这种敬重他人，视自己为可怜悯的气质，不论面对朋友，牧者或是论敌，在马丁·路德笔下几乎都是如此(请忽略他发脾气的时候)。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就更不用说了。他跟任何人写信，那口气在一个现代人眼里，都带著一种今天未曾见过的，最高规格的恭敬。这样说吧，在当代社会即使一个最卑微的，穷困的工人，给他最尊重的总统(投了他的票的)写信；或一个受了他人十年资助长大的孤儿，写信给他的恩人，都不会口出那样的敬重之言。

231

因为现代人对于敬重他人，有一种深深的自我的压力。就是在一种权利本位的文化中，对他人的敬重，会威胁到我自己的自我认知。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拦阻了我们对他人的敬重，又激发了我们对他人的批评。因为这两件事，都有助于建立我们的自我安全感。

232

如果我们是认识恩典的，或者说我们是被恩典认识的。

我们就应该有能力，突破现代文化对我们的自我认知的威胁，从而恢复一种对他人的敬重之情。

不然，我们在任何事情上的正确都会演变为一种错误。特别是在神学和信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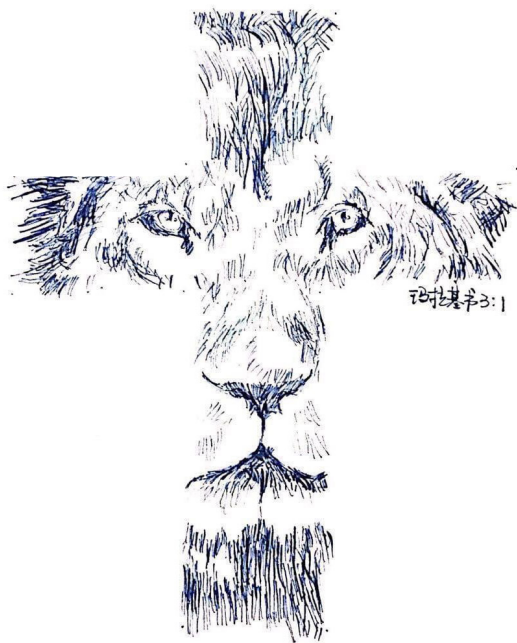
并且，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反反对，都会变异为对任何他人的反对，和对自我的辩护。

234

如果福音还没有让我们学会，去反对一个我们极其敬重之人的某个错误，而我们在对方这个错误上的相反立场，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他的敬爱。

那么，我们就不是一个谦卑的反对者。我们就仍然需要福音。并且我们因此也需要宗教改革，需要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 主义的 敌人



235

葛瑞格·达彻（Greg Dutcher）是一位相信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他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小书，《谁杀了加尔文主义》。按他的说法，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

根据恩典的教义，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恩典，与承受恩典的人，就是彼此反动的。我的意思是，抗拒恩典，就是我们这些蒙受恩典之人的自然倾向。我说的“自然”，就是全然败坏之罪人的自然。

如保罗所说，重生的人里面，有两个律。老我与新人，情欲与圣灵，永远在我们身上相争。信心，就是相信这场相争，必然（甚至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这种得胜是一种被替代的得胜。如果我们的刑罚被代替了，我们的得胜也在被替代中被确定了。但我们在一个相信的过程中，却是始终不信的。我们的降服，始终是不情愿的降服；我们的相信，始终是不能相信的相信。

237

让我这样说，一个相信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当他说他相信的时候，他是在不信中相信。当他说不惧怕的时候，他是在惧怕中说不惧怕；当他说我愿意的时候，他是在不愿意中说我愿意。

换言之，因为他明白福音，所以他相信一件事，就是相信他本人的意志不值得相信。

238

所以，我渴望为主殉道吗，我渴望为福音而死吗？我知道我里面极其渴望，如保罗说，我情愿被浇奠。但我同时也知道，我里面并不情愿。一个不情愿的力量，始终在主所赐的情愿中。这就使我知道，我的情愿，并不出于自己。

在某个意义上，我的信心和情愿，因为是主所赐的，所以可以被称为是“我的”。但又因为是主所赐的，是外在于我的，就是外在于我的“旧人”的。因此，又不能完全被称为是“我的”。换言之，用保罗的话说，我不能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得着了。

因此，我知道，在某个意义上，我与我所承受的救恩之间，仍然是一对矛盾。相信这个救恩，的确是我的信仰；但抗拒这个救恩，也的确是我的现实。抗拒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信心”之所以具有价值的那个现实。

同样的，我也知道，我与我所持守的教义之间，也是一对矛盾。如果说，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那么，这既意味着，我本人是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同时也意味着，我本人就是我所持守的加尔文主义的敌人。

240

天主教会因此争辩说，你不能单单因着“信心”，就宣称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们认为，“得救的确据”是不可能的。若有人如此宣称，他是在自己骗自己。

改教家们却坚持，称义不是被“注入”的，而是被“代替”的，或者说在替代中被“归算”的。如果“义”是因神的恩典注入我们里面，就像武侠中的顶尖高手，将内力输入年轻人体内。这个年轻人就必须试着一掌击出，发现他能摧毁一棵树。他才能确定，自己确已拥有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内力。

这样，在天主教会那里，“称义”就和“成圣”连接起来了。称义就是成圣，成圣就是称义。一个人若还在相信的时候怀疑，在顺服的时候抗拒，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仍存有污秽，那么他怎么可能（怎么敢）确定，自己是一个被救赎之人呢？

241

然而，又有谁不是在相信的时候怀疑，在顺服的时候抗拒，在刚强的时候软弱，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仍存有污秽呢？

如果天主教承认，事实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透过他的完美的成圣，显出他的完美的称义来。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冲突了。但不幸的是，天主教会居然

认为，真的有人可以不在相信的时候怀疑，不在顺服的时候抗拒，而且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也不再有一丝污秽。

那我们就必须将这句话奉还了：若有人如此宣称，他就是在自己骗自己。

242

义是因基督的代替而被“归算”的，而不是“注入”我们里面的。这意味着（按着西方教会特有的法学思维），“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判，是关乎一个人在永恒至高的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

福音的意思是，上帝首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而新的性情，新的样式，必须从这个新地位上活出来。因此，一个还没有活出属神性情的人，仍然可以是神的儿女。而且，他必须先是被神的儿女，才可能活出儿女的神态。

如果你收养一个孩子，你不可能对他说，你先叫爸爸，你叫了，我就收养你。他即便这样叫了，也不是怀着“儿子的心”，而是怀着“奴仆的心”叫的。你必须先收养他，成为他的父亲。然后，他才会渐渐活出儿女的样式。如果你是一位君王，那他必将活出王子的样式。

243

这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在本质上只取决于施恩者的意志，不取决于蒙恩者的表现。基督的代替性的赎罪，是一个罪人在尚未完全清除他的罪行之前、而被称义的唯一根据。因此，“注入”的观点，本身就是与恩典相反的。因为“注入”的观念，如此强烈的要求一个结果，要求一个验证，要求一份被注入者的成绩单。

244

相反，“代替”和“归算”的义，意味着上帝，不那么急着看我们的成绩单，他给了我们漫长的一生来挣扎，来怀疑，来软弱，来抗拒。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我们的成绩单是被注定的。虽然圣经不断警告我们，勉励我们，也劝戒我们，竭力活出属神的性情，预备去行一切的善事。但如希伯来书所强调的，这不是一场淘汰赛，而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和训练。成圣，恰恰必须在与“称义”完全无关之后，才会成为可能，并充满活力。

245

唯独因为成了肉身，又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完成了义对不义的代替——路德称之为“甜蜜的交换”。保罗如此令人震惊的，将福音的实质表述为“称罪人为义的神”（罗4:5）。

246

当我说，我作为加尔文主义者，正是加尔文主义的敌人。我相信福音，但我本人在离世之前，永远是与福音相反的。即使我的属灵生命有了长足进展，只要我一天还活着，我就是福音的敌人。

换个说法，就是福音的改造对象。这意味着，每一天，当我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抵挡福音的罪人时，神对我来说，就仍然是、和正在是“称罪人为义的神”。保罗接着说，信这位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4:5）。

24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派博说，“神就是福音”。关于我的生命和整个宇宙，最大的好消息，就是竟然有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

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晚年劝勉提摩太时说，“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后2:1）。而不是说，你要在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刚强起来。

这和彼得晚年劝勉下一代的口气，几乎一模一样。“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3:18）。因为一个基督徒若不在恩典上长进，无论他作了什么善工，又无论他的神学是多么加尔文主义，他的生命就根本没有长进可言。

249

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因为理性主义假设了，你就等于你的思想。或你的教义就代表你的生命。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也可以说，你就等于你的祷告，你就等于你的奉献，你就等于你的侍奉。而道德主义的意思，就是将一种“荒谬的信心”（因为属天，所以荒谬；因此出于神，所以不可理喻），与一种可以评估、外显和比较的人身上的外在记号，连接起来，建立一个因果关系。

250

因为教义是可以习得的。有人持守某种正确的教义，有人践行某种正确的善行，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可能出于邪恶的目的和复杂的动机，因此并不能被称之为“善行”。

但改革宗传统的最大危险，就是理性主义的危险。即将持守一种正确教义的行为，视之为“善行”的可怕倾向。“我相信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恩典教义”，这件事的属灵意义被理性主义化了，或者说被拔高了，被偶像化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相信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恩典教义”，仅仅是我的一部分事实。而在冰山的下面，“我相信恩典的教义”这件事本身，其实是我抗拒恩典的一种方式。

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加尔文主义的主要敌人，不是改革宗教会以外的人，而是那些相信《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人。

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对一个改革宗信徒来说，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这不是改革宗人士称义的方式。我们和一切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接受《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基督徒一样，都是单单因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基督是主而称义的。

新教世界的叛徒



252

好吧，现在让我们回到案发现场，这500年来，是谁杀死了宗教改革？

253

看上去，路德宗是新教世界的第一个叛徒。路德和加尔文都不同程度地，承接了中世纪的奥秘派传统。1516年，路德在致施帕拉廷的信中，向他推荐奥秘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陶勒的证道辞。路德说，“在拉丁文和德文文献中，我从未见到比这些文辞更富益处、更与福音和谐的神学著作了”。他说，如果你尝过修士无论做什么都摆脱不了的苦毒，那就从陶勒的作品中，“来品尝一下并且看一看主的恩惠是多么的甜蜜吧”。

254

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在中世纪，一半躲藏在奥秘派的灵性体验中，一半凸显于唯名论的神学突破中。

255

在行为主义的苦闷中，是路德的导师施道比茨，给他推荐了陶勒。而唯名论的思路，使他弃绝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回到了奥古斯丁。在他写给修道院副院长约翰·郎的信中，路德这样说：

“懂得五种语言的耶柔米，比不上只懂一种语言的奥古斯丁。虽然伊拉斯谟绝不会这样认为。然而，一个强调人的意志的人，比不上一个除了恩典一无所知的人”。

256

所以，这两种中世纪的晚期传统，奥秘派和唯名论，路德皆而有之。他的宗教改革，固然是教义的突破，而非道德的革新。但这一福音的再发现，对路德来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的意思是，路德所描述的福音，一半来自神学突破，一半来自敬虔传统。

257

我的意思不是说，加尔文所描述的福音，都是海水，没有火焰。

加尔文的敬虔，同样地，部分来自对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吸收。伯纳德对他的影响，远超过陶勒对路德的影响。但加尔文对奥秘的灵性体验的吸收，本身是神学性的。有人说，其实加尔文是一个“圣灵神学家”。但现代灵恩派人士对此显然不以为然。因为加尔文完成了对奥秘的理性主义阐释。

改革宗的特色，是奥秘的，但不是奥秘主义。改革宗的恩典教义，是超自然的教义，但不是超自然的表达方式。

258

加尔文主义引以为傲，和引以为戒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加尔文主义完成了对救赎的奥秘的理性主义解释。

路德的生命焦虑和在福音中的释放，以及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因信称义”的呐喊。在加尔文那里，变成了“与基督联合”的对救赎次序的统摄，和一切指向“上帝的荣耀”的，无法想象有比之更崇高、恢弘的神学体系。

259

这正是12年前，使我与无数的加尔文主义“新鲜人”一样，感到欣喜若狂的地方。

同样，这也是我经历了一段对恩典教义的、理性主义的迷恋之后，在癫狂与安静之间，开始沉思的地方。

260

是的，再也没有比改革宗神学更奥秘和超自然的神学体系了。B·B·华腓德说，只要你将一神论坚持到底，你就必然会是

一个加尔文主义者。

最初在伯特纳的著作中，我读到他引用华腓德这句话。后来读到华腓德在《救恩计划》中对这一立场的全面阐释。他的大致意思是，如果“一神”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原则和一切理性推导的起点，那么，借用他的一个更著名的结论就是，“在无神论和加尔文主义之间，你将找不到任何一个安全的立足点”。

261

这一立场，对20世纪的新加尔文主义来说，至关重要。我认为，华腓德是最后一位古典的老加尔文主义者，又是现代的第一位新加尔文主义者。他启发了20世纪的凯波尔和范泰尔，使加尔文主义完成了对启蒙运动后的世界观的回应（也包括对路德宗的现代投降主义的回应）。因此，新加尔文主义使恩典教义在整体上，具有了一种“护教学”的性质。

262

这一切，都是我深深爱慕、膺服并委身其中的教义传统。但问题在哪里呢，借用安瑟伦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无法想象有比之更崇高、恢弘的神学体系”，在逻辑上就是对上帝本身的定义。

全然崇高的改革宗神学的唯一危险，就是它将全然败坏的改革宗人士，置于在全然败坏的试探中。

263

用伯特纳在《改革宗预定论》中的话说，后世的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在谈论上帝拣选与救赎的奥秘时，试图回答一切问题，而越过了敬虔的界限。尽管他们的观点不错，但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在谈论自己在后花园，所窥见的邻居后花园里所发生的事一样。

264

如果说，现代福音派的挑战是，他们需要学习在该说话的地方不要闭嘴。那么对改革宗人士来说，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在该闭嘴的地方不说话。

同样，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不需要把话说得太满的地方，不把话说得太满。如何在需要模糊的地方，不要过于精确。

对启示的精准的理解，就是在清楚的地方同等程度地清楚；在模糊的地方精确地反映模糊。在需要澄清的地方澄清，在神秘之处保持神秘。

265

换言之，改革宗的功课是，在神学的思考和教义的阐释上，“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后半句我都不敢引用，因为主说，“何必自取败亡呢”？（传7:16）

266

或者借用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对美国当代的年轻加尔文主义群体的观察，他在《我为何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中，发出这样一个祷告：

“恳求上帝，不要让这个年轻、浮躁的改革宗运动，成为历史上另一个无知、自恋、比酷的时尚”。

267

啊，我本来是要讲述，路德的后裔是如何背叛因信称义的。让我理一理我的思路：

在加尔文的属灵后裔中，他们面临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因着奥秘的一面，和面对这奥秘的灵性挣扎，都获得了一种精确的神学表达，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一种理

性主义的律法主义。

而在路德的属灵后裔中，因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路德的灵性之路，并未完成一个完整而持续的神学表达。于是，火焰升高，海水退潮。敬虔主义，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继承了路德所走过的路。在启蒙运动之后，一部分敬虔派人士，忽然发现，启蒙运动本身为他们的灵性之路，提供了另一种神学表达的可能（信仰的伦理化）。或者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灵性之路，为对抗启蒙运动的挑战，提供了另一种与之对抗的护教学（信仰的经历化）。于是，路德宗透过敬虔主义的桥梁，一跃成为18-19世纪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

268

我的沉思，似乎一直对自己（改革宗）很严厉（很多喜欢或不喜欢我的人，都亲切地表示不满）。

好了，现在，我要说出一个对路德的属灵后裔的严厉评价。新教世界的第一批叛徒，主要来自路德宗地区。这批才华卓越的叛徒，在16世纪的激进的重洗派和敬虔主义的弟兄会中得以酝酿，最终在17世纪后半叶初露端倪，到士来·马赫，可以算正式倒戈。到康德和黑格尔，则基本完成新教改革的异教化。

269

最终，世界信义宗联合和天主教会，在1999年，发布了一份《有关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其中宣称，经过艰难的对话，“我们在称义教义的基本真理上已经达成共识”，尽管还有“彼此在阐释上的其他差异，但已不再构成教义上彼此谴责的机会”。

这就是说，路德最核心的教导，在他的后裔眼里，只是与天主教会之间“在阐释上的其他差异”。基于这种“其他差异”的定位，天主教会也撤销了当年天特会议上对新教改革的咒诅。

270

这是对路德的一份平反，教宗不再谴责路德，但原因是“其实你并没有反对我”。

可悲的是，现在路德的后裔，已没有勇气说，要么请你改变自己，要么请你继续谴责我吧，因为我真的反对你了。

271

这份联合声明，签署于当年的10月31日。表明这个日子从此以后，对双方而言，都不再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而仅仅只是万圣节了。

272

而在改革宗内部，自17世纪以来，人们最大的争论都围绕着阿民念主义。直到英国教会，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分裂，即卫斯理与怀特菲尔德的分裂。

到2006年，卫斯理的属灵后裔，即世界循道宗协会，成为新教改革的另一个叛徒。他们说，“我们接受马丁·路德和改革宗的传统”，但也认同路德宗和天主教会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当年7月23日，他们与上述两方共同签署了这个声明。

273

唉，一位上海的牧师这样说，这好比有人建了一个群，结果群主却退群了。

宗教改革，到如今，成了一个群主退群的运动。

不过这也是很多当代的改革宗人士，重新喜欢路德的原因之一。

因为现在，路德是我们的了。

中国的路德



274

1823年，英国伦敦会差遣的宣教士麦都思，用娴熟的中文写下一部《三字经》，其中阐明因信称义的福音，并宣称，“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这是宗教改革的福音信仰，闯入中文世界的一个开始。

1868年，监理会的宣教士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出刊301期后，更名为《万国公报》，从教会刊物变为文化刊物。到1889年，再变为“广学会”，长老会宣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其中。

这一进程，标志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宣教士在华传教的一个重心转移。其一，欧美的自由派神学逐渐压倒古旧福音的焦点，来华宣教士群体逐渐受母会影响，更加看重基督教之于社会、文化及政治的影响。既要带给中国人福音，也要带给中国人自由。既要传扬基督的福音，也要传扬西方文明，成为众多宣教士的渴望。进而，这两个目标开始在世纪之交融为一体。其二，在庚子事变后，不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救亡压倒了启蒙”。对西方宣教士来说，文明与野蛮之别，也压倒了信与不信之分。

宣教士群体这一从福音到文化的焦点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大夫的戊戌变法。有意思的是，恰恰是从《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等人的工作开始，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事迹，开始被中国士大夫阶层广泛了解。在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路德是西方文明崛起之枢纽。他认为路德比近代西方任何其他人物，都更为重要。“新教出而旧教殆”，才有近代思想与技术的喷发。

流亡期间的康有为，十分相信是宗教改革催生了欧美的政治与社会进步。因此，他写下《孔教之路德》一文，倡导中国的出路，第一，是须以儒家为国教。第二，是须有一场孔教的宗教改革。在他看来，这正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必须先有宗教的复兴，“新教出而旧教殆”，才能有政治的革命。

可是，如果孔子是中国的耶稣，那谁是中国的路德呢？

277

梁启超，既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李提摩太的秘书。他直接宣称，康有为便是孔教的路德，意图以孔教的复兴，催生中国复兴之路。

278

1906年，康有为游历德国，参观路德翻译新约圣经的书房，写下两首《颂路德》。其中一首说，

兵垒翻经十月中
板扉木榻匿英雄
若无护法强侯在
早与呼斯滑洒风

呼斯，即约翰·胡斯。康有为的意思是，假设没有德意志选侯的政治庇护，路德也终将成为另一只被烧死的天鹅。南海此诗，显然以路德自况，叹息在大清，没有慧眼识英雄的王侯，自己最终难免是一个失败的路德。

279

与此同时，教会仍在中国的草根中默默生长。与知识分子们的这一切挣扎，两不相干。

1900年的拳乱，对在华宣教带来两个剧烈的变化。加速了上述从福音焦点向文化焦点的转移。

其一，是大批19世纪中期来华的宣教士殉道。其中许多人已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带着19世纪中期的神学痕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福音的再发现”这一宗教改革的后裔。因为19世纪中期的宗派大爆炸，及19世纪末期自由派神学的泛滥，对这一在华宣教士群体的影响，还不是致命的。

一方面，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庚子事变后的短短十年间，来华宣教士的数量，就远远超出被杀宣教士的总和。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基督教在华宣教的大换血。在1900年后来华的宣教士，在整体上开始倾向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宣教士之间，在宗派与神学上的争吵与争战，也逐步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

280

第二个剧烈变化，往往未引起教会史家的注意。就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本土教会精英，几乎毁之大半。虽然被杀信徒的总数，并不算太多。然而，中国本土牧师的数量和比例，却在1900年后急速下降，之后差不多花了近二十年，才恢复到拳乱之前的水平。

281

事实上，在未来将影响中国教会一百年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是1900年前后的世纪婴儿。他们还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登上福音的舞台，被主兴起，扭转外国宣教士的自由派倾向。

在庚子事变中，出生于东交民巷、美国大使馆中的王明道，是北方教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但是当年被逼自杀的父亲遗腹子，也可算是19世纪中国教会的遗腹子。

在南方，受庚子事变影响较小的福建，成为了另一个本土领袖的发源地。在某个意义上，一是因为教会领袖的大量殉道，二是因为宣教士的工作战略性地转向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三是因为民族救亡的危机，产生了排外和自立的民族主义；20世纪初的中国教会，忽然进入一个本土的平信徒时代。

283

而中国教会的平信徒，是喝19世纪来华宣教士所喂的奶长大的。他们的三字经，就是“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

在20世纪上半叶，稍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几乎有了两个不相干的基督教。一个是“20世纪的基督教”或在知识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医疗乃至政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另一个是“19世纪的基督教”或在草根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然而最终，这个基督教却在中国20世纪一切最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存活了下来。

285

这两个基督教，简单来说，就是吴耀宗的基督教，与王明道的基督教；或金陵神学院的基督教，与华北神学院的基督教；或“学联会”的基督教，与“青年会”的基督教。最终，在1949年后，就是三自爱国的基督教，与家庭教会的基督教。

286

这一分别，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那时，康有为所梦想的“中国的路德”或中国的宗教改革，至少是小规模地来临了。“山东大复兴”后，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被主兴起，逐渐取代了在华宣教士群体，一跃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

稍晚于美国的基要派，中国教会也产生了自己的基要派运动。并且远早于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中分离出来，山东的华北神学院就从号称“中国的普林斯顿”的齐鲁大学神学院中分离了出来。

287

要言之，在过去一百年，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大逼迫和大巨变。

一次是1900年的庚子事变。19世纪的来华宣教士，多为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后裔，福音在他们那里，是清晰、古旧和肯定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和科学主义，几乎全面侵

蚀和占据了西方教会。在20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宣教士中间，福音逐渐变得混杂、多元而失去了焦点。

然而，经过庚子事变的苦难，中国教会在1920-40年代，兴起一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和传道人，他们以朴素的神学和信仰，承继了19世纪英美宣教士所带来的那个“我信之，必得救。我怀疑，主弗救”的福音。

并且，与他们同在的，也仅有圣灵的大能，并无康有为所期盼的“护法强侯在”。

288

随后，到1949年，教会迎来第二次大逼迫与巨大变时，这批本土的传道人和基要派教会，成为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在中国所留存的种子，也形成了最近六十年传统家庭教会的主要部分。

289

回到500年前，第一批新教徒，常常面对来自罗马教会的、一个尖锐的质问和奚落：

“在马丁路德之前，教会在哪里”？

路德的回答是，在福音中。

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当那些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聚集在一起，传扬福音，崇拜上帝并施洗、掰饼的时候，他们被称为“福音派”教会。

290

加尔文更清晰地给出了“教会在哪里”的另一个回答，是在圣经中。

因此，在宗教改革后，那些相信圣经是唯一的至高权威、

重新以圣经来教导我们归正、学义的教会，被称为回归圣经的教会。

291

以此观之，宗教改革结束了吗？无论在哪里，基督的恩典没有藉着十字架，被置于一切信仰生活的中心，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里继续；无论在哪个时代，上帝的荣耀若没有藉着圣经无误的话语，而成为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根基，宗教改革就没有结束，而必将在那个时代继续。

292

宗教改革在今天的继续，或教会在今天世俗时代的出路，就是回到起初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这两个回答：

唯独上帝主权恩典的福音，而不是我们的敬虔、美德和善工使我们得救；

唯独基督十架的宝血本身，而不是我们俗世的成功、事工的果效和神学的正确，是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坚固保障。

293

换言之，教会唯独从福音而生，也唯独从圣经而生。

294

1949年后的中国，宣教士被尽数驱赶出去，无论是基要派的，还是自由派的。而在本土教会中，自由派投靠了无神论政府，基要派则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教会在中国，再一次经历了唯独从福音而生，也唯独从圣经而生的轨迹。

在某个意义上，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一代领袖，如同集体的路德。王明道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代表。他以一个人的良心，几十年的牢狱，对抗了整个帝国。

经过内战之后（费正清称文革是中国的第五次内战）三十多年的复兴，老一辈为主坐监的传道人，逐渐被主接回天家。今天，改革宗神学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广泛传播，使教会开始思考“教义、教会、教制”这三大议题。似乎标志着中国教会的福音再发现，进入了以加尔文为代表的第二代改教家的时代。

长老会 的 真正 秘密



296

C. S. 路易斯说，有位先生，礼拜天不去教会，他的崇拜礼仪，是早上起来，收拾后庭花园，剪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露天椅子上，享受这份宁静的时光。

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必定穿上礼服，系好领带，仿佛出席最荣耀的庆典。

路易斯语带讽刺地说，因为这位先生，曾经是长老会的信徒。

297

《历代志下》2章2节，描述所罗门王修圣殿：

“所罗门就挑选七万扛抬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三千六百督工的”。

掐指一算，大约平均41个人，需要一个督工。这不是选长老的当然比例。不过，无论41个人设一个监工，还是一百人设百夫长（这现代连队编制也相似），都表明当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就需要结构和搭配。这时，人群就必须产生带领他们的领袖。

298

在某个意义上，宗教改革是一场关于权威的革命。

首先是灵魂的权威，是圣经，还是教会，才是衡量是非、和蒙享救恩的最高权威？

灵魂的首要问题，是权威问题。你不能抽象地问，什么对，什么错？而要问，谁告诉我什么对，什么错？又应该由谁决定是谁来告诉我？

299

对亚当和夏娃来说，顺服或堕落的问题，就是到底由上帝告诉我对与错，还是由那条蛇告诉我对与错？或者是由那条蛇来告诉我——我应该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告诉我对与错？

撒旦建议，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以为人类带来对错判断的能力和标准。

因此，始祖犯罪，不是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神，而是以撒旦的声音为神。

300

堕落的意思，就是最高权威的失落。上帝以外的声音，成为灵魂的权威，就是堕落。

301

改教家发现，“回到圣经”是唯一的解决权威失落的道路。接下来，教义的改革，必然产生教制的改革。灵魂的权威，必然落实为身体的权威，和组织的权威。

302

一旦上帝和祂的话语，是最高的灵魂权威。一旦教会因基督的代赎而成为复活基督属灵的身体，教会的政体，就必须和首先是君主制。即以基督为唯一的元首。唯有基督可以统治教会。

303

通常所说的，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之别，其实只是第二层的教制区分。这三种教制，尽管各有优劣，但都可以是合法的教会治理。也就是说，长老会精神的第一点，并不是坚持只有长老制才是合法的教会政制；而是坚持一切教会政制必须反映基督的君主制。换言之，对长老会来说，关于教制的最重要的设问，就是“什么样的教会政体，最能反映基督的君主制的统治”？

304

改教运动的两个核心原则，“唯独基督”和“唯独圣经”；必然落实为教会政制的两个核心设问。

如果说，“唯独基督”，意味着教会是一个君主国。教会首先是君主制的。即以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那么，“唯独圣经”，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法治国。即以圣经为教会一切权柄的

来源及其限制。这意味着教会必然是宪政（宪法）主义的。

305

因此，对长老会来说，关于教制的第二重要的设问，就是“什么样的教会政体，最能反映唯独圣经的法治”？

306

归根到底，约的神学，产生约的治理。

307

而约的治理，必然带出一种法治的特质，特别是在西方教会（拉丁教会）的传统中，形成一种法理性的文化。

因此，下列这些词汇，不仅是长老会，而且是整个西方教会的教会政制的特质：

法治，宪章，合议，诉讼，程序，法庭，良心，誓言，等。

308

而在新教的现代各宗派中，长老会仍是继承这一教会政制传统最明显的宗派之一。

309

具体而言，长老会主义者认为，第一，君王是一切教会治理的根本；第二，法治是一切教会治理的形式；第三，合议是一切教会治理的原则。

其次，长老会主义者认为，长老会在教会历史上，是最符合和融合了这三个方面的教会政体。

简而言之，长老会主义的秘密，并不是议会制，而是混合政体。

310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古希腊众多城邦的治理，将城邦政体归纳为三种基本形态：一个人单独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共同统治的贵族制，和多数人自我统治的民主制。

他又将非法的君主制称为僭主制，将非法的贵族制称为寡头制，将非法的民主制称为暴民制。

311

早在希罗多德，就认定某种混合的统治才是最佳的统治形式。此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人，几乎都赞许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最终结论是，“凡能包含较多因素的政体总是较完善的政体”。

312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古希腊政体思想，基本上被基督教所吸纳。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不用说了，因为他几乎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奎那说，“一种由这些政体（指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和僭主制）混合成的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而在改教运动中，这一混合政体思想被加尔文全盘接受，他明确地声称，“最好的政体就是最混合的政体”。这一从古希腊到大公教会一脉相承的政体思想，就是长老会主义的核心精神。

313

所以，另一个对长老会主义的普遍误解，就是简单地，将主教制对应世俗的君主制，将会众制对应世俗的民主制，而将长老制对应世俗的贵族制。

314

其实，长老会的真正秘密，是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的实质是混合政体，而不是简单的议会制。

而这一教会政制的实质，就是唯独基督和唯独圣经这两个改教原则的落实。

315

正因为基督为王，地上的王是代王，不是真王。地上的贵族，并不是真贵族，而是基督所指定的盟约代表。地上的会众，也不是主权者本人，而是主权者的身体。

所以，主教制、议会制和会众制，只是一种治理工具。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如果离开了基督的统治，出错犯罪的几率都在同一个级别上。

就是为什么“混合了最多特征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的原因。因为纵然人心全然败坏，但任何一种治理工具，都可如陇沟之水，在君王手中随意流转。

316

长老会的精神，指向一个真正的理想国，即一个上帝之下的法治国，而不是人民主权的共和国。

这就是清教徒中的激进派克伦威尔的错误。他杀死了一个国王，他的手下有人建议，将主祷文中的“Your Kingdom”改为“Your Republic”。

317

让我借用一个术语，来描述长老会精神：

长老制的实质，是“君主立宪”制。但不是“虚君立宪”，

而是“实君立宪”。

更准确地说，是“君主立宪的代议制”。

318

因此，在长老会中，主任牧师代表了君主制（或主教制）的特征，当必须由一个人在世界面前代表整间教会和整个议会时，或必须由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代表一间教会承担属灵责任时，那个人就是主任牧师。在他的呼召中，包含了对教会而言最重要的教导圣经和施行圣礼的权柄。“牧职的独立性”，反映了君主制非民选的特征。

长老会议，则代表了议会制的特征。教会的治理由众长老“联手执行”。在某个意义上，众长老构成一个“集体君主制”。主任牧师，只是作为议会中的一员，而成为“平等中的首席”。

而牧师和其他长老（包括执事），都由全体会众投票产生。这又代表了民主制（会众制）的特征。上帝对一个人的内在呼召，透过会众的选举和罢免，得到印证。“牧职必须由会众呼召”，反映了民选的特征。

319

当这三种政体特征，混为一体时，就是长老会。我之所以不认为主教制和会众制是更好的政制，不是因为主教制因素和会众制因素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的混合程度不够。

320

事实上，主教制中，仍然包含了议会制因素，因为主教会议一直存在。但主教制的意思，是主教大于主教会议，反映了主教制因素完全压倒了议会制因素。

而在一切会众制中，主教制因素也十分明显。但议会制因素过于薄弱。不过在改革宗浸信会中，会众制、议会制和主教制的

因素都十分平衡。和长老会相比，唯一的不同，是议会制因素被限制在了堂会以内。

天主教会恰恰相反，议会制因素仅限于堂会之间。而长老会之所以被称为议会制教会，是十分贴切的。因为在长老会中，议会制因素不仅反映在堂会内部（与改革宗浸信会相似），而且反映在相同地区和不同地区的堂会之间（与天主教会相似）。

321

换言之。长老会作为一种混合政体，与其他两种治理传统相比，议会制因素的确是其最突出而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

322

至于弟兄穿西装，打领带，或姊妹常年穿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唉，与其说这是长老会的特征，不如说这是十九世纪撒克逊人的文化。

尽管像我这样出生粗野的人，是何等欣赏这样的文化。

思想截句

折磨灵魂的，都是家里人



01

加缪问，为什么人类存活下去，比人类灭绝还更好？

无神论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荒谬的。凡事荒谬，常常悲伤。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的态度。

如果你开车遇见一个老太太在前面，或者停下来让她，或者开过去压死她。加缪说，这两种选择都是荒谬的，都没有必然如此和必须如此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讨论自杀。

02

今日的教会，何时在向社会大声疾呼，指责罪恶。教会在何事上抵挡着这世界的黑暗，直到流血的地步？教会何时能让自己的邻居可以藉着这光，看见另一个世界的荣耀，圣洁，公义和慈爱？

——主啊，怜悯我们，穿过我们。

03

你的儿女常看见的，却是罪恶在教会内部蔓延、发酵，撕裂家庭，撕裂同工，撕裂我们与神的和好。我常听见的是撒旦在这群他称之为“病人”的基督徒中，发出狰狞得意的笑声。

——主啊，奋兴我们，让世界来模仿我们，而不是我们模仿世界。

04

一位牧师说，服侍主二十余年，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事。

因为世界已经不能让我痛苦了。这世上最坏的恶人，也不会令我痛苦。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让我的灵魂痛苦的能力。世界只能折磨我的身体，也许还包括了精神和心理状况。但世界绝不能折磨我的灵魂。折磨我灵魂的，都是家里人。

05

对一个真信徒来说，你的心灵和情感，在一家公司中所受的磨难，绝不会比你在教会中所受的心灵和情感的磨难更大。

因为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的心灵为之受苦。而公司不过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它不能代表一种更美善的生活方式。因此它不配令你痛苦。为世界而痛苦的人是可怜的。

06

唯有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唯有教会，是一种更美善的生活的盼望。

也就是说，唯有教会，配让你受苦。最让我们受苦的，绝不能是教会以外的人，而应该是教会以内的人。凡儿女长大时，第一个为他受苦的，是生身父母，而不是三姑六婆。

最让你受苦的，是你的家里人，而不是外人。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这就是主的意思。你信靠祂，就要为祂的教会受苦。为祂所爱的人受苦。

——主啊，我们不配，但因着你的儿子，我们已得着这殊荣。

07

因为浪子回家时，父亲呼召全家人进入庆祝的盛宴。

甚至一只羊，一块钱被找到了，也会进入庆祝。问题是，庆祝所花费的钱，其实已超过被找回来的东西。也就是说，用这些钱，完全可以再买另外几只羊了。

我们也是如此，上帝为拯救我们所花费的，已远超过我们本身的价值。

基督徒一直在辩论，特别是最近一百年：到底“基督为谁而死”？

有人以为，若基督是为世人任何一个人而死，包括那终究沉沦的地狱之子；那么，基督的救赎之爱，似乎会显得更为广大，不可思议。

然而，他们忘了，真正不可思议的爱，不是被外人折磨，而是被家里人伤害。

——福音之爱，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外表上，他是被“家里人”折磨至死的；而且在动机上，基督也是单单“为着”家里人而受死的；也就是为了那些“父所赐给子的人”。

折磨灵魂的，都是家里人——这恰恰是福音的逻辑，和福音中一个鼓励我们的应许。

第一，福音意味着，爱一个人，就是容许那个人来折磨我的灵魂。爱，就是承受来自最亲近之人的伤害。

第二，福音意味着，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至于羞耻的。折磨将转为喜悦，就如在十字架上，死亡转为了生命。污秽转为了清洁。

然而，罪人的心，就是自欺的心。

除了圣灵的能力，没有谁有能力让我看见自己的自欺。也没有谁有能力，让我敢于去品尝，爱一个灵魂给自己的灵魂所带来的伤害。

11

一个普遍的观察：

姊妹之间发生冲突，即使涉及到教义差异，也会最终呈现为关系和情感的冲突。

弟兄之间发生冲突，即使只是关系和情感的冲突，也会最终呈现为教义的分歧。

12

我们总是软弱的。但爱就是给软弱一个空间。如一位弟兄曾经的名言，“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因此，一位牧师说，意见一致做同工伙伴，意见不一致做生命挚友。

成都诗人石光华，嘴里有句常语：我说不过你，但我恨你！

试着把这句话应用在弟兄姊妹身上：我说不过你，但我爱你。

13

俄罗斯作家舒特说，

“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

反过来呢，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也像扣外套的纽扣，其实第一颗就扣对了，但非要扣到最后一颗，我心里才踏实。

14

基督徒，就是迷上基督的人。迷上基督，是最安全的，因为你不会再迷上任何受造之物。也就不会允许任何受造之物，来折

磨你的心灵。被主呼召是最安全的，因为你名花有主了，就不会活在对其他花朵的嫉妒与不平中。

——主啊，让我从此，像保罗一样说，谁都不要来搅扰我。

15

20年前，曾反复聆听陈百强的歌，《一生何求》。

直到10年前，大卫的歌，终于给我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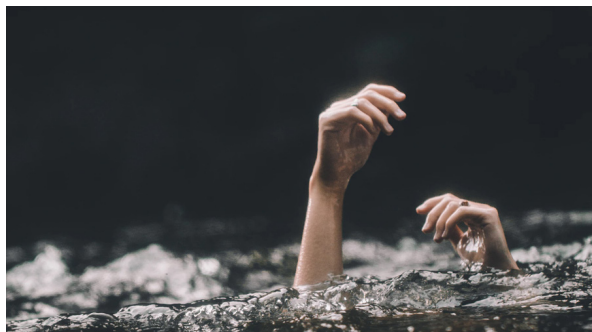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 27:4）

思想截句

哦，我又中了自己的
诡计！



01

“相信我自己”。这句响亮的话，其实是爱默生的名言。在1860年后，康德的哲学，在美国，与清教徒传统结合后，催生出了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正如100年之前，在德国，康德的哲学与敬虔派传统结合后，催生出了主观宗教主义者施莱马赫。

02

今天，有数以万计的基督徒，浑然不觉，其实自己是爱默生和施莱马赫的门徒。当他们骄傲地说，“相信你自己”。其实他们说的是，“相信爱默生”，“相信施莱马赫”，“相信康德”。

03

《卡萨布兰卡》中，有一句最浪漫，最加尔文，最预定论的台词。因为，世界上只有最预定论的事，才是最浪漫的事。

——在那扇窗前，亨弗莱·鲍嘉与英格丽·褒曼彼此凝神，他喃喃自语，“全世界有那么多城市，城市里有那么多俱乐部，可她偏偏来了我这里。”

——哈里路亚，她偏偏来到了我这里。

04

一个老套的句式，在波士顿附近，随便丢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作家。

在改革宗教会，随便丢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拉比。

——然而，主啊，你要丢多少块石头，才能砸中一个在你面前下跪的人？

05

哦，我又中了自己的诡计。在谦卑时骄傲，在认罪时自义，在跟随主的路上跟随自己。当顺服的时候，我反抗；当反抗的时候，我顺服。我称之为的良心，反复地欺骗了我。当需要它成为检控官时，它是一个辩护律师；当需要它辩护时，它成为了一个检控官。

06

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争，用一组关键词来表述，即“联合”和“独立”之争。古典之人的特质，是他们希望联合，胜于独立。他们最大的焦虑，是对联合的不安全感。现代之人的特质，是他们希望独立，胜于联合。他们最大的焦虑，是对独立的不安全感。对古典之人来说，联合受到威胁时，个人价值就受到威胁。对现代之人来说，独立受到威胁，个人的价值就受到威胁。

07

“联合”的团契神学；在教义上，表达为公认信条的权威；在政治上，表达为共和主义传统。后一种特质，在神学上，表达为“邀请耶稣进入你心中”或“我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的个体神学；在教义上，表达为个人解经亮光的权威；在政治上，表达为民主主义传统。

在暂且仍被称为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主要是前一种特质，塑造了右派美国；主要是后一种特质，塑造了左派美国。

08

C. S. 路易斯说，那些不曾在自愿的、对他人的顺服中，经历到尊严和自由的人，其实都是野蛮人。与通常的见识相反，路易斯认为，内心的顺服才是文明人的标志。

但一个世俗时代，带给我们最大的诱惑：不是渴望通过对基督福音的顺服，来定义自己作为门徒的独特性；而是渴望用自己的不同意，来定义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性。

换言之，世上有两种奴隶，一种外表顺服、内心不顺服，另一种外表和内心都不顺服。而自由人的标志，是他的外表和内心都活在顺服中。

这是福音最不可思议的应用：福音意味着，其实在奴隶制社会，也有许多自由而尊贵的灵魂；其实在现代社会，也充斥着大

量丧失自由和尊严的奴隶。

09

唐纳德·伽瑟睿 (Don Guthrie) 说：对这世界的结局，我们是一群有内幕消息的人。我们要像一个有内幕消息的人那样活着。

一方面，启示，使我们成为知情人。另一方面，我们仍活在自我的蒙蔽中。换言之，罪就是对抗启示。

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已不再是我们的“曾经”，但我们尚未达成我们的“将来”。

关于将来，唐纳德区分说，“未知状态”和“两可之间”是不同的。对世人来说，未知，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在两可之间。但对信徒来说，明天的一切仍是未知，但那未知的一切，已不在两可之间。

10

一位姊妹回忆说，多年前在慕道班，有位朋友模仿尼采的口气宣布：

“上帝死了”。

——这位姊妹忍不住问他：“你的上帝什么时候活过”？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假装自己活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

11

一些朋友也曾对我说，我不相信你们那个上帝。

我问，你说的“我们那个上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下一个定义？什么叫上帝，怎样的上帝？

每次，等对方说完，我就会非常快乐地宣布：其实我和你一样，因为我也不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上帝。

12

特土良承认：他生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悔改。

这表明，悔改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足以耗尽我们的岁月。因为我们的罪，总是与恩典躲迷藏。以前看川剧的变脸，每一张脸谱扯下来后，最令人惊讶的，是到底下面还有几张脸，还能扯几次？

悔改若不来源于恩典，并在本质上被恩典决定；悔改就是不断变脸，是自我完善的诡计。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都不是重生，而是情势使然。

默想 信心



01

信心就像一位医生，在强壮的病人身上，发现了死亡的气息。给一个蒸蒸日上的世界，开出一份死亡通知单。信心又像一位验尸官，在死人身上，发现了复活的迹象。又像一位气象学家，在寒冬的深处，宣告春天已经来临。或像一个盲人，摸着一只被扭断了脖子的公鸡，大声喊到，天已经亮了。

02

信心就是发现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事的蛛丝马迹，信心就是在提心吊胆之中，看见天国存在、基督活着的确据。信心就是冒险去相信这个世界是死的，相信这世界又臭又硬，而上帝又真又活。

03

逼迫不是这个世界逼我们喝下雄黄酒，而是我们逼这个世界露出原形。我们受苦，世界就变成了野兽。我们被害，世界就变成了杀人犯。我们顺服，地狱的火就堆在了仇敌的门口。我们多走一里路，多背一公斤，骆驼就被最后一根羽毛压垮了。

04

逼迫就是上帝逼着我们相信恩典，逼着我们离开舍不得离开的世界，逼着我们与凯撒的朋友绝交，逼着我们默想死亡，逼着我们写好遗嘱、把儿女交给耶稣，逼着我们与弟兄姊妹和好。

05

逼迫就是上帝逼着我们与世界一刀两断。所以，保罗将信心和逼迫，视为基督的两大赏赐。

06

主啊，趁着我们还没有成为中产阶级化的教会，趁着无神论的专政者还没有垮台，趁着会堂里还没有坐满官员和企业家，整死我们吧，逼迫我们吧，赶鸭子上十字架，好叫城市教会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亏缺。

07

信心不是我们献给上帝的礼物。而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

在人与神的惊心动魄的相遇中，信心，按着上帝主权的恩典，赐给了那些不可能相信的人。

08

凯勒牧师说，信心就像挡风玻璃，你的焦点不能在它身上，你不能一直关注视挡风玻璃上不干净的地方，否则你会撞车。你需要透过它，看清前面的道路。世界的真相，透过挡风玻璃被汽车里的人看见。挡风玻璃需要多干净呢，只要干净得看见前面的道路就行了。你的信心需要多纯洁呢，只要纯洁到能让你明白福音就可以了。而福音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有多纯洁，你都不配得到神赐给你的、在程度上足以使我们借以称义的信心。

09

可惜的是，尽管卫斯理兄弟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但他并不真认识信心的源泉。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写道，“主啊，我的信心是多么不纯洁，竟然还夹杂着怀疑，哦，这样下去，我永远都不配得救”。信心不是我们见主的时候，拿得出手的礼信。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刻苦的循道，只是出于骄傲，以至于骄傲。

10

为什么唯独主配得赞美呢，因为尽管卫斯理兄弟并不真明白信心的源泉，但他们仍然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仆人。他们在这方面的教导充满错误，如此不纯正——假设这种错误和不纯正将导致他们失去救恩，那就无人能够得救了。但信心意味着，我们相信我们（和他人）在认知上的错误不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命运的是基督的恩典。或者说，只有这一相信，才是关乎救恩的唯一重要的认知。

11

信心不是指轻看自己，或少看自己。司布真牧师说，“信心就是脱离你自己，进入基督里面”。

12

柯志明老师，用四个汉字，表达了福音与一切宗教、特别是与儒道释文化的迥异。我很喜欢这四个字，“穷德见恩”。因为福音的实质和前提，就是道德的破产。信心需要承认自我的破灭。再加上四个字，福音的奥秘，即“穷德见恩，因信称义”。

13

信心就是相信，任何人都不是因特殊材料而得救，而是因特殊恩典而得救。不能接受好人得病、义人遭殃，本质上就是相信一种没有基督的天谴论，而不相信十字架。信心指向十字架，所以信心反对约伯的三个朋友。

14

有人骂我，“你这么傻逼，上帝知道吗”？信心就是承认前半句，相信后半句。有人讽刺说，“上帝是垃圾桶吗，什么渣子都收？我还以为上帝只收像姚贝娜那样的天使呢”。我说，如果“垃圾桶”是一个对十字架的比喻（在罗马人眼里，垃圾桶比十字架更好），那么是的，信心的奥秘，就是相信一位进入垃圾桶的上帝，和一位拯救人渣的救主（在天使眼里，亚当的后代都叫人渣）。

15

所以，一位牧师说，“基督教信仰在本质上是强盗的信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是谁？一个强盗！基督教为何被憎恨？因为他除掉了圣人和强盗的差别。耶稣除掉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差别，所以被犹太人恨恶，除掉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所以被有地位的人恨恶。同样，如果耶稣除掉了圣人和强盗的差别，基督就会被一切有道德的人恨恶。信心，就是离开有德之人，走向戴罪之身。

16

连他这样的人都可以入党，显出党的腐败。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信主，显出主的伟大。

17

信心意味着，我们承认，我们的所言所行，都是由我们的内心决定的。然而，每当我们极其强烈的认为，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由他人的错误造成的。我们的这种尽量归责于他人的模式，便极其强烈地表现出我们没有信心，并反对福音。

18

因此，没有信心的人，关心别人的罪，胜过关心自己的罪。而有信心的人，如果更深地关心自己的罪，他就更深地爱了别人。

19

信心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对善的渴望，可以变成一种恶。当它慢慢变成一种控制我的心的力量，和定义我们自己的主要方式时。因此，信心渴望基督的义，胜过渴望一切美好之物。

20

信心说，我只用十字架来定义爱。信心说，我必须开除我

内心的那个辩护律师。或者，更直接一点，信心说，十字架是天堂。

21

信主之前没有战争，我们是魔鬼的俘虏，正如囚犯与警卫之间，只有冲突，没有战争一样，因为囚犯不配被称为战士。信主之后才有了战争，我们的父亲，亲自将我们送上战场，亲自将宝剑佩在我们身上。信心就是相信，我在撒旦的黑名单上。

22

没有一人能在今生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反倒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天天违背神的诫命。这并非令人悲哀的前途，反将我们的一生，极其稳妥地、置于惟独恩典的统治之下。一个信徒若对亲人、肢体和教会失望，不是因为对方见证不好（他们的见证可能的确不好），而是他自己仍缺乏对上帝主权的恩典的真信心。

23

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真正的伦理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自杀。人若对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保持诚实，人就活不下去。一个上班思考哲学，下班关心房价的教授，是一个哲学诈骗犯。哲学的口号是：不想活的，跟我来。信心的口号是：不怕死的，跟我来。感谢主，我用了半辈子，才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异。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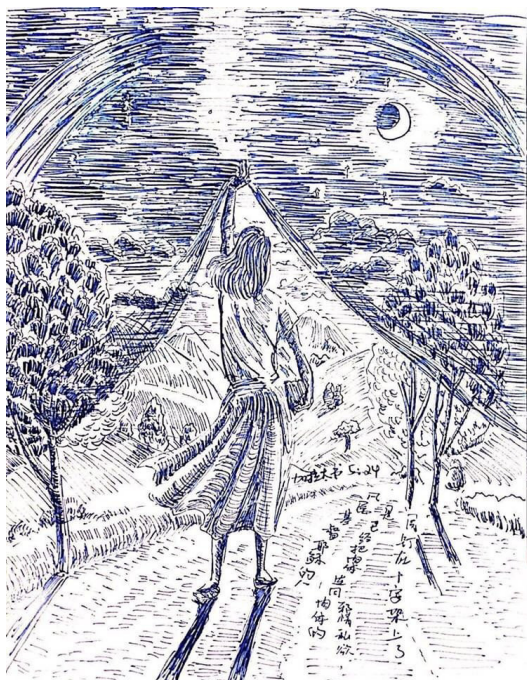
信心认为，“神的剥夺，一定是祝福”。自由的人，自由的放弃。不自由的人，不自由的防守。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在谁的面前防守，而是最终在谁的面前就范？

信心是一场防守反击。信主的人必须是一个战士。信仰必须与我们在世的全部工作紧密相连。就像抗战时，为日本人工作的叫汉奸。同样，在这末世，不为福音、倒为这世界工作的人，是犹大。

默观

庄严的

现实



01

现实是庄严的。如果现实是掌管在上帝手中。相信上帝，意味着不相信现实在本质上是混乱的。所谓混乱，总是于人而言。相信上帝，就是相信秩序。

02

不过，对律法主义者来说，相信秩序的意思，就是不允许混乱存在。因为，隐藏在混乱背后的秩序，是唯独藉着恩典，才能看见的。所以，在废墟之上看见庄严，然后俯伏在地，说，主啊，你是大而可畏、井井有条的神。这人是真信上帝的。

03

在某个程度上，自由主义者相反，他们喜欢混乱，讨厌秩序。然而，在本质上他们和律法主义者一样，以为混乱的背后没有秩序。前者为此忧伤，后者为之欢呼。对他们来说，基督或者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仍然被钉在十字架上。

04

只有那些，在信心中走完从各各他到空坟墓的，完整的福音之路的人，才会敬畏混乱中的秩序，就如敬畏卑微中的伟大，羞耻中的荣耀，和放弃中的得着。因为，这几乎就是敬拜基督的意思。

05

复活，意味着一个将耶稣杀死的世界，仍然是庄严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时刻，也没有一个地方，会比耶稣被杀死的那个耶路撒冷的下午，更混乱，更令人绝望。

06

而这个福音，对我的生命构成了一种讽刺和否定，因为我常常会夸张地认为，我目前的生活环境和遭遇，比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下午，更严重，更混乱。

07

换言之，面对一个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世界，任何对现实的抱怨，都是自大的，狂妄的。当我们说，“我受够这一切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的生活简直就是地狱”，我们就等于在拒绝或藐视救恩。因为，这些话本来应该是耶稣的台词。

08

在客西马尼园，本来应该说出这些台词的耶稣，却流泪向父祷告，“只要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在十字架上，本来应该说出这些台词的耶稣，却向父呼求，“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09

为此，恩主啊，你可以给我一间房子，也可以给我一片废墟。你可以使我处富足，也可以使我处贫穷。你在一切现实中显现，当你显现时，一切现实都无比庄严，肃穆。求你自始至终，给我不变的心灵秩序，让我庄严地生活，也庄严地死去。

09

阿们！

默想教会



“归根到底，教会必须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吃力不讨好的事。凡是能在这个世界以内得到奖赏和回报的事，或企望在基督再来之前兑现的诉求，都将削弱教会见证复活的能力。凡是在肉身和物质上，教会受到世界的抵挡和压力越大，教会在属灵的事上向这个世界施压的能力就越大。”



01

教会在任何层面上，都必须呈现出一个超越性的，在本质上属于彼岸和将来的群体的特质。换言之，就是呈现出那位复活的基督，或基督的复活。因为超越性是复活带来的。在这个必死的世界里，只有复活才是超越的。离开复活而谈论超越性，便是虚假。

02

如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盼望都是虚空。这话也定了一切不相信复活、却谈论着终极关怀、彼岸或灵魂拯救的人的罪。离开复活而谈超越性，仍然是唯物主义。超越这个世界的唯一路径，是进入主耶稣所进入的坟墓，然后走出坟墓，进入纳尼亚世界。

03

主必再来，从我们的角度看，是指有一件尚未发生的事，将来必要发生。然而对人类来说，将来的意思，就是尚未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几乎就等于不存在的事。这样，我们的信心便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主必再来的意思，就变成了有一件不存在的事将要存在。

04

因此，我们必须从基督的角度，或从基督的复活出发，去认识主必再来。复活意味着，基督将从将来走向现在。就像从一个

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将来对我们似乎是不存在的，但对主来说，却是真实的、已然的存在。就像基督自己说的，他像一个主人，先回家，把房间打扫好了，然后出门迎接客人的到来。

05

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彰显这位已存在于将来的主。如果你在等待一个人，或等待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你已经属于你所等待的那个人，或那个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呼吁和追求自由的人，在一个不自由的、专制的时代，已经预先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06

而教会所等待的，是那位正在从将来而来、并已经占据着将来的君王。因此，教会在某个意义上已经属于将来。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活的共同体。教会的这一特质，不可避免地带来她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就是将来与现在、永远与暂时的紧张，更是永生与死亡的关系。

07

因此，凡真教会所到之处，她周围的一切都将因她而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没有教会，这世上有许多事物看起来都是美好而动人的。一旦有了教会的衬托，它们便显出腐朽与可悲。在真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身边，那些短暂而昌盛的事物，都应如泥沙俱下，又纷纷剥落。

08

在教会中，一个婴孩降生，将使一切未亡之人感到时不我待。一个老人离世，将使一切在教会以外活着的人感到生不如死。因为婴孩不是从过去来的，而是从将来来的。所以教会中的婴孩，被称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意思是说，婴孩在出生之前，已经属于耶和华。他们在不存在的时候，已经存在。

09

而离世的圣徒也不是被留在过去，而是去往将来。一旦死亡，他们便不属于现在，而仅仅属于未来。因此，教会中的生与死，都是复活的国度的彰显。正如教会中的贫与富，都是对教会的超越性的试验。

10

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将来的、复活的共同体，教会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个威胁。教会必然使一切国家、一切统治者都感到这种威胁。不但如此，教会也构成了对其他一切世俗组织的威胁，使一切公司，俱乐部和协会都感到压力。一切给别人发工资和一切从别人那里领工资的人，都将因福音的传扬而活在这种压力之下。

11

在世俗组织中，你可以加入这个，或不加入那个。你不会因你没有加入的组织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你最多只是感到沮丧和失落而已。但教会不是世俗组织，而是唯一的、建立在复活之上的超越性的社群。对一切活在教会以外的人而言，教会都是且必须是一个指向灵魂的压力集团。

12

一切专制在本质上，既带着神权政治的特征，又带着唯物主义的特征。一方面，因为它强调现实的力量胜过一切，所以一切专制都是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因为它赋予了现实力量以至高性，所以一切专制都是神权政治。因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泛神学，即赋予物质或物质的力量以神性。

13

只有教会的五个唯独，才能对抗世界的唯物主义。只有复活，才是唯物主义的反义词。换言之，一切在复活之外的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力量。“世界”的定义，就是唯物主义。或者说，凡是在世界内部的追求，都是唯物主义的追求。

14

因此，沃格林在1947年说：“不容置疑的是，自由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诚实性；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主张对人和社会的内在性拯救，那么共产主义显然不过是自由主义最激进的表达方式。”

15

华北神学院的院长赫士，在1927年论及教会学校的自由化倾向时，也说，“当教授们开始怀疑神迹和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学生们就会更进一步。当教会学校也开始采纳政府批准的教材，那里面充满了反对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和心理学的价值观，这已经为俄国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16

因此，专制没有能力摧毁教会，摧毁教会的是福音及福音事工的世俗化。专制带来压力，也带来祝福。第一，它激发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它诱惑我们参与谎言，并活在谎言中；第三，它暗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第四，它最终揭露出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肉身的奴隶。

17

换言之，并不是专制使我们沦为奴隶，专制告诉我们一个属

灵的事实：“奴才是奴才的作品，暴君是暴君的报应”。在这个世界以内，我们本来就是奴隶。然而若非专制，我们将一直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18

教会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是见证自己如何“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见证自己如何“属于”另一个世界。因此，教会不能远离世界，因为远离世界就等于背叛这一使命。教会的超越性，必须在教会的临在性中得以彰显。

19

换言之，教会必须作为一个复活的群体，而临在于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以福音的宣讲进入唯物主义的一切势力范围。但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而是要在其中不断地失败。这是复活的超越性的悖论，教会越在一个死亡的世界中死，便越在一个复活的世界中活。

20

归根到底，教会必须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吃力不讨好的事。凡是能在这个世界以内得到奖赏和回报的事，或企望在基督再来之前兑现的诉求，都将削弱教会见证复活的能力。凡是在肉身和物质上，教会受到世界的抵挡和压力越大，教会在属灵的事上向这个世界施压的能力就越大。

“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是养育我们的摇篮。我们的母亲不完美。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教会不完美，所以教会充满了恩典。不委身在教会的软弱和不完美中，就无法享受在基督里的大蒙眷爱。”



01

如卡森所说，拯救这世界免于雾霾却搭上自己的灵魂，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消除色情有许多途径，在“伊斯兰国”没有那么多淫秽的东西。但在那里你也难以听到福音。因此，教会需要关注雾霾吗，需要。教会应该反对色情吗，应该。然而，消除雾霾或禁止色情，是这世界以内的理想，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02

亚当的肋旁，生出了夏娃。基督的肋旁，生出了教会。每个神的儿女，都在基督的教会中，从圣灵而生。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是养育我们的摇篮。我们的母亲不完美。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教会不完美，所以教会充满了恩典。不委身在教会的软弱和不完美中，就无法享受在基督里的大蒙眷爱。

03

准确说，上帝的确呼召祂的儿女都要在教会服事，但只呼召少数人全职服侍。教会由少量全职工人和全体义工组成。就像一个人无论工作多忙，都不是回家不照顾妻儿或不做家务的原因。所以上帝命令信徒在教会彼此侍奉，不是有余力和热心才两者兼顾。而是必须同时兼顾。只是方式、时间、恩赐各不相同。

04

保罗·华许牧师说，假教师，是上帝给那些藉着宗教满足自己肉体欲望和今生的目标的跟随者的报应。因为假教师所讲的，

正是他们所要的。台上台下，都只要主的恩赐，不要赐恩的主。只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要祂下来，好为他们今生的欲望服务。

05

因此，当代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教会不是致力于彰显惟独基督的绝对性，却一直致力于如何让自己不成为世人眼里的怪物。换言之，不是教会外的无神论者，而是教会内的宗教混合主义者，才是杀害基督的元凶。

06

主啊，我们的教会是可怜的，不完全的，其他教会有的缺陷我们也有，其他教会没有的缺陷我们也有。甚至其中还有许多的污点，许多的裂痕，许多的背叛。然而主啊，我们却抓住你的话语，大胆地宣称这间教会是基督“圣洁的国度”（彼前2:9），是你的爱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所赎买而来的。

07

你怕谁谁就是你的君王，对主的惧怕是教会的特征之一。出于信心的惧怕，意味着教会不归宗教局管，也不归撒旦管。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是与世界分别的，处于另一种属灵管辖权之下的另一个国度。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直辖市，信主就意味着进入有无数摄像头的圣灵监控范围。

08

“三自爱国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教会的仇敌。求主使温州教会从“温州特殊论”中觉醒，分别自己，归主为圣。游冠辉：政府放松的时候，那面目还蒙了一层纱；政府抓紧的时候，那层纱就被揭开了。深愿三自里真正属神的儿女能看

清三自真面目，并选择退出。主必为他们开一条出路。

09

再向温州教会进言：看不见的教产不分别为圣，看得见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与体制共谋的自治乃是假自治。如果花3000万却不能建一座教堂，固然令人悲伤。但如果花3000万，仍不能脱离凯撒的辖制那才是真悲剧。教会若不能激烈地持守独立的属灵地位，激烈地保卫一间政府审批的教堂就毫无意义。

10

近年来，国家宗教政策与现状的重大转变，便是“新三自运动”的逐步形成。国内亲共的红色基督徒和恐共的金色基督徒，及海外一大批亲共恐共的牧师学者，使三自运动呈现某种起死回生的假象。正是这一新三自的崛起，鼓励当局继续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三自会一天不死，教会就当以逼迫为荣。

11

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导致争战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因为几乎所有宗教，都倾向于将日常生活，视为一场宇宙性的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担心和反感一切以宗教为名的“圣战”。他们的观察有一定道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宇宙性的争战是真实的。然而与罪恶的争战正是信仰的原因。你不能因为疾病而定罪医生或药物。

12

在圣经中，“圣战”的中心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百姓争战，祂是一切圣战的发动者。祂解除以色列的优势，免得事后他们赞美自己。“圣战”一定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圣战”的最高峰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一人胜

了全世界；这是以弱胜强的典范：基督放弃祂的能力，通过受苦和被杀赢得胜利。哪里没有十字架，哪里就会充满以宗教为名的假圣战。

13

“为基督赢得城市”，这也是一个军事化的圣战用语。信主就是参军。而很多基督徒对受洗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信主就是退休。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缺乏士兵。而是军队里充满了一群不打算受伤的官兵。他们参战的最高目标就是避免让自己受伤。而今天的教会中充满了这样的信徒。

14

换言之，唯一防止我们诉诸暴力的方法，是坚持它只有在源于上帝时才是正当的。非暴力的实施，必须建立在相信上帝会有神圣的审判上。失去了上帝会报应的信仰，暴力才在现代社会秘密地滋长。不相信上帝会审判人，我们就当拔剑而起。相信宇宙中超验的公义，已在上帝本人的受难中得以成全，人类才能走出报复的漩涡，走向爱与和平。

15

对三一论的认识，将塑造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也更新我们对教会的委身。信仰在本质就是团契的和历史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因信进入救赎历史中、有差别和次序的圣而公之团契。因此，我必须说，“信耶稣就是建立你与耶稣的个人生命关系”，这是一个违背圣经的、简化而错误、却很流行的教义。

16

杨腓力说，神父或牧师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视自己为答案的提供者、属灵的权威、恩典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在另一方面，信徒或读者也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不视神的仆人为答案的“二传手”、属灵权威的中介或恩典施予的管道，而仅仅视其

为一个陪伴者和建议者。事实上，这是当代更普遍、且政治正确的属灵风气。昨天和一位传道人开玩笑说，后现代的牧师常常需要故意贬低自己，来讨好会众。

17

读到一篇《基督教全国两会“畅谈中国梦”座谈会摘录》，十六个人的发言记录，只有一个人提到一次圣经。这些假教师的名字要记下，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林前5：11）。然而，主啊，我们要伤心到几时呢。倘若可行，把我交给尼布甲尼撒手上吧。

18

忽视信仰与政治之冲突的基督徒是犬儒的基督徒。不谈公民伦理的职业伦理，是犬儒的职业伦理。教会在本质上挑战一切政治共同体，也挑战政治共同体内的一切成员。挑战的主要方式就是受苦。当别人煽你耳光时，就证明你对他构成了挑战，当你承受这个耳光并为他祈祷时，你就足以使他生出杀心。

19

今天去教会晨祷，社区一位警官和两位协警贴身同行，现在守在小区门口。神的仆人，被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器重。因神的儿子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头上写着，犹太人的王。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一周前，许宏弟兄告诉我，国际基督徒记者协会，就以彼拉多的这句话为协会的宗旨。

20

教会是信仰的试金石。文化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死。真正的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活。——访谈刘同苏牧师

21

最邪恶的人不是违背后六条诫命的人，是违背前四条诫命的人，最邪恶的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传道人，不照着圣经传讲福音的传道人，和侍奉主不认真的传道人。比该亚法更邪恶的是犹太。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南海，而在神学院。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央电视台，而在教会的讲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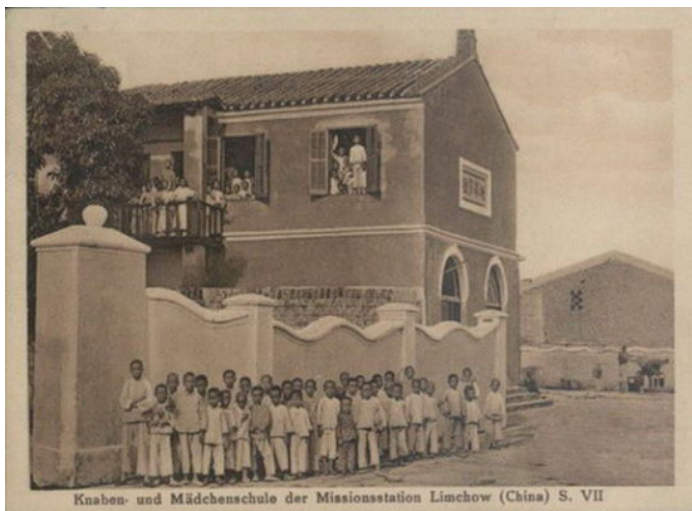
22

我们必须承认，大陆人缺乏教养，因为大陆人缺乏真实的公共生活的经验。所谓教养，就是惟独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养成和表达的对邻舍的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对基督徒来说，天国的真实彰显，就在作为圣约共同体的教会生活中。

23

昨日在外地，主日崇拜遇到骚扰。带头的人说，我是宗教局长。我说，你相信上帝吗？不信上帝，怎能当宗教局长呢。你们管人什么时候出门被车撞死、什么时候得癌症吗？不能管，怎能叫宗教局呢。不是我跨地区传道，是你捞过界了。教会才是上帝在中国设立的宗教局。你我的相遇，是两个“局长”的相遇。

默想公立教育



01

公立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儿童的共产主义，主张儿童是国家的公共财产，国家在儿童的思想、信仰和灵魂上，要求与其父母均分掬物，共儿共女。从而否定了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政府，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的灵魂的监护权。因此，强制性公立教育的动机和结果，就是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宗教。

02

我祈祷，让教会有勇气宣告，国家是教育的代理者，而不是教育的主权者。

03

什么是古典教育呢。有人说，古典教育最在乎的，是把学过的知识忘完了之后，还剩下的东西。

04

《塔木德》中这样说，即使为了重建圣殿，也不应中断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学生的城市将遭毁灭。为了缴纳学费，可以卖掉一卷“妥拉”。

05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歌罗西书 3:20）。这里赋予父母教育圣约子民的责任，凡事听从父母（在主里），不是凡事听从政府。另一处：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 6:1-2, 4）

06

司布真牧师曾说，“真正的贵族是信靠耶和華的人”。所以教会学校就是贵族学校。教会学校也是贫民学校，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少数家长的梦想而存在，而是为了基督的教会而存在。

07

政府绝对不能僭越权限，执掌祭司的权柄。就算它可以兴办一些世俗的、职业训练的教育，它也决不能兴办或插手有上帝的道在其中的教育，因此也不能垄断对人民的教育。政府无权凭借上帝的道来办教育，因为一旦你的教育观念，是认为教育必须包含上帝的话语，那这就是教会的属灵权柄，而不在属世的刀剑权柄的范围内。这意味着教育包含了“驯化君王”的责任，而不是被君王驯化的目标。

08

今天，国家的梦想或我们对国家的梦想，都是“从摇篮到坟墓”，希望国家能够眷顾每个社会成员，就像天父眷顾我们一样。这就是世俗国家的福利主义。可以称为国家的“护理”教义（Providence of Government）。因为我们对国家的期待，已经几乎变成了对天父的期待。“我们在中南海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学校，如同行在政府。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公立教育的谎言或对公立教育的期待，就是这个国家的“护理”教义的一部分。

09

一些基督教学校用全英语教学，这不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而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教育。是在福音中对这个民族的残忍的抛弃。

10

中国的教育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似乎在知识上是过于权威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并不相信，在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背后，有真理和绝对的知识可言。换言之，权威主义在中国，仅仅只是一种教化的手段，而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确信。

世俗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本身的权威性的丧失。上了20年学，最终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现代教育的结果。就如博雅教育的另一位推动者、布鲁姆在他著名的《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所描述的，他说，“当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他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科系，各种令人摸不著头脑的课程。但是，对于他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没有正式的指导。甚至在大学中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见。大量的学生这样来到大学，希望在这里改变他们的无知状态，但当他们学习得越多时，他们便更无知了”。

我从小受教育的时候，非常困扰我的一件事，就是我搞不清楚我的老师们到底搞不搞得清楚？我的老师们对自己所教的东西是不是很确信？开始我感到困惑，然后我怀疑，最后我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不知道。

任何教育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宗教教育，都建立在它的“神观”上。现代教育的“神观”，就是无神论。因此它的人观，就是没有神、没有罪和没有来世的人观。那么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群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让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超人”。所以整个现代教育的诉求，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它也有它的救赎论，这个救赎论没有基督，它的救赎论就是道德主义，所谓救赎就是自我实现。同样，它也有自己的末世论，但这是一种时间之内的末世论。

美国从60年代开始，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政教分立条款的理解，完全走向一个政治正确的、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方向。

从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借助第一修正案，开始把基督教信仰驱逐出校园。你不能在里面祷告，不能有宗教课程。法国更严重，你甚至不能佩戴任何显眼的十字架或其他宗教标志。

15

有一次归正学堂开筹备会，苏校长问家长们，假如教会最终办不了这样的学校怎么办？家长说，那能怎么办呢？只有把孩子重新送回公立学校了。苏校长说，不。你们不能这么想。以前你们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母亲回家，生活水平下降一半，也要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这就是基督教版本的“毁家兴学”。

16

我很喜欢一位改革宗的历史神学家卡尔·楚门，给宗教改革的一个定义。他说，“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和思想的中心”。我试着将这句话，改写为“教育的宗教改革”的定义：“教育的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全部教育内容和过程的中心”。

17

在16世纪，“教育的宗教改革”的结果就是，第一，《圣经》成为教育之本；第二，圣灵成为教育之神。

18

基督教学校是什么呢？第一。它是恩典的学校。第二，它是圣灵的学校。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学校不是另一种“洗脑”吗？我说，不，你说错了。我们不但要洗脑，还要“洗心”。我们之所以说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洗脑教育”，因为它只能洗脑、不

能洗心。凡不能“洗心”的教育，就是“革面”的教育。“洗心”的教育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圣灵的教育和恩典的教育。“革面”的教育就是各种道德主义的教育。人怎么可能洗人的心呢，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19

路德有一句著名的话，在“圣约归正学堂”的简章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格言：“我担心学校将会被证明是通向地狱的大门，除非他们殷勤地讲解《圣经》，使《圣经》中的真理铭刻在年轻人的心里”。

20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到路德为止，国家从来都不是教育者，国家从来都是被教育的。被教会教育，被修道士教育，被大学教育。从来都是民间教育国家，先知教育君王。然而，到了路德之后，就变成国家教育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反对让国家获得教育权力的立场。即使我们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21

我们必须做什么呢？在基础教育中，收回父母的教育权。在大学教育中，争夺民间的导师权。

22

整本圣经，都是透过眼睛看得见的仪式和形式，去象征、预表和呈现真理。在改革宗传统中，我们称之为“蒙恩的管道”。真正的教育者是圣灵，祂来教育你，是祂赋予了这些形式背后真实的、实质性的意义和内涵。你忘记了，或你并不真的相信，基督教教育乃是超自然的教育。

10岁是一个开始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起点。10岁以下的儿童，即便故意杀人也无须负刑法上的责任，更遑论民事上的责任了。在这个阶段，父母受责备，应甚于儿女受责备。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围绕着10岁这个时间点，来培养儿童具有一个初步的民事行为能力呢？不。那只是法律上的、世俗化的和虚拟的刻度。

我们的教育并不是这一刻度为中心。譬如20岁是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可我们的教育是否能够让她在这个年龄具备可以结婚的成熟的信仰、自由、尊严和能力呢？一个可以决定和承受人生最重要的盟约关系的人，到底应该对人生、世界、上帝和自己，具备那些知识呢？她或他是否已建立起合符圣经的、也能够洞悉人心和这个世界的信仰观、价值观、婚姻观和主所喜悦的一切呢？

至少我30岁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怎么去爱我的妻子。我们的教育，是让人懂科技，但不懂爱情。懂赚钱，却不懂生命。了解身体，却不了解灵魂。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其实相当缺乏社会性。这就是为什么没读过书的人常常白头偕老，而受过教育的人的婚姻反而常常崩溃的原因。

我并不太担心我们的后代，其中的大多数人在二三十年后，仍然会相信基督，或至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仍会去教会参加崇拜。但我担心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变成一个世俗化的、自由派的，怀疑《圣经》权威性和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基督徒”。

27

对基督教来说，自由只可能是恩典的产物。自由（博雅）教育必须是保守主义的，但自由（博雅）教育也必须是以恩典为中心的。

28

把孩子一周五天送到一个被无神论者所控制的学校去，晚上不过花十分钟和他祷告，或读一段圣经，这到底是在教育孩子的灵魂呢，还是在安慰自己破损的良心呢？

29

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扩展，不但是指向外在的数量增长，而且指向我们的生命被真理得着的内在程度。我们的整个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命中的每个领域被福音翻转、占领和统治的那个程度。我们盼望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儿女的生命中持续不断的扩展，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30

文化都带着敬拜的特征，连春节联欢晚会，也是有崇拜礼仪的。教会的聚会从“宣召”开始，他们的宣召就是“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是唱诗，读经，他们也读伊妹儿。我们讲道，他们讲话。之后是奉献，他们就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最后是会毕祝福，他们常用的是“难忘今宵”。从宣召到祝福，类似崇拜的议程。

31

今天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里面描述公司需要一个怎样的职员。上面说，“她不会抱怨，她会微笑，她下班后会去健身，第二天精神饱满地来到公司。她没有时间说闲话，也不会轻视她的

上司”。写得多好啊，就像《箴言》31章似的。

32

“博物馆”这个词原初是有宗教意义的。“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庙宇，它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崇拜的指南。旧约中的会幕和圣殿是充满教育功能的。比如说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在衣服旁边做一个坠子，一个蓝色的袋子，然后要佩戴这个坠子，看见它就是纪念耶和华一切的诫命。崇拜总是可见的教育。

33

在圣经中，我们从来看不到“同侪”是教育的基本方式。教会和学校，都是类似于家庭的共同体，是长幼有序的。你是哥哥，你就要有哥哥的样子。女孩子有女孩子特别的恩典和特质，你是小姊妹，你就要听哥哥姐姐的话。但当我们被纳入同龄划分的教育模式后，“平等”成为一种被假想的、但又未落到实处的价值观。在西方的学校里有大量学生社团，有助于打破这个同龄划分。但我们没有，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把孩子们压垮了。我们的公立学校基本上是一座按年龄管理的集中营，完全缺乏社会性。

34

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让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够成为一个好丈夫，或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为什么呢，因为婚姻与一个人的生命密切相关。而凡是与生命和信仰相关的，换言之，凡是对人的自由而言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

35

缺乏对婚姻的教导，也就必然缺乏社会性。你在教育一大群人如何生活在一起，但你的教育竟无法帮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今天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也没办法跟他人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养成的，只不过是虚伪的社会性。

36

家庭是最小的社群，也是最小的教会。每一个弟兄被造，都是要被培养成为家庭的领袖，而那些被证明身上有上帝的恩典、能够很好地担任家庭领袖的弟兄，则继续被上帝使用，担任教会的领袖。但世俗的教育既然是为个人主义服务的，它们便不重视如何教育一个人成为家庭领袖。因为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是很糟糕的丈夫，却仍能担任公司和国家的领袖（讽刺的是，很多时候，你必须首先是一个糟糕的妻子，然后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授）。

37

世俗教育受到一种“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和辖制，已经看不见性别在受教上的差异了。世俗教育的目标，开始致力于把男孩子培养成女孩子，把女孩子培养成女汉子，最后从教育的流水线上下来的全是中性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在当代社会如此泛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是现代教育孕育了同性恋运动。

38

当逾越节的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父母很形象地用礼仪性的和宗教性的晚餐来教育孩子。使个人的身份认同和家庭的历史意识，成为整个圣约族群意识的一部分。从某个角度讲，没有节期，没有礼仪，就没有教育。因为信仰生活的议程，所塑造的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和历史意识。这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所有的教育都意图告诉受教育者，“他是谁”。而“我是谁”则与我属于哪一个共同体密切相关。

圣约教育一个非常主要的意义，从消极的角度讲，就是不让圣约的子民，被那些拜偶像的和国家主义的身份认知和历史意识所塑造。每一种文化教育的目的，都是通过教育（濡化）来塑造其成员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共同体意识，直到受教育者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所以当被掳的以色列人来到巴比伦城下，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雅各的族类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以色列的余民基于对耶和华的信仰而形成的身份认知与历史意识，会不会被巴比伦同化？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学校教育诞生于被掳巴比伦的时期。

这就是教育最根本的、生死攸关的功用。那么从积极的角度讲呢，圣约教育的现实目的，是用以建立和塑造圣约子民，让他们透过受教育，去经历圣约身份的认知跟历史意识的形成，从而使他们融入一个古老和伟大的信仰共同体。

有人说，教育就是拼爹。但你肉身的爹是固定的啊。所以，教育就是寻找另一位父亲。换句话说，只有两种教育，一种是认贼作父的教育，一种是认识上帝的教育。教育改革的意思，就是重新寻找父亲。然而《圣经》说，没有子的就没有父，有子的连父也有了。

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现代教育的弊端，是以事实判断为重，价值判断为轻。这种教育造就了一群直接将事实判断当作价值判断的民众。换言之，现代教育将人民引入更深的蒙昧。用琐碎的知识，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碎片。

43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导师对学生提问：“现在你来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有标准答案。”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他：“老师，请问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

44

荀子说，有一类知识，“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现代教育的特征，便是充斥和膜拜这一类知识。却将真正的知识，就是以价值观的养成，来判断和衡量一切知识的那种知识，遗落了。

45

C·S·路易斯说，取消古典教育，只能让学生沦为流行词语和专业行话的牺牲品。他们成为一群被各种“概论”和时髦话语所统治的人。在知识的世界中，他们只知道纸币的存在，而对纸币背后的黄金世界一无所知。

46

不能用现代教育的瓶，装基督教教育的酒。因为媒介本身就包含和定义了信息。

47

蒙台梭利的《儿童的秘密》，用一句话足以概括，就是“当孝敬儿童，好使你在耶和華所賜的土地上不得長久”。了解兒童的成長過程是有益的，但蒙台梭利的問題，就是直接將事實判斷當作價值判斷。舊約中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祭司以利，如何任憑他的兒子們“自由”成長。結果，聖經這樣評價他，“他尊重自己的兒子勝過尊重耶和華”。

48

怎么可能有父母，敢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陌生人呢。但基督徒父母却把耶和華的产业托付给陌生人，就是那些活在福音以外的人。

他们不按着大使命，去爱陌生人，反而要陌生人去爱他们的孩子。这就是无数基督徒正在努力遵循的“反福音使命”。

49

学校教育成功，取决于一个原则，就是一切不是必须通过学校才能教导的内容，就不必通过学校来教导。但在现代教育中，越来越多的、不是必须通过学校才能教导的内容，进入了学校教育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家庭教育不但失败了，而且正在全面灭亡。而家庭教育在哪里死亡，学校教育也终必在那里死亡。

50

美国学校的自我介绍，都有两个焦点。一是在学生们如何在这里玩得好，各种欢乐的场面，各类活动和节目。二是费用和福利的状况。连基督教学校也是如此，他们几乎不描述这所学校的信仰立场，教育哲学，他们如何教学，如何举行公共崇拜，他们为基督、为教会的教育目标及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如何。这显明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一个结果，即教育的娱乐化，已深深塑造了现代的基督教教育。

51

C·S·路易斯曾批评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他说，平等诉求有两个情感根基，一是渴求公平，一是仇恨卓越。前者最高贵，后者最卑劣。以平等主义和学生自决为追求的民主教育，所助长的主要是后一种情感。路易斯说，真正维护民主制的教育，恰恰不是民主主义教育，而是知识上的古典和“贵族制”教育。他预言说，民主主义教育最终将成为法西斯之温床。

52

某国际学校的老师出了一道开放性问题：你对其他国家的食物短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非洲学生问：什么叫食物？欧洲学生问：什么叫短缺？美国学生问：什么叫其他国家？最后，中国学生问：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53

古典教育的理念是，只有读无用之书，方能做有用之人。

54

有人说，什么是古典教育的目标呢，就是你把所学知识全部忘记后，还剩下的东西。在德语的传统中，这个东西称为“教养”。对C·S·路易斯来说，称为“骑士”精神。对保罗来说呢，称为“信、望、爱”。

55

路易斯说，教育的一个奥秘，是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教育必须规划，但教育规划必须摆脱以规划取代命运的幻觉。也就是摆脱“考不上大学你这辈子怎么办啊”的愚蠢父母的热心。相信恩典，就是相信真正的人生，往往是教育的副产品。

56

路易斯说，平等是药物，而不是粮食。平等之所以是善，是因为我们病了。恰如衣服之所以是善，是因为我们不再纯真。平等只是社会的安全阀，而不是人性的理想。平等只是好的事物的否定性条件，我们却试图为之而发狂。一旦平等溢出政治领域，而进入家庭和教育，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说，我们需要穿上民主，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但每天晚上，我们需要脱下它。

57

除了古人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胡适说，现代人还要加上，“时髦不能动”。因为人不过活于当代，久而久之，便容易认时髦为真理。因此，古典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学生识别并杀死时代精神。只是可惜，胡适先生的思想，亦大抵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58

中国的父母，大多在早上送孩子上学时，假定他们是本性善良的。到了晚上放学回家后，便假定他们性本恶了。

59

路易斯强调，平等只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在心灵世界，它没有地位。美并不平等，她更多向少数人显现。德也不平等，真更不平等。民主的教育观，试图把平等诉求延伸到比它自己更高的领域，等于取消垂直的关系，只让人类生活在水平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平等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神论的和唯物主义的衍生品。

60

换言之，平等只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外在的保护机制。但堕落世界的再次堕落，就是将次优选择上升为至善，通过把相对的价值绝对化，来反对绝对真理。这是“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切身的利益，隐藏了最高的事物。好比一个孩子，渴望认识那比太阳更崇高的，我们却扔给他一张元素周期表。

61

教育必须帮助孩子，早日从“我和你一样棒”的幻象中解脱出来，养成对那些在任何方面比自己优秀之人的尊敬。教育必须

帮助他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教育越来越被视为一个“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比赛（这是大多数父母参赛的目的）。教育需要帮助孩子们，寻求更崇高的事，而不必活在嫉妒当中，更不必直到成年之后，才经历“我和你一样棒”的幻影的破灭。

62

教育要培养这样一种品质，就是小人物不要把大人物太当一回事。但教育绝不能造就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所有小人物都认为自己是大人物。前一种人，组成民主社会。后一种人，组成民粹团体。

63

一方面，“养儿方知父母恩”。但一方面，中国人不敢说，就是“养儿方知父母罪”。就像受害人只晓得自己受难，却不了解犯罪手段。直等你自己怀着怒气责骂儿女，或嫌弃他们中间的一个，你才肯承认，罪是如何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然后，你便要赞美，“养儿方知上帝恩”。

64

奥古斯丁说，对上帝的敬畏，可以破除我们人类的骄傲。敬畏耶和华是教育的开端。也是防止教育成为教唆的唯一的方法。否则，那些不受教育的穷苦孩子，学会了爬上火车偷窃；而那些读了大学的子弟，却把整条铁路都偷了。

65

除非教育能够提供灵魂的平等，否则教育要么以市侩的嘴脸，将不平等刻在孩子们心中；要么冒充天使，向孩子们批发各种平等的赝品。当代的中国教育是前者，杜威式的美国现代教育是后者。前者不断推迟自由社会的到来，后者持续摧毁着自由社

会的未来。

66

布鲁达斯说，教育中的实利主义者问，为什么要学死的语言和古代的历史？按同样原则，除了做生意的需要，人为什么还要在国内国外旅行？如果不是为要做成一笔买卖，为什么还要倾听老年人说话，为什么还要和邻舍交谈？这样的人——现在世上充满了这样的人——不知道接受教育和学习一门手艺之间的区别。

67

因此，在英国的古典教育传统中，“游学”一度是必须的。学生除了在本地、本国完成学业，还必须四处游历一番，拜访名师，不然他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不过，古典教育家维塞斯莫·诺克斯比较反对游学教育。他认为整个英国贵族阶层的轻浮，就是被法国传染的。因此，他反对青年人在19岁之前离开英国本土，特别反对过早地去法国。“游学”和“留学”是完全不同的，但反对“小留学生”，总是古典教育的一贯立场。除了诺克斯提到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家庭在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中的地位，不应被过早的取代。在我看来，也许话很刻薄，“小留学生”几乎相当于卖儿卖女。

68

孔子曰，君子不器。蔡元培倡导，文理兼通。这都表明，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首先指向一个人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完整关系。西塞罗是一位雄辩家，他批评哲学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分裂，或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分裂。他说，“现在，一部分教师教我们思考，一部分教师教我们说话”。到了我们这里，则是一部分老师教我们赚钱，一部分老师叫我们做人。并且后一种老师，几乎绝迹。

哈钦斯引用纽曼主教的话，批评当代大学教育中，一种完整的指向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知识的缺乏。也就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消失。这导致当代的社会科学，“有一大部分是这类未经消化的、无关的和毫无意义的资料资料的堆积”。而科学家们呢，在成名之后或有闲暇时，才试着运用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一些原理，来思考那些与他们的研究及人类社会有重大关系的议题。而他们根本没有在这些方面受过足够的训练。他讽刺说，“这在我们国家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因为，哈钦斯说，“我们多么需要一种正统的神学或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否则今天的大学教育，就不再是一种自由的教育。

维塞斯莫·诺克斯则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一个自由的言说者，也是真理的言说者”。他认为，对英国来说，自由教育必须包含宗教的教育。“除了让人自豪的科学，哲学和文雅的知识以及其他构成自由教育的内容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比理性的宗教，或者纯正的基督教的高贵庄严的学问，更能让心灵真正的自由”。与此相比，绘画，音乐，舞蹈，和击剑，只是一些“装饰性的才艺”。对英国来说，这曾经是“廷臣”传统的主要教育内容（对今天来说，市场的需求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廷臣教育）。至于其他的技能学习，更与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将后两者在教育上拔高，将会导致反宗教、反道德的危险。我多么希望他说错了啊。今天，送孩子学钢琴、学美术的家长，功利心强的，直接奔着市场而去，功利性稍淡点的，也不过是为着人生中的才艺表演。

教育一定是关乎知识的。但古典教育注重对知识的修养和判断力。而现代教育仅仅注重对知识的专门性掌握。后者以割断专业知识与其他人类知识的联系为代价。专业性越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越肤浅，这是现代教育所造就的局面。

对希腊而言，自由教育与城邦有关，自由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换言之，自由关乎一个人与整个城邦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由教育起源于共和主义传统。古典教育就是古典的共和主义的一部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的 教育都带着各自强烈的城邦意识。城邦的意识形态，都是公立教育的核心。虽然这厢的城邦，是一座老大哥统治的集中营；那厢的城邦，则散发着民主、人权这些西方核心价值的芳香。而对基督教教育而言，教育必定与另一个看不见的城邦——即教会的圣约群体有关。为什么长老会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主力，因为长老会在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

直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自由教育的核心，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都是古典语言。如果人可以获得自由，人一定是在语言中获得自由。如果自由是存在的，自由一定自古以来就存在。因此，倾听古代的声音，是自由教育的基本路径。现代教育与此相反，因为进步主义认为，自由是现代的，而非古代的。于是教育的基本路径，是倾听当代人的声音。然而讽刺的是，从贡斯当、柏克到汉娜·阿伦特，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都认为，自由是古代的，极权是现代的。换言之，极权主义事实上是现代教育的产物。

甚至在教会的神学教育上，这种“古今之争”，也和世界一样愈演愈烈。曾有一位海外的神学教师对我说，你们坚持一些传统的立场，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的绝对无误，是因为你们书读得太少。我说，你说的是。我们的区别是，这么多年来，我读的基本上都是死人的书，而你读的基本上都是活人的书。而我认为，还没有死的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死了以后，如果因信，就仍旧说话。如果不信，就灰飞烟灭。如果一个人的知识和信念主要来自活人，那么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肯定是靠不住的。基督教信仰是

一个历史性的信仰，这意味着基督教信仰主要是来自死人的信仰。所以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耶稣则说，你以为他们死了吗？其实他们一直活着，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

75

所以，借用陈佐人牧师的一句话，古典教育是死人的活传统，现代教育是活人的死传统。我并不是认为古旧的就一定好，现代的就一定错。而是我们必须颠覆这个被已经被进步主义所颠覆的思维方式。除非没有真理，否则真理一定是旧的，而不是新的。穿新衣服的是暴发户，传新真理的是假教师。

路德与基督教教育



一、 必须把子女送到学校

我给大家预备了另外一段视频。是传记电影中，路德如何教小孩子《大教理问答》的一幕（略）。

宗教改革，必然产生基督教教育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路德不但是改教家、神学家，他也是教育家。加尔文也是教育家，他们都创办过学校。

1530年的一个主日，路德证道，题目是《必须把子女送到学校》，围绕着《马太福音》9章14节。在那里，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

是这样的人。”

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在三个方面塑造了我们对基督教教育的理解。

- 1、形成了“七艺”的古典教育模式；
- 2、涵盖了“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模式；
- 3、产生了“大学”这一带着“先知”色彩的教育组织。

在上一讲中我谈到，这三个方面，也是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换言之，宗教改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日益与腐败的教会和教义系统相冲突的结果。

在本质上，宗教改革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在历史上藉着祂的这一批受教于大学系统的仆人，重新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揭示和彰显出来。我很喜欢一位改革宗的历史神学家卡尔·楚门，给宗教改革的一个定义。他说，

“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和思想的中心”。

我试着将这句话，改写为“教育的宗教改革”的定义：

“教育的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全部教育内容和过程的中心”。

因此，就教育而论，宗教改革不仅仅代表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日益与腐败的教会和教义系统相冲突的结果”。而且，宗教改革也意味着对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传统的一场革命，即一场发生在大学内部的宗教改革。

简单来说，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在另外两个方面，在宗教改革的力量冲击下被颠覆和归正：

- 1、高举普遍启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将之置于圣约与圣言之上（或至少与之等量齐观）的自然神学倾向。这种倾向不断产生出哲学化的经院神学。在初代教父德尔图良发出“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的断语后，教会的神学和教育传统在一千

年间，几乎将雅典传统置于耶路撒冷之上。中世纪晚期，在经院哲学内部发生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为改教家的神学思考的范式转移做了铺垫。在某个意义上，从威克里夫、胡斯直到路德，都可以称之为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者。

2、形式主义跟象征主义的礼仪中心。在第一讲中我们谈到，我们反对这个，但并不彻底否定礼仪和象征在信仰和教育中的巨大价值。但宗教改革在方法论上的核心途径，就是回到本源，回归圣经。重新将教育的内容和过程放置于圣言之中和圣言之下。恢复圣经在一切知识领域内的权威，一方面摧毁了经院哲学，一方面也摧毁了礼仪中心。

因此，“教育的宗教改革”的结果就是：第一，圣经成为教育之本；第二，圣灵成为教育之神。

基督教学校是什么呢？第一，它是恩典的学校。第二，它是圣灵的学校。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学校不也是另一种“洗脑”吗？我说，不，你说错了。我们不但要洗脑，还要“洗心”。我们之所以说意识形态教育是一种“洗脑教育”，因为它只能洗脑、不能洗心。凡是不能“洗心”的教育，就是“革面”的教育。“洗心”的教育，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圣灵的教育和恩典的教育。人怎么可能洗人的心呢，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而洗脑的教育，也就是“革面”的教育，它只能透过对思想和意志的反复灌输和强制，去意图改变一个人的外在生活。这个叫洗脑，也叫革面，是一种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教育。它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心，也就是他的灵魂。凡不能改变人的心，却想洗人的脑，就是邪恶的。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嘛。

因此，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重新奠定了基督教教育的基础，也重新恢复了“以信求知”这一奥古斯丁主义的知识论。我说基督教学校是圣灵的学校。意思不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圣灵便不会在你的孩子心中做工。祂当然也会做工，因为上帝单单照着祂自己的意思施恩怜悯。但公立学校在整体上是抵抗圣灵的，也是亵渎圣灵的。而在基督教学学校里，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相通。圣灵在那里掌管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因为圣经在哪里得到尊崇，圣灵就在哪里做工。在这一点上，路德的立场跟长老会是一致的，也就是当他讲教育的重要性时，仍然是以圣约为基础的。也就是相信基督徒的孩子是圣约的子民，耶稣

对父母说，“让他们从小到我这里来”，而不是长大后等他自己选择。在改教运动中，除了重洗派之外，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包括后来从圣公会分离出去的卫理公会，都是承认婴儿洗礼的。只是后来的浸信会在这一点上受到重洗派的影响，反对婴儿洗礼。这一点尤其对中国家庭教会影响很大。但其实，你必须知道，反对婴儿洗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传统和主流。恰恰因为路德相信，基督徒的孩子是圣约的子民，是上帝乐意放在祂的有形教会中接受圣灵的教育、蒙享各样蒙恩管道的，因此，路德对基督徒父母宣告说，“你们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也有人说，基督教教育也不等于学校教育啊。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但为什么是送到学校来，不能送到家里来呢？

接下来，我要提到路德写于1524年的另一篇文章，《为设立与维持基督教学校致德意志各城参议员书》。路德开创了在教育史上，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普遍建立的公共教育和公立教育。包括耶稣会也是受到路德立场的影响、启发和挑战，在16世纪后期迅速重建了天主教的普通教育体系。

二、路德的教育观

我藉着这篇文章，从六个方面来阐述路德的教育观。

第一，路德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已经崩溃。

路德的大部分书信，都是写给掌权者的，都是给德意志诸侯的建议，希望他们保护教会，希望他们兴办学校，希望他们出版圣经等等。在这封信里，他首先谈到学校的崩溃，他说当时的学校已糟糕到一个地步，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已经崩溃。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在“圣约归正学堂”的简章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格言：

“我担心学校将会被证明是通向地狱的大门，除非他们殷勤地讲解圣经，使圣经中的真理铭刻在年轻人的心里”。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教育观。今天我们在中国谈基督教教育，有一个非常“好”的背景，就是学校正在崩溃。这跟美国不一样，人家的公立学校看起来也挺好啊。当然，那些有识之士譬如

陈佐人牧师就会说，美国的学校也很糟糕的。他就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哈钦斯在那里反对美国的现代教育，重建了古典的博雅教育。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认为，美国的教育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只部分同意这个说法，因为美国只有少数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才算得上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所以，和路德的时代一样，“好”就好在我们的公立教育已足够糟糕，足够堕落，足够庸俗。甚至庸俗到连一个有点见识的非基督徒都难以容忍的地步。“好”就好在当我们创办归正学堂的时候，不断看到校长的丑闻和公立教育的丑态百出。因此，在当代中国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尝试，“教育革命”、“教育自救”、和“教育突围”的呐喊。甚至在体制内也是如此。除了“在家教育”（目前的大部分在家教育者并非基督徒）、“儒家学堂”，还有像我们教会的李英强弟兄，他们创办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和“立人大学”。我们盼望十年内办大学，人家今年就办起来了。不要校址，不要资金，全国招了20几个学生，到成都来“游学”，请这个老师上一周课，到那位老师的书房上一周课。那天，我也在我的书房里给几位游学之士讲了一上午课，这就叫“大学”。在12世纪的欧洲，我们上一讲提到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就是这样产生的。然后学生们选一个组长，帮大家收钱，这就是学生自治体，教师自治体和学生自治体一旦形成，就叫大学。

第二，路德特别强调教育是属灵的争战，教育必须对抗撒旦的阴谋。

路德说，我们的青年基督徒的后代“是撒旦口中的一块肥肉”。他说我们必须要把这块肥肉抢过来，对抗撒旦的阴谋。所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学校已经不断被证明是通向地狱的大门”，而那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父母，不仅自己混入巴比伦，还任凭巴比伦吞吃教会的后代。

第三，他非常强调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作业”。

教育不但意味着你的孩子要交作业，教育本身是父母要在上帝面前交的作业。同样，他说世界上没有比教育儿女更重要的事了。所以推动摇篮的手推动世界。路德这样说，“教育儿女比访问圣地更重要，教育儿女比修建教堂更重要，比做弥撒更重要”

。这也是犹太会堂教育的传统。“妥拉”是犹太人最尊贵、最圣洁的财产，但《塔木德》这样教导说，“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可以卖掉一卷妥拉”。意思是你必须把写在羊皮卷上的上帝的话，刻在孩子们的心上。基督教教育是值得倾家荡产的教育。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就是“毁家兴学”。求主赐恩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父母，赐给我们“毁家兴学”的志气。

第四，路德认为“教育是国家的职责”。

这是我们反对的，我留在后面谈。

第五，路德强调人文主义教育，包括古典语言，历史，音乐和几何。

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传承。路德是第一位把圣经翻译为德文的人，他一方面鼓吹将圣经翻译为任何当地语言，另一方面又相当看重圣经原文及其他古典语言的学习。他称古典语言是“属灵之刀的刀鞘”。他甚至说，希腊文和希伯来语什么时候在教育中消失了，什么时候福音就会在我们中间消失。如果你发现宗教改革并不是砸烂一切，你就会看见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在很多方面是“反宗教改革”的。这话很重，为了减轻我的责任，我必须指出，这是引用康来昌牧师的话，大家有意见可以去找他。

特别是路德对音乐的强调和造诣，似乎是加尔文和改革宗远远不如的。这可能是因为在改革宗在崇拜中更强调“敬拜规范性原则”的结果。但五百年来，几乎最好的音乐家，都出身于路德宗，而不是改革宗。每想到这一点，我稍微有些遗憾。但我又赞美主说，原来一切的丰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藏着，而不是在改革宗里面藏着。

第六，路德强调教育必须以神的话语为中心。

这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和精神。路德和其他的改教家都是以此来重塑基督教教育。

三、路德的悲剧：让国家获得教育权力

在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中，通常都会面对路德与德意志诸侯之

间的结盟关系。在神学上，也会讨论路德的政教观与加尔文的重
大差异。

我们不展开这些讨论。总之，路德强调教育是国家的职责。
第一，他对父母说“你们必须把子女送到学校去”。第二，他对
政府说“你们必须办学校”。第三，他接着又说，“父母必须把
子女送到政府办的学校去”，就像今天的《义务教育法》一样。

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在德意志甚至整个欧洲的兴起，跟路
德的宗教改革，尤其是跟他的政教观密不可分。我很尊重路德，
我之所以是改革宗，不是因为我除了改革宗以外，不知道、不
了解教会内还有其他宗派的神学。我之所以持守这样的观点，不
是因为我从来不去了解那样的观点，甚至懒得去了解其他宗派的
传统。如果这样，我们就可能慢慢变成一个坚定而狭隘的人。

路德的政教观通常被称为“两国论”。但路德宗有一种敬
虔主义传统，把两个国度过于分开，其实是将基督教信仰狭窄化
了。改革宗在某个意义上也强调“两个国度”的区分，但我们
在这一区分之上同样强调宇宙中只有“一个国度”，国家和教
会，都是在同一个上帝国度中受托执掌属灵和属世权柄的不同部
门。在路德宗的“两国论”的实践中，反而将教会作为属灵国度
的彰显，置于国家这一假想的国度之下。路德认为教育是国家的
职责，这就带出对整个德国传统的影响。其实几百年后有一个德
国人，他有一句名言，非常符合路德宗的政教观。这个人把德国
所有的主教召集起来开会，对他们说，“你们只管灵魂上天堂的
事，其他的事交给我来管”。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改革宗的牧师和神学家绝不会同意这句话。我的意思不是要
路德为希特勒的统治负责。但我想说，希特勒的统治绝不会出
现在清教徒国家，不会出现在清教徒传统的宗教-政治-文化的结
构中。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路德宗的政教观和教育观的结果，把
太多的东西交给了国家。我们今天只谈一点，就是他（及路德的继
承者墨兰顿）把教育交给了国家。当然，路德仍然强调上述的两
点，第一，教育应该以圣道为中心，第二，宗教教育应该贯穿到
所有的人文教育的学科之中。这都是很好的，是我们同意的古典
教育的精髓。但在另一个方面，他却诉诸于国家、政府和诸侯，
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教导教会的后代。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政府是“基督教政府”。那么路德主张，由一个基督徒政府，来兴办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基督徒学校，有什么不对呢？其一，我们在前一讲谈过，教导神的话，从来都是祭司和先知的职能，不是君王的职能。其二，到中世纪，也形成了王室、教会和大学的三元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也不是教育者。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国家主导教育”，乃是倒退到了比中世纪更不如的黑暗时代。其三，一旦你将圣言托付给了国家，就为邪恶的“国家主义”偶像，即一种现代的、西方的（具体来说就是德国的）、君师合一的极权主义，开辟了道路。结果呢，等到“以圣言为中心的教育”没有了，“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教育”却尾大不掉，从此茁壮成长，直到扩散到全世界。

不过两三百年，世界就落到了这个局面。我必须说，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到路德为止，国家从来都不是教育者，国家从来都是被教育的。被教会教育，被修道士教育，被大学教育。从来都是民间教育国家，先知教育君王。然而，到了路德之后，就变成国家教育我们了。所以这是改革宗和长老会必须坚决反对的。这种从路德宗出来的国家教育观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敌人。

归纳一下，第一，我们反对浸信会的立场，即把基督徒的子女排除在圣约群体之外（我们只是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反对浸信会）。第二，我们反对路德宗的立场，就是让国家获得教育权力（我们也只是反对这一点，不是反对路德宗）。

我认为，教育的国家化，是人类近代史最严重而深远的悲剧之一。这个悲剧中最可悲的一点，就是它是从路德弟兄开始的。甚至今天都难以想象，有一天上帝会从整体上把它扭转过来。也许是我信心太小，我不敢祝愿主耶稣，求祂在历史终结之前，再一次把教育的权力从国家那里彻底地拿回来，还给教会、家庭和社会。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右翼保守主义，和古典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是类似的。前段时间，我读到《美国经济评论》的一个撰稿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右翼，写了两本书，国内有翻译出版，一本叫《国家为什么崩溃》，另一本叫《市场为什么崩溃》。其中提到教育问题，他的看法非常直接，和我的立场一样直接。他认为要解决今天美国社会诸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全面撤出教育，恢复教育的民间性和私有性，国家可以给钱，但

国家不能直接兴办教育、不能审查和控制教育内容。

这和弗里德曼（当代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教育券”的构想也是类似的。在美国，私立教育和教会学校都是合法的，国家也会拿很多钱去资助他们。譬如哈佛是私立学校，但哈佛的经费中最大的一笔一定是政府给的。政府只给钱，不管教育。但说是不管，拿了人家的钱总会有事情发生。政府会将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加诸在接受资助的学校教育中。假如你拿了政府一分钱，你用这一分钱的时候，就必须遵循所谓的“宗教平等”和“性别平等”的规则，比如你不能将同性恋者排除在外。你也不能筛选信徒与非信徒。许宏弟兄有一篇文章，里面谈到在小布什时代，一些右翼的保守基督徒成立的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大学，叫“帕特里克·亨利学院”。帕特里克·亨利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著名人物，就是说“不自由、毋宁死”的那位。这是一间很小的大学，只有十年历史，每年只有200个学生。有一个基督徒的孩子，在SAT考试中拿到满分，同时收到四个大学的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以及这个新办的基督教大学（当时刚刚开办一年），然后，他选择了这间大学。这间大学也很厉害，它起初只有一个本科，现在有五个专业，都是人文教育的分支。十年来，它连续赢得全美大学辩论赛的冠军。跟哈佛大学用美国法律辩论，赢了他们。跟牛津大学用英国法律辩论，也赢了他们。相当了不起、相当令人惊讶。我提到这个例子，是因为这间大学保证它的基督教教育的独立性的一个方法，就是拒绝和不申请来自政府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因为一旦接受财政补贴，你就会在师资、招生和课程设置各个方面受到“平等原则”的约束。平等当然是对的，但当代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已发展为一种法西斯式的平等，实际上否认了基督教信仰和特定的道德观念，譬如我若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我若告诉学生那是不对的，我就成了一个反对“平等”的中世纪的遗老遗少。

这是私立学校的情况。在公立学校，美国政府对教育内容存在着事实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控制和审查。而这些审查和控制基本上都是反基督教的。因此，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的观念，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学校自由地祈祷，越来越多的美国教会和基督徒，在最近几十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保守的基督教学校的复兴。

让我们回到路德。他提出两个重要理由，为什么主张由国家办学校呢？第一，因为路德认为，尽管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职责，但大部分的父母都失败了，大部分父母被证明担当不了这样的责任，所以国家要替代父母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国家有责任建立学校，使其制度化。第二，他提出，国家需要担负教育后代的责任，是为了整个地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福利。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德意志的诸侯们。路德告诉诸侯们，教育是使德意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脱离大公的欧洲和罗马天主教会的重要途径。这就是第一讲提到的教育的社会化目的。事实上，谁来教育，就意味着受教育者成为谁的人。也就是说，教育是培养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和历史意识的方式。德国的教育使一个人成为德国人。中国的教育使一个人成为中国人。巴比伦的教育使亚伯拉罕的后代成为巴比伦人。

路德支了一个招，帮助了德意志诸侯建立世俗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一个世俗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不是通过军事统治，而是通过教育。国家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世俗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引用周恩来的一句名言，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你活着若是为这个，你就应该去读公立学校。你活着若是“为基督、为教会而读书”，你就必须去上教会学校。路德开了诸侯们的眼，让统治者看到，必须透过教育来培养市民，合乎城邦的价值观、跟统治者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思维方式、被格式化的，可以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标或美利坚合众国的商标，并在上面盖一个戳。其实，这是柏拉图时代的城邦与教育的模式。

换言之，公立教育的兴起，使欧洲的教育，从一种圣而公的基督教教育，退回到了希腊-罗马的城邦教育。从此，德国通过教育而形成了德意志民族。国家通过教育，首先培养德意志民族的成员，而不是首先培养基督教会的成员。

国家主义的野兽是从德国出来的，从路德宗的传统而出。路德被称为现代德国民族之父，《明镜》周刊评选500年来最著名的德国人，第一位就是马丁·路德，第二位是卡尔·马克思。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从此国家就成为了“活着的上帝”。另外，在路德宗的传统中，后来出现了敬虔主义。而自由派的神学和自由派的现代教育，也都是从敬虔主义的传统中出来的。敬虔派的夸美纽斯，被称为“现代教育之父”。因为夸美纽斯是基督教古

典教育与现代教育的一个分水岭。

当然，我不希望这样说，导致对路德宗传统的不公正的批评。现代教育和国家主义的兴起，都是复杂而多重的。只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德国，所以我试着梳理这个过程。但辨析其中的诸多因素，不是这个讲座可以胜任的。譬如说，基督教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还有一个分水岭式的人物，就是约翰·洛克。而他是生活在清教徒时代和传统中的。但就像我并不是要求路德为希特勒负责任，我也不会认为加尔文要为洛克负责任。

但你仍然可以从“国家教育”的兴起，去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和极权主义国家，就是从下列德国思想中产生的：国家取代了上帝；培养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替代了培养教会成员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国家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国家和教会，千百年来都在通过教育的竞争去培养各自的城邦成员。一旦国家成为活着的上帝，我们就开始膜拜国家。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无非是成功地把皇帝崇拜改造成了国家崇拜。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

最后我要谈到一个结果，路德跟当代中国之间有很复杂的关系，是通过卡尔·马克思建立的，也是通过列宁跟我们建立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24条：

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一条款的意思，第一，非常确定地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一个世俗国家，而在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国家。它跟路德一样，认为教育人民是国家统治者的责任，国家本身即教育者，它的全体成员构成受教育者。第二，这一条款宣称，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一种类似宗教的和取代宗教的意识形态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被这种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一个世俗国度的成员。因此，这一对“国家”本身的宗教性的定位，反过来界定了国家对“宗教”的态度，也就是《宪法》第36条所说的：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让我这样说，因为我必须这样说，“教会必须反对这些宪法条款”。我们应顺从在上掌权者，但这些条款的确违背了圣经。

我们必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4条和第36条。所以我说，坐牢也要办教育。我们谈到家庭教会的议题时似乎比较理直气壮，说我们并没有违反《宪法》，违反《宪法》的是国务院和宗教局的立法。但是，当我们兴办教会学校时，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真的违反了《宪法》，而且我们必须违反《宪法》，必须把那块落在魔鬼嘴里的肥肉抢过来，因为那是耶和华的产业。不夺过来，教会就要断子绝孙，就要落入第五诫的诅咒，你们的日子在这地上不得长久。

我在2004年，曾写过一篇论文，《对国家教育权力的宪法批判》。当时我在慕道，还没有受洗。但十年过去了，我尚未见到中国法学界或教育学界，另有相同立场的法学论文出现。因为当时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发生在四川。福建有一个律师，在四川大学自修，你无论考什么专业，都有一门课叫“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人家的“马克思主义古典教育”嘛。结果考题里有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宗教？标准答案，“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他买的是川大出版的教材，于是就起诉四川大学，认为川大的教材和考试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很了不起啊，他当时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这是中国的“宗教自由第一案”。其实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去做这种事，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发现你的信仰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任何一个议题，你就选择和平而公开地违法，然后主动接受惩罚、打官司、启动司法程序去告政府，将违背圣经的政府立法揭示出来。

这位律师就这样做了，说对不起，你侵犯了我的宗教自由，因为你告诉我“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本来也没什么，因为这可以是你的立场。但这是标准答案啊，是垄断的，不是这个答案就考不上大学，而你又垄断了教育权。不承认这个答案的人，又不能自己去办一所大学。因此，在这个垄断的、被控制的教育系统中，我没有办法获知关于宗教的其他任何观点，或者其他任何观点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你就侵害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歧视了有宗教信仰的公民。

他这个论述在宪法上很有力的。当时我跟他交流，希望扩大这个案例的影响，就写了这篇论文发表。但其实也没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知识界对此也不感兴趣。但教会不应该不感兴趣啊。我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具有某种实质道德和精神目的的教育，在一种意识形态统治方式下被视为国家的一项权力和目标，那么教育就脱离了公民的受教育权，成为一种单独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这时国家的教育权及其特殊的道德目标，就会构成对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限制。把宪法上享有受教育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下降为一个宪法上的“受教育者”。

感谢主，直到今天，这段话也大致符合我作为一位改革宗牧师的立场。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接着说：

1982年宪法中的“教育权力”条款，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统治的一个产物，是与宪政的目标截然相反的概念。国家的“教育权力”，正是公民受教育权的最大的敌人。国家成为教育者，意味着你活到八十岁还是未成年人。

这话的意思是，公立教育的实质是一种对儿童的“共产主义”，主张儿童（在大学教育中甚至是成年人）是国家的公共财产，国家在儿童的思想、信仰和灵魂上，要求与其父母均分掬物，共儿共女。这既否认了教会的“天国的钥匙”权，也否定了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政府，剥夺了父母对子女灵魂的监护权。因此，强制性公立教育的动机和结果，就是最终使国家本身成为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

四、结语

在某个意义上，没有盟约就没有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是建立在某种盟约之下的。被教育者成为这个盟约下的成员。根据盟约的不同，可以区分三种教育：

- 1、圣约之下的教育：基督教教育
- 2、宪约之下的教育：国家宗教（或称公民宗教）教育
- 3、契约之下的教育：世俗教育

我们并不完全反对第三类教育。因为基督徒（尤其是成年的基督徒），可以根据一份契约，向外邦人购买部分教育内容，包括技能和职业训练。但我们完全反对第二类的国家（宗教）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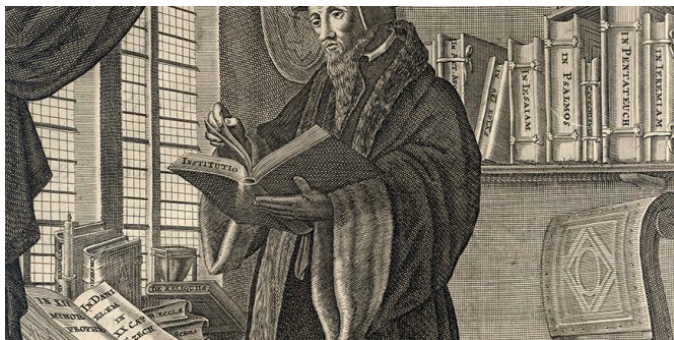
育，即全日制的、垄断的、反基督教的、尤其是针对未成年基督徒的公立教育。

让我最后举一个例子。你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时候起名字吗？犹太的男孩在出生第八天受割礼，那时他就必须有一个名字。因为在这一天，他开始成为圣约社群中的成员，从那天开始，他就是“圣约之子”。因为他是耶和華所賜的产业，所以他是在圣约中被命名的。假如你一生下来，你爸就给你起名叫“李建国”，你就很清楚自己是哪一个盟约之下的成员了。假如你一生下来，名字是按家谱来定的，那就表明你首先是王氏家族或李氏家族的共同体成员，你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光宗耀祖，你归属于这个历史性的血缘群体。

而很多中国人，特别的乡村的人，是在孩子上户口的时候才给他起名字。小时候随便乱叫，阿狗阿猫的，好几个名字。等要上学了，或要上户口了，才起个学名。这个名字是跟教育有关的，是跟国家有关的，传统上叫“学名”。所以你看，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也反映在你的名字上。就是国家、家族和教会都在争夺你的命名权。今天的公立教育，是一种国家宗教的教育，我不是特指中国的无神论教育，今天的美国公立教育也是如此。国家一旦拿走父母和教会的教育权力，它的教育就成为国家宗教教育，有的学者称为“公民宗教教育”。

而在长老会和大多数宗教改革的主流宗派里，基督徒的孩子生下来，是要接受婴孩洗礼的。所以至少在受洗日之前，父母必须为孩子起好名字。这是在基督国度中的“学名”。孩子受洗成为“圣约之子”。父母宣誓说，要尽自己的努力，让他们从小接受以圣言为中心的教育，并以认识上帝和荣耀上帝为他们一生受教育的首要目的。

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



一、教会的“公立学校”

首先，我需要澄清三点：第一，其实这四讲，我都是在讲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因为我是以这样的教育观来梳理和评价历代的基督教教育。第二，因此，从旧约时代到大公教会的历史，包括以路德为代表的第一代改教家，他们的基督教教育观，与所谓加尔文主义的教育观，大部分内容都是共同的。加尔文或改革宗，并没有那么独特的基督教教育观。加尔文主要是一个继承者，或大公教会传统的集大成者，而不是一个开创者。第三，改革宗的教育观，最独特的几个地方，其实我也已经讲过了。一是对路德的国家教育传统的对照和反对，二是对浸信

会将圣约子民排除在外的重洗派立场的对照和反对。三是对灵恩运动带来的忽略全日制基督教教育的对照和反对。四是对当代世俗化和自由化的福音派信仰所带来的对世俗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完全或至少大部分的认同的对照和反对。

今天我不放短片了，要放一些照片。这是归正学堂学前班的开校礼拜，我的讲道是《贫民窟与皇家学校》。我们到底要办一个贫民学校或是一个贵族学校？在今天的中国，“贵族学校”听起来很诱人。但我们在三圣乡租了一个很破烂的农舍，看上去像贫民学校。而当代美国的教会学校，数量很少，也很贵，几乎就是贵族学校，只有少数的基督徒父母才愿意承担。当然，最根本的是他们缺乏“毁家兴学”的志气。在当代中国，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逃离中国”的运动。有钱的、有权的、有点能力的，都在逃离。包括教育上的逃离。甚至有些基督徒学校的目的，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学生的浪潮已持续了二十年，甚至“小留学生”的浪潮也持续十来年了。我当然不是反对一些基督徒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次我遇见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的女儿在美国的“圣约大学”读书，他听女儿说，在圣约大学、加尔文大学和惠顿大学，大约有200多个中国孩子，差不多是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孩子和家境较好的基督徒子弟。他们有一个团契，其中好几位学生，都在主面前立志，希望将来回国后从事“基督教教育”。所以，我不反对你出去，但我希望你回来，从事基督教教育。因为我相信上帝让一批人出去，有祂测不透的美意。但我看见中国家庭教会目前的基督教教育异象，有贵族化的倾向，并且跟整个世俗社会逃离中国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为基督、为教会”，甚至在福音使命的委身上，不是“为中国”而毁家兴学。但像戴德生的名言一样，“不，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所以归正学堂创办的时候，虽然我们强调“古典教育”，有人说这是一种精英教育，但我们必须强调这是“贫民的学校”，不让一个适龄的会友子女因贫困而失学，这才是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异象。

但在《箴言》里，又好像有一个皇家学校，我们也是天父上帝的学校。天父的学校，当然是贵族学校了，我们是培养王位继承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一个公司培养员工和培养太子爷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皇帝培养一个官员和培养一位王子也是完全不同的。官员得先考试，才能证明你能当科员。科员当好了，才证明你能当科长。这是一条律法主义的道路，你必须先证明你有本

事，然后才能继续往上走。但皇帝培养王子，可不是这样培养的。皇帝总是把他的儿子放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位置上，先干一干。先当一个兵部侍郎，过几年看他还不错，然后当一次副元帅。第三次，就让他挂帅了。其实每次一开始他都不能胜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可他慢慢就胜任了。他不需要先证明自己，他直接成为王子，直接成为尚书，直接成为元帅，然后再培养可以证明出来的能力。这就是对王位继承人的教育。换言之，这就是恩典的教育。

所以教会学校是真正的贵族学校，它是在恩典中的教育，而不是在竞争中、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不是你配得那个位置，上帝才给你那个位置。而是上帝先把你放在那个位置，然后显明恩典在你的生命中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那些不领餐会友的学校，必须是地方教会圣约群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难以想象在教会以外的教会学校的存在。

这是第二个学校的照片，台湾长老会办的真理大学，在淡江。这几年我去了台湾、香港、美国，参观了好些教会学校。台湾长老会的教育系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来台，人家已经在了，所以他的教育系统很完整。在淡江，从教会幼儿园到教会大学，你看那间大教堂，真的很漂亮，这是我见过的、华人社会里最美丽的教会学校，它的原名叫“牛津学院”，开办于1882年。看起来，它最像皇家学校，但实际上，这所大学已相当世俗化。和我们所认同的基督教教育的异象，已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大学旁边的淡江中学，有一块宣教士的墓地，这是最感动我的一幕。这块墓园，正对着教学楼。这些宣教士都与这些学校有关。后来，我就跟归正学堂的老师说，将来咱们学校有块地了，以后你们死了就埋在这里。你们要有死的心，愿意将来埋在这里，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委身，教会也委身。你们愿意，众长老也愿意，家长们也愿意。咱们教会就与学校共存亡。

司布真牧师曾说，“真正的贵族是信靠耶和华的人”，所以教会学校就是贵族学校。教会学校也是贫民学校，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少数家长的梦想而存在，而是为了基督的教会而存在。

这就是改革宗传统所带出来的，和路德宗演变的“国家公立教育”不一样的基督教教育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教会的公立

学校”。教会有责任教导圣约子民。因此不能光靠父母来承担教育费用。国家用它的教育经费来跟你抢孩子，你总不能用比它更少的钱去教育上帝国度的子民吧。因此，我们查了成都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头经费，大约是每人9800多块钱。教会便照这个标准，按每个学生每年1万元，拨付给归正学堂的教育基金。所以目前的学费，是家长出1万，教会出1万。这就是“教会的公立学校”的异象。如果有家庭还是不能负担这个费用，我们再透过教会慈惠基金来帮助。

二、加尔文与日内瓦大学

我们当中有一些兄弟姐妹，来自改革宗教会，也有更多弟兄姊妹不是来自改革宗教会，甚至是第一次接触到改革宗。因为我们有时会提到婴儿洗礼啦，改革宗的敬拜规范性原则，或男女侍奉的原则啦。我先在这里引用约翰·邓肯（John Duncan）的一句话，他是20世纪初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在当时强烈地反对自由派神学，这是他的信仰立场，也是我们共同的立场。他说：

“我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接着是一位大公教会的教徒，然后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第四是一个婴孩洗礼论者，第五是一位长老会信徒。我不能把这个次序调转过来。”

我们在信仰上有不同的传统和认信，但你看，这是我们认信的次序，也是我们彼此看待的方式。

加尔文看教师的职分很特别，今天的大部分教会，对教会的职分是三重划分：牧师、长老和执事。此外，长老会又将牧师和长老在本质上看为同一性质的职分。但加尔文对圣职有四重的划分，根据《以弗所书》4章11节，特别单列了教师，即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他也不断在教会内重视这个教导。那他所讲的教师与牧师的区别是什么呢？他说，教师这一职分是专门设立来解释和教导上帝的话语。而牧师呢，除了解释和教导上帝的话语外，他还执行圣礼，牧养教会。而教师不拥有牧养的权柄，他不治理教会，不施洗、掰饼，也没有劝惩会友的权柄。但他在主日崇拜之外的各种场合，教导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总之，他做教会内的教育工作。也可以说，在加尔文的观念里，牧师对应着“祭司”的功用（当然他同时也有“先知”的功用和“君王”

的功能），而教师仅仅对应着“先知”的功能（没有“祭司”和“君王”的功能）。在今天的某些长老会里面，仍然会在牧师之外，单独地按立教师。大部分教会不再跟随他的教导，做四重职分的划分。但四重职分的分类，对于理解加尔文或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的立场和实践，是有蛮大关系的。

为什么长老会的传统非常重视教育，也擅长教育？第一个原因是“圣约”。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圣约神学，包括婴儿洗礼所表达的“恩典的教义”及“基督徒的子女是有形教会的成员”的圣约教会观。第二个原因是“圣道”。改革宗教会最看重的教会建造和教会治理之道，第一是讲台，第二是讲台，第三还是讲台。上帝的道是教会的中心，他们始终相信圣言的能力，胜过相信其他任何能力与方法。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轻视其他方面，虽然有可能其他方面的确做得不够好。但是改革宗教会的传统，从加尔文开始，建立在一个极其强烈地对圣经的信靠之上，就是相信唯独神的话语才能改变人，建立人。或唯独神的话语带来的改变才是真改变，是“洗心”，而不仅仅是“革面”。有人开玩笑说，在改革宗教会，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这似乎是一个讽刺。然而，我们并不是忽略圣灵的工作。恰恰相反，为什么当代教会不断地失去对圣经无谬误立场的坚持，或那么热衷于在上帝的话语之外寻求各种策略、方法和道路，甚至不惜将世俗的小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引进教会，不就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圣灵的大能吗？对一些人来说，除非圣灵能够让人说方言，或使疾病得医治，否则圣灵就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圣灵的大能是那么清晰的、日常的充满整个教会，祂不需要总是干出一些令万人瞩目的神迹，才能征服我们的心。祂早已和一直藉着圣经的大有能力的传讲，征服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一直说，改革宗是真正的“灵恩派”，他们是不追求神迹奇事的灵恩派。这是不是更灵恩啊？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也被称为“圣灵神学家”的原因。因为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不可能笃信圣经的权威性；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内心不可能寻着得救的确据；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不可能像马丁·路德一样站在君王和主教面前，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一步也不能后退；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也不可能坚持基督教教育，乐意把自己的子女献给“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教育”。

加尔文除了在地方教会中，设立了没有祭司功用的教师，在

各种场合教导和解释圣经——这样，他实际上创立了基督教的成人教育。此外，他又创办了日内瓦大学，把教师的职分延伸到教会所兴办的普通教育的学校里去。这样，他也创立了非公立的基督教普通教育。这也是我们的立场，即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传道者，因为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是传讲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再跟路德的立场做一个比较。路德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强调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普通教育，不是把宗教做为教育的一个附加部分，是要把宗教放置在全部教育内容和过程里，这是路德所理解的基督教教育，也是加尔文所理解的基督教教育。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第二，他又强调国家的职能，让父母必须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他在1520年的那篇讲道里，甚至说“我坚持政府有责任强迫父母，把子女送到学校受系统教育。因为统治者必须维持教会和政治的运作，使这两者为人们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翻译，听上去有点怪怪的，虽然就是那个意思。在路德之后，墨兰顿也跟随他的立场，基本上在德意志地区普及了小学，所以墨兰顿被称为“公立教育之父”，或至少是基督教的公立教育之父。因为基督教的公立教育之父，也就是全世界的公立教育之父。

我们说了，这和路德的政教观有关系。但在加尔文那里，政教观是在圣约的框架下的。圣约神学是加尔文理解上帝与教会的关系和救赎历史的基本蓝图。这就保证了不会像路德那样，把“两国论”分得太开。整个宇宙，就好像一个董事长，下面设了几个副总经理。其中地上的副总经理有两个，一个管枪，为了维持公义他是可以动枪的。另一个呢，管心，只能教导别人，对方再怎么样，他也不能拿起枪来。所以他们是彼此配合，共同服侍那位主人。我称之为“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像三权分立一样，“分立”是首先表明他们同属一个系统，然后表明他们有职分上的区别，不可能混淆。

这个立场，清晰地表达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章，即第4卷的第20章《政府》，以及《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23章，《论政府官员》。下面这段，摘录自美国长老会和改革宗长老会华西区会所采纳的版本：

国家官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亦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然而国家官员如同保育之父

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份的各方面，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并且，耶稣基督在祂的教会中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它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作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利的行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致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侮辱、暴力、诅骂和伤害；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

按照改革宗的政教观，政府绝不能僭越权限，执掌祭司的权柄。就算它可以兴办一些世俗的、职业训练的教育，它也决不能兴办或插手有上帝的道在其中的教育，因此也不能垄断对人民的教育。政府无权凭借上帝的道来办教育，因为一旦你的教育观念，是认为教育必须包含上帝的话语，那这就是教会的属灵权柄，而不在属世的刀剑权柄的范围内。这意味着教育包含了“驯化君王”的责任，而不是被君王驯化的目标。

因此，宗教改革之后，在改革宗地区和路德宗地区，出现了两种基督教教育。一是主要在德意志地区形成了公立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模式，二是在荷兰形成了非公立的、教区学校的模式。因为教育一定是关于圣道的，教育事工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所以校长由谁来任命，就像当年修道院的院长到底由谁来任命一样。1076年的教皇革命，反对“平信徒的授衣权”，是中世纪的转折性事件，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性事件。就是反对由君王或封建领主来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那么，同样的问题，基督教学校的校长是由教会来选立？还是由政府的教育部来任命？如果学校必须以上帝的道来教育圣约的子民，那么校长就是传道人，他必须首先是一个传道人。既然是传道人，怎么能由政府来任命或辖制呢？所以，尽管日内瓦的议会被掌握在改革宗人士手中，或者说加尔文对日内瓦政府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路德对德意志诸侯的影响力；但有意思的是，反而是路德、而不是加尔文，开创了公立学校的传统。接着，在荷兰改革宗的地区，就形成“教区学校”的模式，校长、甚至包括学校中的圣经教师，他们应当是传道人，应当在教会的属灵权柄之下被呼召、考核和监督。

下面这段话，摘自加尔文创办日内瓦大学时，亲自撰写的“校长就职书”，即校长的宣誓。我们插一段加尔文与另一间大

学、即他的母校巴黎大学的关系。当年，巴黎大学的新任校长是他的朋友，也认同他的改教思想。据说，加尔文替他的朋友撰写了校长的就职演说，表达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如何重新塑造一间基督教大学。之后他被通缉，像保罗一样连夜从窗户逃亡了。现在，基督给了加尔文一个机会，以宗教改革的信仰来创办一间全新的基督教大学。下面是校长誓言中的一段：

我所做的工作，我从那恩惠的父神那里得到了呼召，对于我所做的事要很信实地去遵循我的承诺，且严格地持守我所立的盟约。

在加尔文那里，教会学校的校长和学校里的圣经教师，是教师职分的一个延续，也是上帝赐给教会的职分的延续。所以他们必须是一个传道人。

日内瓦大学：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

之后，诺克斯等一大批流亡的新教徒，都曾在这里受教。日内瓦大学被称为“自使徒时代以来最好的基督教学校”。

接着，我不再将改革宗的教育观，与路德或其他宗派的传统作比较。让我们将改革宗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作为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范本，与现代教育的模式，做一个基本的对照。

第一，日内瓦大学的教育理念，不是以儿童为中心，也不是以内容为中心，而是以神主权的每个领域为中心。

现代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从蒙台梭利啊，特别是杜威的思想之后，整个教育模式都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但日内瓦大学代表着一种古旧而全新的基督教教育，它既继承了包括希伯来和希腊的以及中世纪的古典教育传统，又以宗教改革的“恩典教义”更新了这个传统。它是神的主权的每个领域为中心的教育。有一位改革宗的长老（Thomas. E. Welmer）这样说，“教育的课程必须涵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个地方”。今天，国家的梦想或我们对国家的梦想，都是“从摇篮到坟墓”，希望国家能够眷顾每个社会成员，就像天父眷顾我们一样。这就是世俗国家的福利主义，可以称为国家的“护理”教义（Providence of Government）。因为我们对国家的期待，已经几乎变成了对天父

的期待，“我们在中南海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学校，如同行在政府。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公立教育的谎言或对公立教育的期待，就是这个国家的“护理”教义的一部分。

基督教教育，才是上帝对祂的子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护理，用一句古话说，叫“活到老、学到老”。昨天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说，他想来神学院选修一些课。我说非常好，传道人应该终生修课，甚至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上帝对他的教育必须是终身制的教育，“从小明白圣经”，等到工作了，甚至蒙召作牧师了，也必须年年修课，月月读书。从摇篮直到坟墓。

第二，日内瓦大学的课程设计，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涵盖全部的人文教育。

包括下列课程，“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然后是“数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物理学和修辞”，最后是贯穿始终的“圣经”。

除了强调古典语言外，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强调本土语言的学习。你在中国社会侍奉上帝，最重要的语言是中文，你要比儒家学堂的学生更明白中文，更通晓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经典中学习语言，在诗词、文言的经典中学习古汉语，在基督教经典和其他经典中学习现代汉语。一些基督教学校采用全英语教学，这不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而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教育，是在福音中对这个民族的残忍的抛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古典语言就是古汉语。除此之外，最基础性的古典语言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是圣经的语言。其次是拉丁文，这是古代基督教经典的语言。然后是英语，这是现代最主要的基督教经典的语言。在一般情形下，在汉语的基础上把握英文，或许是目前情形下最通常的做法。

日内瓦大学开设物理学，是很超前的。因为在16世纪，物理学是刚刚兴起的、不是传统上的博雅学科，当时很多教育家都不太重视物理学。但加尔文非常重视物理学，这和加尔文对创造和上帝的普遍恩典的重视是有关的。物理学的目的是带领学生去认识和赞美上帝所创造并运行的一切，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改革宗的很强烈和整全的文化使命，特别是强调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

的学习。

不过和路德相比，上一讲我提到，就是音乐在日内瓦大学好像不很重要。其实慈运理是一个音乐家，但他认为音乐不够属灵，不能拿来敬拜上帝。可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路德也许是对的，他有一句名言，“魔鬼没有权利使用好音乐”。所以使用好音乐是圣徒的权柄。魔鬼嘛，听点摇滚乐或“中国好声音”就够了。不过改革宗并不反对音乐，虽然他们对于在崇拜中使用音乐要谨慎得多，也许他们这方面的恩赐也小一点。但加尔文也说过，“音乐是圣灵赐下的绝妙的礼物”，如果是我，我可能再加一句，“是我不太明白的礼物”，但他并不是反对音乐，加尔文也写过《诗篇》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不太好听，难以流传。

第三，日内瓦大学看重教师的权威和职分，而现代教育的特征是反权威的。

现代教育强调民主思想，甚至以此来瓦解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也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有关。同时，现代教育强调多元主义，所以它在本质上不是瓦解教师本人的权威，而是瓦解知识和真理的权威。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似乎在知识上是过于权威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并不相信，在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背后，有真理和绝对的知识可言。换言之，权威主义在中国，仅仅只是一种教化的手段，而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确信。

我们当然反对那种外在的权威主义，或教育方式上的律法主义。但加尔文非常强调以下几点：

1. 学生的本性中充满了罪。

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充满了罪。这是教育的、人性论的起点。这一点越绝望，恩典才越真实，否则你的教育才是道德主义的。是“革面”的教育，不是“洗心”的教育。你以为他变了，其实没有变。苏校长在上次期末典礼上讲道，说自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直到学期结束，学校里还有好几个案子没有破，比如到底是谁把蚊香撒尿浇灭了，到底是谁把那个什么……这些案子都没破，可是也没有关系。几周前，一个母亲说，她的儿子回家后主动向她承认了，某个案子是他干的。这让我非常感恩，其实也没必要一定要“破案”，但你必须知道学生的本性中充满

了罪。如果这不是你的人性论，他们就会把你气死，至少他们的罪性会一点点消磨掉你可怜的爱。因为你竟然以为，不需要基督的恩典，就可以去爱。这就是可怕的道德主义教育。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全然败坏的，这才是基督教教育的起点，恩典是从这里降临的……然后，他们也真可爱。

所以，你不能以他们为中心，因为你必须以恩典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

2. 激励学生探索复杂的真理的同时，要告诉他们所有真理的根源是神。

我昨天讲，不要把教义变成教条，我们要培养学生有反思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可我们最终传扬的是神的真理，不是“是而又非、非而又”的，而是清清楚楚的。换言之，因为基督教教育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教育，所以它所教授的知识，在学生的个人生命中的权威性一定高于所有世俗教育。因为世俗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本身的权威性的丧失。上了20年学，最终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现代教育的结果。就如博雅教育的另一位推动者、布鲁姆在他著名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描述的，他说，

“当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他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科系，各种令人摸不著头脑的课程。但是，对于他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没有正式的指导。甚至在大学中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见。…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作出职业选择，然后为就业而学习。大量的学生这样来到大学，希望在这里改变他们的无知状态，但当他们学习得越多时，他们便更无知了”。

我从小受教育的时候，非常困扰我的一件事，就是我搞不清楚我的老师们到底搞不搞得清楚，我的老师们对自己所教的东西是不是很确信，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开始我困惑，然后我怀疑，最后我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不知道。

3. 学生应当顺服从神那里得着呼召的教师的权威。

所以加尔文强调教师的神圣呼召，同时强调学生应从小学习顺服从神那里蒙召的教师的权威，就像在地方教会中会友应当顺服牧师和长老一样。因为失去了这种顺服的心，实际上就不可能

受教。顺服是以圣经为依据，也以圣经为界限。所以，学生被培养起来的，恰恰是对圣经本身而不是对某个人的顺服。但是，对圣经的顺服的训练，一定是透过对不同的人的顺服得以操练。

4. 教师不应过分接近学生，失去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当守的本分。职分的区分使学生尊重教师，也让教师更能在整体上帮助学生。

你可以说，这是加尔文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观察，但跟今天流行的教育心理学截然相反。他说，教师应该亲切，不可老是板着脸，但是教师也不可太过分地接近学生。距离，不但可使学生尊重教师，也能使教师能在整体上更好的帮助学生。举例来说，当一个学生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哭一场，给他一些朋友般的安慰的话，这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但加尔文的意思是，应该让其他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当一个学生在成长的困境里，他需要一个权威，他需要在内心真正地建立知识的权威。当他陷入危机或迷茫时，最能够帮助他的，其实是在他的生命中有权威的人，也就是他非常尊敬的、有知识和道德的真权威的人。他会信赖他所尊敬的人和他们所给的意见。

在教会里，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你越尊敬你的牧师，在你困难的时候，牧师的建议就越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一直在怀疑他或藐视他，听别人讲过很多关于他的闲话，那么就算他的建议是对的，却可能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而在你的生命中，目前又找不到另一位在关乎敬虔的真知识上值得你敬重的人，那你就很危险了。很多弟兄姊妹，有牧师，却等于没有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去接受一个生命中的权威。我再重申，权威不是绝对的，权威必须并仅仅根基于圣经，也必须经过你的良心自由的检验。可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神的话语的权威，没有落实（或道成肉身地）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话，在这种状态下，你有父母，等于没有父母；有老师，等于没有老师；有牧师，也等于没有牧师。因为他们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者，而不是一个上帝透过他们向你说话的使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学游泳，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教的吗？我以前只是听说，直到我的孩子学游泳，我才知道教练把他抱起来，直接就往水里扔，好吓人的！天哪，这么残酷！然后我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忍着，“我不说，我不拦阻”。我只是举

例子，如果你是专家，你也许会说，是不是一定要扔？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家长都会认为，在体育训练里，在艺术训练里，在士兵的训练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严格的、高强度的、有权威和纪律的教育方式，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反对的话，最后培养出来的就是废物。

人们认为，我们的身体技能、艺术技能，甚至生命当中的许多方面，如果不加以严格的训练，如果不在他里面建立起一种权威的秩序，我们的身体就不会顺服我们的意志。可是，在最重要的生命成长上，人们却假设我们的孩子在情感上面，在知识上面，在属灵生命上面，会当然的、很容易的、不需要严格的训练、不需要对权威的顺服，就可以驯服我们的意志和邪情私欲。这是很错位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假设，我们的身体是不听我们的话的，但我们的理性和情感却相当听我们的话。我们假设理性和情感有着相当的自主性，或者这种自主性具有相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们只是身体不合法，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经受“魔鬼教练”的训练，但我们的灵魂却是合法的，拒绝接受“圣灵教练”的训练。

任何教育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宗教教育，都建立在它的“神观”上。现代教育的“神观”，就是无神论。因此它的人观，就是没有神、没有罪和没有来世的人观。那么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群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让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超人”。所以整个现代教育的诉求，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它也有它的救赎论，这个救赎论是没有基督的，所以它的救赎论就是道德主义，所谓救赎就是自我实现。同样，它也有自己的末世论，但这是一种时间之内的末世论，比如，为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或者历史终结于一个普世人权的自由体系。什么样的末世论，就带出什么样的教育方法。

我每周三的早晨，会到学堂去给孩子们讲道。我不需要政府颁发的传道证，这跟我在教会里是一样的。但美国从60年代开始，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政教分立条款的理解，完全走向一个政治正确的、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方向。从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借助第一修正案，开始把基督教信仰驱逐出校园。你不能在里面祷告，不能有宗教课程。法国更严重，你甚至不能佩戴任何

显眼的十字架或其他宗教标志。

但美国起初的宪法传统和教育传统不是这样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也有建立公立学校。我在文章里提到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法律，叫《防止老骗子法》，老骗子就是魔鬼撒旦。马萨诸塞州在1647年制定这部法令，要求设立公立学校，里面说，那古老欺骗人的撒旦，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拦阻人对圣经的认识。因此，法令规定，有50个家庭的城镇要开办一所小学，有100个家庭的城镇要开办一所中学，然后预备他们的孩子将来可以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美国的主要模式还是受荷兰的影响，就是建立非公立的教区学校。所以在美国早期，既有公立的基督教教育，也有私立的基督教教育。比如在波士顿，到1720年时，私立学校是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甚至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很多乡镇根本就没有公立学校，全都是教区的和私立的。在建国的头一百年，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但20世纪后联邦的权力越来越大。教育也是一样，政府里都有一个教育委员会，公立学校的教材要怎么写、怎么改，里面可不可可以说上帝的创造，都由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来开会讨论，投票通过。好在美国和德国不同，他们骨子里还是以私立教育为主，当然公立教育也占很大一部分。

接下来，我想引用长老教会的“孩童洗礼誓言”，其中也包含了基督教教育的誓言。当父母把婴儿或稍大点的孩子带到上帝和会众面前来的时候，

施洗者应向领洗孩童的父母询问以下的誓言：

（一）你们是否承认，你们的孩子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和圣灵重生的恩典？

（二）你们是否以上帝所赐的父母权柄，代表孩子承认、领受圣约中的应许？你们是否以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正如惟独祂能救你们一样，唯独祂能救你们的孩子？

（三）你们是否毫无保留地将你们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你们是否承认需要谦卑依靠上帝的恩典，竭力在孩子面前活出敬虔的榜样，常与孩子一同祷告，且为孩子祷告；并教导这孩子认识敬虔生活的教义；并承诺你们将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蒙恩之

道，尽力照着主的教训培育、劝勉他（她），带领他（她）长大成人？

这个誓言包含了竭力寻求和提供基督教教育的承诺。父母承诺，要尽他们一切的努力，并竭力使用而不是藐视上帝所赐下的蒙恩管道。他们不应该因为公立教育比较便宜，就放弃基督教教育。也不应该因为公立教育更有“前途”，而基督教教育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选择公立教育。不然他就违背了这个承诺。当然，如果我们已竭尽全力，也愿意毁家兴学，但在上帝所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仍无法创办基督教学校，我们还可以选择在家的基督教教育。如果条件更残酷，我们的子女必须被强制送到公立学校，至少我在良心上有平安，可以去仰赖上帝超然恩典的介入。但这样的仰赖，意味着我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付更大的代价，委身于家庭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也更多地委身于地方教会的圣约共同体，来救无神论教育的弊。一个家庭没有选择送孩子上归正学堂，这当然出于他们的良心自由。但我说，你必须知道你所选择的是一条更难的路，而不是更容易的路。这意味着你的决心，必须比那些送孩子去教会学校的家长的决心更大，因为你走的是一条更大的信心之路。你要在异教文化的路上，去仰赖上帝更多的恩典。但上帝为什么必须要在你的孩子身上，施予比在其他孩子身上更大的恩典呢？除非祂定意要你的孩子承受其他孩子所不能承受的试验，好在将来藉着他的成长，施予他们那一代人更大的恩典。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比那些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家长，预备付出更大的心血，更深地放弃这个世界。他们每天晚上陪孩子两小时，你就要陪四小时。如果你预备好了，那便出于你的良心自由，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也相信上帝定会帮助你。但如果你的选择是出于不信，而不是出于信。你以为他人的选择是比较难的，而我的选择是比较容易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就滥用了良心的自由，你在试探你的主，你违背了在孩子受洗时立下的誓言，你轻看了那庄严的承诺。那么我说，你需要悔改。

有个弟兄，他的孩子要受洗。我告诉他，明天你要穿西装、打领带哦。他说奇怪啊，又不是我受洗。我说你才奇怪呢，明天是你宣誓，又不是你儿子宣誓，当然是你打领带，不是你儿子打领带。你儿子才一个月，随便抱来就行了，明天是你在上帝面前宣誓啊。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婴儿洗礼的意义，这是他的事，也是你的事。而且首先是你的事。你承诺要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

蒙恩之道，你有没有竭力使用啊？如果我尽力了，即使是在巴比伦的学校里，在尼布甲尼撒的宫中，我们也可以仰望主的恩典。但你不能说，既然在巴比伦的学校也能出但以理，就随他去了。

有一次归正学堂开筹备会，苏校长问家长们，假如教会最终办不了这样的学校怎么办？家长说，那能怎么办呢？只有把孩子重新送回公立学校了。苏校长说，不，你们不能这么想！以前你们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母亲回家，生活水平下降一半，也要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这就是基督教版本的“毁家兴学”。

有一个家庭，孩子小升初。在一次退修会上，他们表演家庭的挣扎。故事说已为孩子为孩子在归正学堂报了名，忽然摇签却摇中了七中（四、七、九，是成都最好的三所中学）。好痛苦，到底怎么选？谁知在演过这个小品两周后，他们真的摇签，抽到了四中。活生生的诱惑摆在眼前。这边，是非基督徒花钱都进不去的教会学校，那边，是基督徒花钱都进不去的公立学校。最终，感谢主，这个家庭放弃了世俗的名校，选择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教会学校。

教会砸锅卖铁，也要把办学校放在建教堂之上，你才能鼓励每个家庭要砸锅卖铁，不走回头路。教会就是砍掉一些开支，也得办学校。家长们也一样，你干嘛住130平米的房子，卖了，换成80平米。你为什么还要开车？卖了，去乘公交车。你为了耶和華的产业，竭尽全力去寻求合乎神心意的教育了吗？当你因信这样做了，你也会因信而安心。即使最终还是上了公立学校，你知道基督有恩典，你没有试探祂，你也没有违背你在救主面前的诺言。

三、加尔文的遗产：基督教教育宣言

在20世纪，美国的一家改革宗长老会，效法当年的日内瓦大学，建立了“日内瓦大学”（或译日内瓦学院）。他们的《教育原则宣言》，集中阐释了改革宗教会的基督教教育观。我摘录其中的几个部分：

第一、对于教师的涵义：

任何与管理一间教育机构有关的人士，都在该机构的目标上

有份。这对于基督教教育事业更为重要，因为人生所有的工作，不论是教育或其他，都不可能与神无关；同时，因为每一位从事基督教教育的教职员，其生命必须表现基督教教育的宗旨。每个人都参与知识的传达，不过，只有有意识的委身于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人士，才可能有真正基督教教育的目标，而且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为要达到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每位教员必须以最高的学术标准，同时符合圣经的宇宙人生观来研究、教导每一门学问。

第二、对于学生的涵义：

所有学生都可能藉神赐给人的普遍恩典获得高水平的知识，但是若要达到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学生们必须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好叫罪和罪在人性里面的后果得以克服。身为神所创造的人，学生都身负神的使命，为了认识神、荣耀神而学、应用一切的知识。学生不应该闭门造车，对非基督徒的知识一无所知，反之应对所有的知识批评检讨，保留真理，弃绝错误。学生应意识到神对他们的呼召，视他们的教育为他们终身生命与事业准备的宝贵机会。

第三、对于课程的涵义：

建构一个基督教教育课程的基础，乃是深信历史性的正统基督教信仰是永久真理，而且是整合一个真正基督化教育课程的基本因素。名副其实的基督教教育必然引致认识神，认识人类和认识宇宙，而这三方面的知识是彼此相关的；因此基督教教育的课程必须同时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并以圣经研究为课程的基本核心。课程需使学生掌握到学习的基础，以致他们能终生在生活上荣耀神，不畏惧和坦诚地正视一切新知识的困难和挑战，在神的主权下贡献于社会的福利。

第四、基督教教育的宗旨：

神创造人为要人荣耀祂，因此基督教教育竭力引导人认识神，藉着研究神的话和神的作为，使人生与宇宙的一切都与神相关。基督教教育强调主耶稣基督与祂的救赎大工，以帮助学生离弃罪，把生命奉献给祂做救主，同时视基督为人生宇宙的最高目标和意义。

第五、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发挥神所赐每一位学生的才干，以致实现每人个别的潜能。学生将这些才干奉献给神，在每日生活和事业上荣耀祂，就是实现自己的潜能。世界是神所造的，文化是丰富的，因此基督教教育需培养学生欣赏神的创造的品质，使学生认识整个人生都与神和祂的救赎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成熟的学生，在个性上有美好的整合，在社会上作有目标有方向的公民，在家庭、教会、国家和世界里竭力建立神的国度。

第六、是基督教教育的十一个具体目标：

1. 透过从基督教观点学习基本人文学科，帮助学生培养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欣赏。

2. 正视与检讨多种思想与艺术作品，包括那些显示当代宇宙人类堕落与破碎本像的，借此应用基督教的原则在治学上面。

3. 培养演讲、写作、美术等表达能力，以及这几方面的批判能力。

4. 预备学生进入社会，以知识为职业来服务本地人群。

5. 提供机会让学生为将来进入研究所或专业学院做充足的准备。

6. 给学生机会认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考虑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主宰的呼召。

7. 提供一个健康、精彩的基督教环境，以示范如何在个人生活，在人际关系中应用基督徒信仰原则，同时装备学生日后在教会里作领袖。

8. 让学生有机会参与促进身心灵健康的娱乐活动，以培养对空余时间的积极利用，日后不忘。

9. 提供机会让学生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以培养忠心、合作精神，以使学生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做一个积极参与的公民与领袖。

10. 培养对国家与世界问题深思熟虑的关切。

11. 与当地的商界、教育界和其他社区团体合作，帮助有特别教育需要的群体。

圣约归正学堂，以“真理的儿女、敬虔的仆人、正直的公民”来表达这一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的目的与异象，这三项也对应着先知、祭司、君王的三重职分。

相对于快速基督教教育（Accelerate Christ Education，简称ACE），我们的基督教教育观，可称为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 Education，简称CCE）。

最后，我为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一间教会学校，是长老会宣教士狄考文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蒙养学堂”。第一年只招了6个人，后来跑了一个，劝也没有用，父母把他带走了。有几个人放假回家，家里人拉着他前前后后的看，看少了什么没有，看他身上有没有魔鬼，后来看他还正常，旁边就有人说，才三个月，还看不出来。所以，筚路蓝缕啊，学校创办了十几年，一共才3个人毕业。直到有个叫周立文的学生，参加了当年的科举，结果考了当地的第一名。这事以后，报名的学生才开始多起来，便改名为“登州文会馆”。

我最近读到一位法学家贺卫方先生的文章，他不是基督徒，不过早年曾研究过中世纪的教会法。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信主。他这篇文章叫《消失的墓地》，说他回山东老家，读了传教士的书，特意去看传教士的墓地，其中就提到蒙养学堂。他说：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过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例如费舍的《狄考文传》、《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普鲁伊特夫人的《往日琐事》等，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例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882或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你们都知道狄考文，但我想提到他的妻子茱莉亚。大家看这本书叫《笔算数学》，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从蒙养学堂开始，

直到1910年，都是中国主要的算术课本。这是茱莉亚和狄考文一起翻译的，是中国开始第一次应用阿拉伯数字。狄考文曾说，主要是我的妻子建议我办蒙养学堂的。因为那里之前是一个孤儿院，所以叫“蒙养”。并且一开始，茱莉亚承担了学堂三分之二的教学任务，她还要给孩子做饭。这对夫妇一生没有孩子，她就一直把学堂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她也教音乐，写了中国教会的第一本赞美诗。是她把赞美诗的曲调引到中国来的，今天中国教会的诗歌中有些“山东曲调”，就和她有关。所以狄考文说，他的妻子才是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所以，我称茱莉亚为“中国教会学校之母”。

这张照片，是登州文会馆1894年颁发的文凭。你知道中国的第一间公立大学，是1898年李提摩太任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你想，除了聘请外教，当时到哪里去找师资呢？结果，京师大学堂的中文教师，全部来自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共有8人。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来做懂西方文化的中文老师。这是他们的合影。

1901年，袁世凯找到狄考文，又创办了第一所省立高校，也就是山东大学堂。

这是1908年狄考文的葬礼。最感人的是在葬礼上，宣读了一份登州文会馆1864-1908年的毕业生的情况，作为对他的纪念：

登州文会馆共有208名学生拿到文凭，其中37人当了官办学校的教师；68人做了教会学校的教师；做了传道人和宣教士的有36人；从事文字工作的有10人；经商9人，做医生7人；当邮政干事、铁路干事、工程局干事和青年会干事的共11人；在海关工作1人；当商行职员2人，当秘书1人，在京师大学堂肄业1人，在家6人，去世22人。

我对苏校长说，我盼望这也是圣约归正学堂，在几十年后的毕业生职业分布情况，在这个特别的时代，他们中应该有更高的比例，成为传道人和教师。希望将来，这份名单可以在你的葬礼上宣读。在座各位，如果你们受了主的感召，决心委身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中，再次创建和服侍教会学校，我也把这话送给你们。

为此感谢主！感谢主！唯独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
远。阿们。

罗 11:36